

李佩甫《败节草》的文本、版本与“跨文本”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李佩甫是“文学豫军”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败节草》在《十月》杂志1998年第5期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获得多个文学奖项。小说主人公李金魁是作家在约十年前发表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及其续篇(后合并为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并出版发行)中的人物,作家将其中的相关文本“析出”,并以此为生发点,重新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败节草》;再后来,作家又将《败节草》的内容“嵌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从而完成一部“三条线索”的新长篇,即影响广泛、多次重印的《李氏家族》。这是一次“跨文本”尝试,也是作家的一个创造。根据《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屋》改编的十四集电视连续剧《李氏家族》,播出后却很遗憾地未产生预期的轰动效应。在李佩甫的笔下,到底应是“颍河故事”还是“颍河故事”?我们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尊重现实。

关键词:李佩甫;《败节草》;《李氏家族》;“跨文本”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01-07

李丹梦教授认为:“提及‘文学豫军’,李佩甫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斐然的创作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李佩甫一直致力于中原人格的开掘和塑造,因此从地域写作的角度来讲,李佩甫应该属于正宗的‘双料’豫籍作家,所谓河南人写河南人。而从写作风格与技巧上讲,李佩甫在豫籍作家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不仅恋土和权力情结在他身上有鲜明的体现,豫籍作家的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也在他身上‘放大’了。”^[1]

能够鲜明地体现“地域写作”“恋土和权力情结”且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既包括《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羊的门》等长篇小说,也包括《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等中篇小说。本文以《败节草》为例,解读其文本、版本以及“跨文本”传播。

一、“析出文本”

据《李佩甫年谱》“1998年”:

4月1日,应《十月》杂志之邀创作的中篇小说《败节草》完成。^[2]

1998年9月,《败节草》刊发于《十月》1998年第5期。该期仍是惯常的“双头题”编排:从正文来看,头题是张欣的《婚姻相对论》;从目录来看,头题是李佩甫的《败节草》。



图1 中篇小说《败节草》首发本

收稿日期:2025-01-05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史研究等。

这部作品以传统的“顺叙”方式,讲述了主人公李金魁的童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最后他当上了市长,立志要为百姓做好事、干出政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农家子弟的励志故事”。

李金魁这个人物,此前已出现于中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续篇)》(分别发表在《小说家》1986年第5期、1987年第6期);后来作者将这两部中篇“合璧”,成为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1987年11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1次印刷时间为1988年6月)。除了书名之外,这部长篇小说与此前的两部中篇还有细微的文本差别,本文所引相关文字,均以此单行本即“初版本”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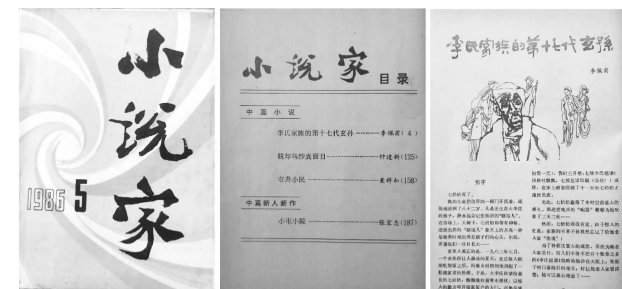


图2 中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首发本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正文共12部分,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李金魁这个人物就出现在正文的第一部分和后面的“尾声”里。该作品的第一部分从“县长李金魁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写起,时间为1984年3月的一天。其时李金魁上任刚一个月,平时住在县委的小招待所。这封举报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她的丈夫李二狗是全县有名的“致富模范”,他在县城里承包了一个公司,几天前因为未能履行合同,公司宣告破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他本人“也以诈骗罪被抓进了监狱”。信里面夹着一个蓝色的记事本,上面有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副县长及各局中层干部在内的37人的受贿受贿记录。作为一名在改革中提拔上来的干部、四年前从省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李金魁“雄心勃勃,有一套一套的改革设想。他准备三年把县里变个样子,五年再变个样子……”^{[3]7}然而现实却是,他遇到了重重阻力,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上上下下有着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老的,新的;“文革”前的,“文革”后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干部,军队转业干部,落实政策回来的干部……都有一股一股的势力,一层一层的网,“如果细究起来,连县委大院的炊事员都是有来头的,他必然与县委的某个干部有着某种瓜葛。他觉得他一下子陷进去

了”^{[3]8}。他单独找到写举报信的那位叫田秀娥的女子(因为怕报复,他坚决反对揭发举报),并且确认她出事的丈夫李二狗就是与李金魁“一个村长大的狗哥”——这个村叫大李庄村,它与画匠王、扁担杨一样,是作家李佩甫小说故事的重要发生地和“文学版图”。

在小说的“尾声”里,就在七奶奶三周年祭日的头天傍晚,谁也没料到,“县长李金魁坐着吉普车回来了”。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当秘书不在跟前时,他又回到了真正的自己。他见到了四婶(“小时候我还吃过你的奶呢”)、二嫂,还有春生爹、麦囤,最后去见了本族辈分最长的石碾爷,这时他才说出此行最要紧的一句话:

“要是我不当县长了,回来种地,不知爷儿们还肯不肯收留我?”

其时已是三年过去,他政绩平平,“没给老百姓做什么大事,他心里一直很惭愧”。那封“匿名信”一直压在他的心上,现在他要“开刀”了。在决战之前,他想再回一次生他养他的大李庄村。车子离开村子后,他严厉而果断地告诉司机:“县城不停,直开地委!”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的李金魁这个人物,想当初于作家李佩甫而言,定然是言未尽、意犹未尽。因此,十年之后,他又将上述文本从原作中“析出”,并以此为生发点,重新创作了中篇小说《败节草》。

《败节草》加进去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李金魁与李红叶的爱情。严格来说,两人还是一个村子的,但李红叶的父亲、县一中校长李志尧,在大李庄村似乎仅仅是一个传说。两人之间的差别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是城市娇女与农村草根之间的差别,但这毫不妨碍情窦初开的李红叶的一片真情、一片痴情。因为贫穷,上高中时李金魁与一位收废品的歪叔相依为命,特别是一场风暴席卷社会之后,这里收来的一本本“四旧”书成为他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他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把被关在学校小楼里的李校长救出来在这里藏身。否极泰来,三年后的李志尧已是主政市委大院的“李主任”,此时的李金魁没有留下来当一位人人羡慕的秘书,而是选择读大学。这次选择无形中让他躲过了一劫(因为不久后李志尧就在那场运动中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同时也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而他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凭“吃香”,短短四年他就完成了华丽转身。

李金魁是作家李佩甫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与《无边无际的早晨》对照着读,

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后者的主人公“国”也是一个农家子弟个人奋斗的典型,小说从他的出生写到他上任县长为止,但读来总感到作家于字里行间的批判甚至厌恶。而李金魁不同,虽然他也一心向上爬,行事有心机,或者说有很重的功利心,但他并未失去农家子弟天然的纯朴正直;他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不是像“国”那样野蛮生长;他有一腔热血,强烈渴望干出政绩,而这种政绩不仅仅关乎个人升迁,更在于他要真正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小说也通过这一人物的人生轨迹,深入挖掘民众的心理性格。

二、转载本、连载本、单行本

《败节草》发表后,很快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它迅速被多家重要的文学选刊转载,依照出版时间,分别为:《小说选刊》1998年第11期(出版时间:11月7日)、《中篇小说选刊》1998年第6期(出版时间:11月10日)、《小说月报》1998年第12期(出版时间:12月5日)。

《小说选刊》当期的《编后记》这样写道:

李佩甫是个善于出新招或怪招的作家。他喜欢写人家所未写的生活层面,揭示人家所未揭示的事理。读过《红蚂蚱绿蚂蚱》和《学习微笑》等小说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看法。本期选载的《败节草》亦如是。作品以丰富生动且有意蕴的细节,描写一个从农家孩子成为市长的人,如何吸取传统农民良莠兼有的生活经验,并应用于自己的人生中。作者在这里剖析了当代某些干部素质的根源,启人思考。^[4]

《小说选刊》转载该部中篇时还特意配发了两幅插图。插图作者为郭雪艳。这里要强调的是,像插图这样的“副文本”,往往是初刊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后来的转载或收入选集的过程中,几乎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同编辑的选择取向、整体风格的统一、著作权因素等)而被“割爱”,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败节草》在《十月》杂志发表时,配有一幅题图(作者:育民),其他刊物转载时未再保留(《小说月报》重新配了摄影题图);再如,《红蚂蚱绿蚂蚱》首次在《莽原》1986年第1期发表时,配有由李伯安(后来以人物画闻名全国的大师级画家)绘制的三幅插图(其中两幅同时用作题图),但是这三幅插图在后来的各种选本中均难觅踪影。另外,作品被转载时,往往还配有作者简介、创作谈,有的还在封二或封三刊有作者生活照等,这些都是把我

们带回文学现场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都远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小说选刊》转载《败节草》时,对作者的介绍相当简洁:

李佩甫 1953年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市白皮书》、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等。多次获奖。现为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理事。^[5]

《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败节草》时,除作者简介之外,按惯例还附有一篇作者的创作谈,题为《一种植物》。应该说,从这篇作品开始,李佩甫的“植物书写”成为文学研究者注目的一个话题。

这部小说的开头就写道:“儿时,他的记忆是从一株草开始的。”接下来,作者做了细致的描述:“那是一株很瘦很弱、细线一样的小草,秆是青色的,微微泛一点灰,泛一点点白,草节上还有一些麻麻淡淡的小黑点,让人看了心寒。……当他把草抓在手里时,他发现那草已经散了,草是自动散的,草散成了一节一节的……当他成为一个割草孩子的时候,他才知道那叫‘败节草’。这时候‘败节草’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记忆信号。”^{[6]35}

在后面的行文中,“败节草”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被反复述及:

上大学的时候,他总是梦见那株草。

在梦中,那株草带着一股苦艾艾的气味。草是那样的小,青麻麻的、带着褐色的斑点,一节一节地散落在他的眼前……而后他就醒了,每到这个时候,他一准醒,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6]54}

无疑,那株草是主人公命运的象征:虽然卑微,但并不攀附——

那时你就知道你是一株草,自生自灭的草啊。你一生下来就处于败势,你只是一点一点地生长着,你的身量很小,你的基点也很小,再小的脚印也是你自己的,是你一步步走出来的。你是在小处求生,在败处求存的。^{[6]55}

在《一种植物》一文中,作者写到:在家乡的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狗狗秧、乞乞牙、星星草、小虫儿窝蛋、灰灰菜、马齿菜、败节草……在平原上,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你的心就会为之一动。你会发现,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处求活的。它从来没有高贵过,甚至都没有稍稍鲜亮点的称谓……“败节草”是取自平原

的一株,那生长的过程与这里的土壤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1999 年,《败节草》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2000 年,又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九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范围是 1998—1999 年度的作品)。

《败节草》后被收入《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 1 版),后面附有一篇《创作札记》,如果与前述《一种植物》对照阅读,我们对作家的心路历程会有更深的理解:

过去,在很早的时候,我一直认为,金钱对人的腐蚀力最大,金钱对人的灵魂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后来,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腐蚀力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贫穷”,贫穷对人的压迫和冶炼远远超过了金钱,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我发现,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极端的生存经历,会给人打下极其深刻的精神烙印,尤其是童年,对于人来说,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当他在一种没有戕害、正常的、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时,他的心态也应该是较为正常的、健康的;当他在一种贫贱的、备受欺凌污辱的环境中成长时,他的心灵是扭曲的、变形的、病态的。而这种幼芽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在早年就含有某一种毒素,这种毒素是以仇恨来滋养的。这种含有某种毒素的幼芽一旦在成长过程中生成,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的终生……

于是,我写了《败节草》。这篇作品是我改正认识错误的一种方式……^[7]

1999 年 4 月起,中篇小说《败节草》开始在《农村·农业·农民》杂志连载,历时一年有余,到 2000 年第 3 期为止。事实上,一部传统意义的纯文学作品,在一家非文学刊物连载(《农村·农业·农民》其时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这也在传递着一个信号:在 1990 年代末,由于内部的、外部的诸多因素,文学期刊再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省级大型刊物订户甚至跌至千份以下,其相应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想见。但那一时期主要针对某行业、某系统的由省级相应机构主办的“专业刊物”,依靠其在本系统、本行业(共青团、妇联、计生、公安、司法、民政、农业、劳动人事等)的自身优势,往往能够保持着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较高发行量,它们

相应地在向名家约稿、稿费支付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同时,作为首发《败节草》的《十月》杂志并未“遗珠”:2002 年,这部作品荣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大来杯”奖(该奖项评选范围是 1998—2000 年的小说,同时获奖的中篇小说还有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和刘庆邦的《神木》等);2004 年,它又被收入谢冕、孟繁华等主编的《〈十月〉典藏品·青卷·中篇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2015 年,它再次被收入谢冕、孟繁华等主编的《典藏时光:〈十月〉杂志 35 年名篇集萃·中篇小说卷五》(北京出版社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图 3 《败节草》在《农村·农业·农民》杂志连载

就笔者所见,以《败节草》为书名的单行本(或选集)先后有两种。2000 年 3 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败节草》,但它不是李佩甫的个人集(署名“李佩甫等著”),仅收李佩甫本人作品《败节草》《学习微笑》两篇(其他几篇分别为《六神有主》《镇长》《本乡有案》《重现江湖》《一个乡长的来信》)。从其封面“权力的大旗下,总是伴随着腐败的影子,权力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柔乡”等文字来看,该集的编选者是着眼于那些年颇受读者关注的“官场小说”。然而,经核实,该选集竟然是一个未经作家本人正式授权的版本。

2015 年 11 月,李佩甫中短篇小说集《败节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集系“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一辑之一种,收录其中短篇小说《寂寞许由》《败节草》《学习微笑》《无边无际的早晨》《黑蜻蜓》《画匠王》《满城荷花》《麻雀在开会》《红蚂蚱 绿蚂蚱》,并附评论《他热热地托出来一个世界》。该“文丛”由白烨主编,第一辑还包括李洱《从何说起呢》、王跃文《漫天芦花》、叶广岑《月亮门》、范小青《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徐则臣《苍声》、宁肯《维格拉姆》、

乔叶《取暖》等。

三、“嵌入文本”

将《败节草》“嵌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是作家李佩甫的一个“发明”、一大创造：李金魁作为从大李庄村走出来且走得最彻底的一个人物，只有把他放在李大有、李二狗、李春生、李小圉们中间，这一形象才更加立体、丰富，也更具有文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人物李大有。这是一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典型。五年前，他被村干部（五叔）所逼，远走他乡，“漂”在新疆；五年后，他衣锦还乡，人们都知道他“掂了一兜子钱”，他出手大方，不拘小节。他有经济头脑，回来后买了三台打麦机，一台免费给本村人用，另外两台半个多月挣了三千块钱——这些都对村干部们构成威胁和挑战。但他又太工于心计，在麦囤的女人与私奔一事上，他做到了极致。他与“竞选村长”李宝成有过一次深谈，他直言不讳——要让咱村富起来不难，只要做到三点：一是靠钱“买路”，也就是行贿，种庄稼富不起来，得搞副业，搞副业得有资金，贷不出钱怎么办，给银行的人送钱，此外还有工商、税务、公安……都得送；二是如今人心太恶，你得以恶治恶，对村里爷儿们你不能以诚相待，你得真真假假，让他们吃不透，你还得让他们一见就怕；三是在上头要找靠山，报社记者什么的，也得巴结，万一出事了得有人替你说说话。他自己也承认：“我不是人，是鬼。”可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持批判态度。

人物李小圉。这位三代传承的农村小木匠，尽管走到了城里却仍然是个农村人，他靠走街串巷给人家打家具，每月往家里寄三十元钱还债（哥哥结婚后，分家时他分到了三千元债务），后来认识一位温和秀美、带着小女儿生活的离异女子，他们开张了自己的“新生家具店”，小木匠摇身一变成了“穿西装的男主角”。谁知头两年生意还好，后来两人开始出现分歧，“闹着闹着，生意就做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李小圉选择了离开，“跟一个施工队到南方去了”。

人物李春生。高中毕业的他，是村里的一个“文化人”。因为贫穷，他把考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女友晓霞，自己咬牙承担起两家的农活儿开始“一心奔钱”，他下煤窑、贩猫、养香蘑、喂蚯蚓，在国乐班敲过梆，也卖过菜，最后建轮窑，他以自己的聪明和勤劳，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这是一位摆脱了传统农业走向致富路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人物。然而，当他心目中神圣无比的爱情以女方的背叛而

告终时，他选择了以牺牲双方为代价的殉情之路。这是一场悲剧，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思想意识并未真正走出农村，走出土地。

人物李二狗。他是一位看上去风光无限的“太平洋开发贸易公司”经理。他靠着无意中听到的一条信息，凭着胆大和运气，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暴富，从此他游走在政策漏洞和人生贪婪的灰色地带，大肆行贿也大肆挥霍，满足别人贪欲的同时也在自我堕落。面对金钱，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李二狗们是注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他幻想中的（也是当权者承诺给他的）成为一名端着铁饭碗的国家公务人员的梦想并未实现，最终的归宿是铁窗、牢狱——但也很难将他唤醒，他并未真正自省。

还有“响器人”李连升、闹离婚的“国家干部”李家福、“竞选村长”李宝成等，他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真实生动的社会画卷。



图4 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败节草》的“前世”与李佩甫的两部中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续篇）》（后来合并为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出版发行）紧密相关。那么，它的“后世”则是：作家又将《败节草》的内容“嵌入”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形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李氏家族》，1999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一再重印。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为双线结构，一是以“奶奶的瞎话”贯穿起来的“李氏历史”，时间跨度为明清至民国共三百多年，分为十二部分；二是以“一”“二”“三”……为序的“李氏当代”，时间跨度约为三年（1984至1987年间），也分为十二部分。小说（包括“续篇”）发表时，是以“李氏当代”为主线、“李氏历史”为副线；出版单行本时，“李氏历史”（即“奶奶的瞎话”）为主线，“李氏当代”为副线。《败节草》的文本也是十二部分，将其文本“嵌入”之后的《李氏家族》，就变为“三条线索”的结构，“当代叙事”的内容亦明显加强。新加入的文本，以“羊

(一)“羊(二)”“羊(三)”……为序——在此期间作家已完成长篇小说《羊的门》，以“羊”隐喻芸芸众生，是作家小说中新的意象；而原来以“一”“二”“三”……为序的“李氏当代”文本，则改为以“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为序。

当然，这里面并非简单的“文字加减”，它包含作家的二度创作和多次修改，包括内容结构与前后顺序的调整，情节、人物关系的重设等。比如，在《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续篇）》中，李金魁是县长，他收到匿名信是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写信人叫田玉娥，是犯事老板李二狗的妻子，行贿金额高达十七万八千多元；在《败节草》中，李金魁是市长（“虽然县、市是平级，可市长毕竟是市长啊”），他拿到举报信是在小说的第十二部分，写信人是他当年的初恋、现在的情妇李红叶（犯事的老板是她的丈夫），行贿金额是五十七万八千多元……而且，前述文本中，李二狗是与李金魁“一个村长大的狗哥”，在《败节草》中这位犯事的老板则身份不详。

如果说行贿金额的改动是基于社会的发展而“水涨船高”，那么有些修改也许作家另有考虑。比如在早期文本中，李金魁是省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刚毕业分配到乡里时，“他这个农学院的学生，既没有试验田，也没有实验仪器，就那么晾着”），在《败节草》中，主人公刚毕业时被分到了乡里的农机站，“李金魁是学文的，不懂农机”。

我们还可以看到，《李氏家族》的《尾声》部分，作家做了较大修改和较多的补充，特别是补写了几位主要人物的结局，使得这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完整——

军人李志全如今成了“烈士”了。

李小国又走了，仍然是背着他那套做木匠的家什。

“响器人”李连升又娶了一房女人。

国家干部李家福终于离婚了。

……

修改后的《尾声》删了“远处，修路队从邻村开过来了”“一群光屁股娃儿从老坟地里跑出来了……朝那正修的新公路跑去……”等内容，并做了明显改写。

原来的小说结尾，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生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一个家族就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了。

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

李宝成在默默地想……

李大有也在默默地想……

李满凤……

李连升……

李家的第十七代呀！纷乱的时代，纷乱的心。^{[3]283}

经作者修改后，后来的结尾变得十分简洁：

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一个家庭就这么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了。

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8]

四、余论

首先，将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重写或者“二度创作”，对作家李佩甫来说并非个案。例如，大家所熟悉的电视连续剧《颖河故事》，就是“萃取”了《画匠王》《村魂》《红炕席》《豌豆偷树》等多篇小说的内容，“它不是根据某一篇小说改编而成，而是作家李佩甫从整体的构思出发，将自己发表过的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统统打碎，重新组合，再增加新的人物、情节，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9]。

其次，文学作品的跨文体传播，就影响力而言，首先应关注电影、电视剧的改编。但是，十四集电视连续剧《李氏家族》的改编要早于《败节草》的发表和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出版。笔者所见到的文字版（电视剧故事）有两个版本（均为非正式出版物）。一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定稿”，标注有“根据李佩甫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和《金屋》改编”。编剧：尤小刚、舒德淳、铁佛；导演：尤小刚。二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定稿”，标注有“根据李佩甫的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和《金屋》改编”。总执笔编剧：尤小刚；编剧：尤小刚、白云海、铁佛、舒德淳、罗欣；导演：尤小刚。据称，此前还有一个“电视剧《李氏家族》”剧本（没标“电视连续剧”），时间为“一九八九年元月”，该版本有“根据李佩甫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改编，导演：尤小刚”等字样。

应该说，电视剧《李氏家族》上映并未取得预期的轰动效应。上述剧本由于成稿在先，其与中篇小说《败节草》也没有内在的文本联系。

同样，像连环画改编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就笔者掌握的线索来看，李佩甫的小说被改编为连环画的不算多，仅见《蚰蚰》一例。短篇小说《蚰蚰》发表在《长江文艺》1983年第9期，很快被《新华文摘》1983年第11期转载，这篇小说还获得了1983年《长江文艺》佳作奖，是李佩甫第一篇产生社会影响

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蚰蚰”是一个农村电工的名字,他表面上吊儿郎当,内心却充满善念。应该说,这是一篇生活气息浓郁、充满正能量的作品。“《蚰蚰》透露出一种新的美学气息,是李佩甫小说创作的新突破。”^[10]同名连环画由马建刚编绘,刊登在《连环画报》1988年第3期上。

最后,关于“颍河”与“颍河”,在此我们也有必要做一点考辨。

李佩甫的早期作品如《无边无际的早晨》(《北京文学》1990年第9期)是写作“颍河”而非“颍河”(“颍河墨一样地流着”),直到三十年后,该刊为“《北京文学》70华诞回顾”重新发表这部作品时,仍然写作“颍河”(参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0年5月号第167页)。还有,他1992年春开始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当时也是写作“颍河”的。但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林林总总的选集、合集、全集乃至公映的电视剧中,编辑或选家们纷纷“集体无意识”地将其改作“颍河”了。

为此,《李佩甫年谱》的著者特意以“按”的形式加以说明:

电视剧《颍河故事》是以河南省许昌市颍水河畔农民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为原型所写的剧本。搬上荧幕时,为了避免观众在欣赏中对号入座,就以“颍河”二字代替“颍河”,是为《颍河故事》。不过,在后来的一些剧作介绍及播出的电视剧

中,也有将其名字写为《颍河故事》的。因此,就目前存在的剧本以及播出的电视剧来说,由李佩甫创作的《颍河故事》与《颍河故事》系同一剧本,而非作家不同的创作。^{[2][13]}

这样的表述,也许能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专业研究者,在阅读相关文本时稍稍解开谜团和困惑。

参考文献:

[1] 李丹梦. 李佩甫论[J]. 文艺争鸣, 2007(2): 142.
[2] 樊会芹. 李佩甫年谱[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24: 170.
[3] 李佩甫.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4] 编后记[J]. 小说选刊, 1998(11): 128.
[5] 作者简介[J]. 小说选刊, 1998(11): 60.
[6] 李佩甫. 败节草[J]. 十月, 1998(5).
[7] 李佩甫. 创作札记[C]//《小说月报》编辑部. 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173-174.
[8] 李佩甫. 李氏家族[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356.
[9] 崔光远. 致广大 尽精微: 评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的艺术观念与思维方法[J]. 中原声屏, 1994(1): 33.
[10] 乐平. 李佩甫小说漫谈[J]. 奔流, 1984(10): 6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xt, Version and Cross-text Communication of Li Peifu's
Novella *The Grass of Jointweed*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Li Peifu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Henan literary Army”. After his novella *The Grass of Jointweed* was published in October magazine (Issue 5, 1998), it was quickly reprinted in the *Selected Novel*, *Selected Novella and Monthly Novel*, and was included in a variety of literary anthology and won multiple literary award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Li Jinkui first appeared in *The 17th Great-great-Grandson of the Li Family* and its continuation was published about ten years ago (later consolidated into a single novel). The writer “separated” the relevant texts, and took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He re-created the novella *The Grass of Jointweed*; Later, the writer also “embedded” the content of *The Grass of Jointweed* into the novel *The 17th great-great-grandson of the Li Family*, so as to complete a new novel with “three clues”, that is, *The Li Family*, which has won a wide influence and has been reprinted many times. This innovative “cross-text” experiment demonstrates unique literary craftsmanship. Adapted from *The 17th Great-great-Grandson of the Li Family* and another novel *The Golden House*, the 14-episode TV series *The Li Family* has unfortunately failed to generate the expected sensation after its broadcast. In Li Peifu’s writing, should it be “Yinghe story” or “Yinghe story”? We should respect both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 Li Peifu; *The Grass of Jointweed*; *The Li Family*; “cross-text”

编者按:

作家墨白新著《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于2024年9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问世便引发社会关注。2024年12月13日上午,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墨白作品《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召开。来自河南省作协、省文学院及多家高校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以及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师生共30多人与会,会议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主持。我刊特刊发此次研讨会纪要,旨在与读者分享研讨成果,同时为河南文学留存一份珍贵的史料。

通往精神高地

——墨白《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研讨会纪要

刘宏志,马 骧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是近年来墨白行走文学作品的一次合集:《洛克的目光》记述的是从云南赴青藏高原的旅程;《天果洛、地果洛》写的是自青海入青藏高原;《音乐唤醒的旅程》是从四川前往青藏高原路程的记录;《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是一部纪录片脚本,用镜头语言塑造了一位热爱摄影、珍爱高原的“康巴汉子”。与会专家围绕“文体”“视野”“叙事”“主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该书的写作看似散漫却结构精心,是文体形式的破冰创新;该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力量,是一部通向精神高地的探索之书。

关键词:青藏高原;墨白;文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08-06

一、文体

冯杰(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首先发言:墨白有着广阔的视野,他不仅一直关注着陈州与颍河流域的本土文化,也持续关注异乡的风景与文化。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本书大概可以归为“新旅游文学”,但它不同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抒情游记,里面体现着墨白在人文、风俗、地理乃至哲理层面的深度解读。从形式上看,这本书确实有些“杂糅”,既有游记,又有随笔,甚至还有一些剧本和诗的内容。但我认为,这种“杂糅”其实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墨白用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体裁的限制,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叙述维度。旅游文学,不应该只是看看山

水、抒发点情感,还应该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让人思考,甚至重新认识文化。墨白的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让我们看到,旅游文学其实可以更深刻,可以书写出更有文化和思想深度的内容。

刘海燕(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这部新作从内容到装帧设计,包括插图和色彩,无不洋溢着作家墨白一贯的精神气质。就文体而言,它是一种无法简单归类的新文体,呈现了少见的创造性。第一章《洛克的目光》很有创意,它让我思考该书的设计理念:作者究竟希望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什么?我感到,作者不仅是在记录洛克的生平与他在青藏高原上的足迹,更是在努力追寻洛克精神生活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洛克的精神气质与作家墨白自身的

收稿日期:2025-01-1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主题小说研究”(2023BWX021)

作者简介: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文性与延续性。书中有些小说化的笔法,这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可以说,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深刻的精神互文性。

李勇军(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评论家):作为编辑,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作家和编辑的共鸣,可以说,这本书是作家和编辑共同完成的一个了不起的文本。我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图文并茂,书中既有墨白本人的摄影作品,也有专业摄影家的作品,图片已经成为此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让我看到墨白真正走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是一部打通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书,并且,它还是一部关注民生的书,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游记,作家墨白真正走入了当地生活,并进行了深度表达。

奚同发(《河南工人日报》总编辑助理、小说家):几年前,我在一个讲座上听墨白讲述去青藏高原的经历,我知道他最终会将这些经历付诸文字,但是看到这本书所采用的形式,我很吃惊。我们知道,墨白一直在探讨“怎么写”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根本不担心“写什么”。

墨白曾和我聊起过1976年他在驻马店当搬运工人在山上打石头的经历,他说还没敢动这个生活库藏,实际上就是他还没想明白应该怎么写这些。所以说,他每次面对一个题材时,“怎么写”是他非常重视的问题。每次写作,他都会打破自己以往的标准,这是他坚持的写作准则。

在这个文本里,可以看出墨白非常缜密的逻辑。如第一部分,实际上他提出了创作中的三个问题,最后的问题归结于写作的灵魂上,就是一个文本最后它的灵魂在哪,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所有题材处理,包括“寻找”“行走”“书信”和“电视剧本”,都是在寻找写作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是切肤之感——一个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完成自己的切肤之感,没有达到自我身心无法忍受的痛点,就没有办法写出让别人感同身受的作品。

墨白的文本前后相互印证,这实际上是一种古汉语中的互文手法。他在后面的章节对前面做了许多补充,拓展到一些涉及神经末梢的内容。如果没有后面这部分内容,这个文本可能就只是一个行走性的文本,这在当下是不缺的。正是因为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存在,才让整个文本呈现出独有的风格——一个独属于墨白的新文本,一个作家关于自我文本的“探索之旅”。

张冬云(《河南日报》资深记者):这部书的写作风格,看似松弛、散漫,却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情涌动。它的结构、语言和思维都让人耳目一新,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松弛感”非常强。这种风格,让我回想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阅读《长袜子皮皮》和《绿山墙的安妮》的体验。因为太喜欢,总担心会很快看完。这是一部让我想反复阅读的好作品。

赵炜(郑州大学教授、散文家):这是一本珍贵的写作教科书。无论是对探险家洛克的书写、对普通藏民的群体描述,还是关于音乐与小说的通信,亦抑或是那些带着生命体温的影像记录,都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对小说写作的灵魂、结构等的思考与经验之谈,对我的写作很有启发。

郑积梅(《郑州师范教育》社科室主任、副教授):在书中,墨白有多重身份——旅行者、画家、音乐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旅行、音乐、绘画、文学的属性与功能,在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上得以融会贯通。对“写作”的理解,在书中不断扩展:历史、回忆、县志、神话、传说、对联等融为一体,充满多声部的元素,勾连起不同阶层的人群,展示出当代个体所面对的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接,为“写作”赋予了新的活力。

郭海荣(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在阅读这本新作时,我深切感受到墨白的写作自信,这种自信使他能够突破传统文体的束缚,展现出一种信马由缰的自由,体现出对文体界限的跨越能力。他通过一种内在的力量,将诗性与叙述、叙述与议论、议论与抒情等有机融合,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文体风格。墨白对文体的大胆尝试,让我们在面对他的作品时感到难以界定其归属。这本书大胆借用了小说、诗歌乃至音乐等艺术手段和要素,拓展了当代散文的写作空间。

彭进(《大河诗歌》执行主编、青年评论家):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第一是丰富性,这本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动物学、民俗学、心理学、音乐学、绘画学等多个领域,呈现出作家的博学多识和目光的深远独到。第二是深刻性,虽然出版社把这本书归类为游记,但从文体特性上看,它更属于文化散文。与常见的文化散文相比,这本书不够通俗,更显小众、精英化,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第三是先锋性,这本书也是墨白进行文本探索的一个成果。墨白不只是写了一部作品,而是把自己如何发现素材、如何构思、如何成篇等创作过

程呈现了出来。

潘磊(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这本书让我想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传统。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作家写游记,比如朱自清和郁达夫的游记,更多凸显作家的文化底蕴与人格修养,有很深厚的文化色彩。还有张承志的《牧人笔记》,带有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色彩。墨白的书,也有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色彩,还有类似于民族志的内容。我特别喜欢第三部分,就是墨白和青年人的通信,其中的语言非常真诚,特别打动人。

段玉亭(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这本书呈现出文字与图片、视频、影视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媒介间的相互作用,使墨白的作品不再局限于文学层面,还可以在更广阔的艺术和传播空间中找到立足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进行严格的界定。真正的好作品是超越文体界限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文体内部也体现为多样的渗透性,比如在小说化的书写中,多耐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手法。在县残联工作的女性多耐,积德行善,不求回报,藏民们则通过为她祈福来表达善意。这种双向奔赴的爱,在墨白的笔下被表现得十分生动。从文学手法上来看,完全可以采用分析小说的方式,来探讨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视野

冯杰:我和墨白一起去过西藏,曾在一个小店和一位喇嘛一起吃过糌粑。喇嘛认为,糌粑是天下最好的食物。我就问他:“你去过郑州吗?去过成都吗?”他说没有,他只生活在这里。对喇嘛来说,这里就是他全部的世界。但对作家来说,仅仅停留在本土书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去开拓属于自己的“飞地”,去寻找更远的文学世界。墨白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仅为写作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这本书里写到我国影像人类学大师庄学本,这让我想起研究纳西民族文化的河南人李霖灿。他们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墨白的这本书,也用文字为当地风俗、文化做了深入的注解,为后人研究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珍贵的记录。

饶丹华(《南腔北调》主编):墨白的新书,让我想起当年苏轼和苏辙离开四川眉山前往开封的旅程,如果没有诗词相伴,他们的旅途该是多么寂寞。在某种意义上,墨白的这本书,也为我们今后的旅途

提供一种相伴的文本。有这样具有很高艺术思想价值的书相伴,我们的旅途一定不会寂寞,并能从中获得启发。

奚同发:墨白之前的写作以颍河镇为中心,已经形成一种标签。但是这一次完全是“心灵放飞之旅”,他想超越自己以往的题材。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去青藏高原都是一次艰难的孤旅。青藏高原太辽阔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我们截然不同。我经常感到青藏高原是和我们人类灵魂并行的另一类灵魂的世界。

陈泽来(《郑州晚报》《郑风》副刊主编):通过阅读,我们随着墨白一起看到他所见识的青藏高原上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他用镜头捕捉到的群山河流、雪域冰川,甚至青藏高原上的每一阵风,这些都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内心和情感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一个人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他看待事物的高度,是什么样的人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事物,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所见,都是自我心灵的映照。

郑积梅:当我们提及青藏高原时,首先想到什么?是牦牛和格桑花等富有特色的动植物?是冰川流云等所提供的奇异视觉经验?还是酥油茶等带来的味觉体验?……墨白用心感悟去高原之路上的温暖、寒冷和痛苦,在温情的述说中呈现出人性的善与恶、生存的悲与喜、日子的常与变,构建出青藏高原独具特色的“地方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命运的具象”。这种种印象、感觉与认知,是墨白以“地方”为契机观照人类的总体命运。

墨白将自然地理、人文传统、风俗习惯所构成的“地方性格”,敏锐、准确地呈现出来。青藏高原上的一切——当地居民、民歌、信众等,都深深地吸引着墨白;牛粪墙、东巴纸的造纸过程、银饰的制作、随处可见的五彩经幡、秃鹫与天葬台、党项古道、红军旧址、《格萨尔》的传唱、德昂乡的扶贫、康巴汉子等等,是墨白在创作中对“地方发现”的运用。这些藏区特有的风物与人文景观构成一种强烈的“地方感”。

郭海荣:学者刘大先曾提出“文学边缘扬起”的观点,大意是21世纪以来,原先处于文学话语“中心”之外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使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个节点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构成,一方面是边地作家积极参与当代写作,另一方面是内地作家寻找精神原乡的需求。因为在后工业化时代,内地作

家很难在本地找到精神的童年,所以转向边地寻找。

除去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吸引,墨白的目光为什么转向青藏高原?

墨白以前的目光集中在颍河镇,这是他写作的出发点。我觉得青藏高原更像是墨白的一个精神原乡,颍河镇和青藏高原共同构成了墨白精神的两极。青藏高原,超出内地的日常秩序,契合人性的自由和生命的返璞归真。墨白对青藏高原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的细腻考察,让读者感受到他对世界真切的热爱,他启示我们如何抵达远方,扩大生命体验,以及如何与世界连接。

三、叙事

刘海燕:在《洛克的目光》一章里,墨白安排了《寻找小说的灵魂》《关于结构故事的能力》和《艺术的真实性》等节,表面上是在探讨小说艺术的形式,实际上是通过“在场”的方式,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叙事聚焦点。同一地点,在不同的时段,是怎样的情形?从洛克的视角,到藏区居民的叙述,再到墨白自身的感受,所有这些融合成一种宏大的时空视野。这种叙述不仅凝聚了无数细节,也形成一种精神气质的聚焦。墨白能将厚重的历史与繁杂的素材梳理出清晰、具有内在逻辑的脉络,这不仅有赖于艺术形式,更有赖于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将历史、现实、个人经验与思想融为一体,把读者的目光牵引到更深远的境地。所以说,如果将此书定义为游记的话,我觉得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游记的形式,它更属于精神层面上的叙事。

张冬云:这本书写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脱贫攻坚。这个题材本身很宏大,但墨白却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来讲述,让读者觉得格外亲切。他将那些原本可能有距离感的内容,用随性、散漫但又不失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他在书中提到自己和藏族百姓聊天的场景,那些对话特别接地气,聊到对方的家庭、孩子、生活,就像朋友之间的自然对话。这样的叙述方式,既体现了他个人的写作风格,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人格的感染力。在书中,墨白展现了一种“创造自己的时间”的能力,他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中,随性中激情涌动,回望过去却从中看到了未来。

郑和梅:这本书既是身心旅游,也是文化漫游。一些历史典故,作者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尤其知识性的内容就像广袤草原上雨后的蘑菇,东一朵西一朵,作者博古通今,其丰富的知识积累让人叹为观

止。文中很多文献,尤其是具体数据的使用,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和藏地生活的备忘录。我特别注意到墨白把行程笔记引入作品中,身处的时间、地点、航班班次、写作的具体分钟、入住酒店的房间号等详细标识,这样的细节处理,使叙述显得更真实可信。我认为,这既是行程,也是作家墨白的生命轨迹,也为以后的墨白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郭海荣:书名《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通往”表明方向,“青藏高原”是目的地,“道路”则指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三者的关系可以延展到现实、精神与文学之间的连接。结合全书内容,书中呈现出三重“通往”的层次:现实中的道路,精神上的通往,以及文字上的抵达。在当代文学里,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特的意象,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青藏高原的地域地貌、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共同构成了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青藏高原独有的气质和韵味,使其成为不少作家采风、写作的重要主题。青藏高原的“人神共处、圣俗同构”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结构,天然带有一种吸引力,使得关于青藏高原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神秘感和精神上的朝圣感。

潘磊:我读过墨白的很多小说,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带着一种研究者的兴趣去看墨白谈自己的创作,包括音乐和创作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一句话,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情绪的表达是现代小说所追求的。”我就想到墨白的先锋小说创作,其实他就是在追求或者说传达一种情绪。

段玉亭:我注意到第二部分和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小说的文体有某种奇妙的联系。书中有一些类似章回体小说的特质,每一章节的结尾往往会引出下一章节的内容,形成一种连贯性,像传统说书艺术中的“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更是一种对古代文体或文艺形式的现代化传承。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释的运用。墨白作品里的注释,和我们常见的学术论文中的注释不同,它不仅仅是对内容的注释,更是文体的跨越或融合。这些注释,让作品兼具地方志、博物志、山川志、地理志的效果,既显得严谨,又有现代科普的特质。通过注释,作者向读者科普了许多历史、地理、自然、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山川地理方面的内容。墨白对细节的书写,也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他对分离酥油、挤牦牛奶等生活场景的描写。这种细致入微、不厌

其烦的细节描写,源于墨白对生活的深刻热爱,以及对细微之处的敏锐观察。这种书写细节的能力,让他的文字充满了真实感和温度。

四、主题

刘海燕:我和墨白先生认识多年,墨白给我的感觉是他在每个年龄段都在创造一种生活,始终是一位精神生活的坚持者和引领者。我深感,我的同时代人很多已经被生活的琐碎和现实的平庸磨得毫无个性,我从他们身上已经看到了无趣和衰老,而每次见到50后的墨白,他总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激情,生命的活力和行动力,思想表达的自由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命的激情与创造力,太重要了。这也体现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的观察与反思,将这些碎片化的材料整合进他的精神世界,并赋予其独特的意义。这本书就像一条通往青藏高原的精神之路,引领读者走向更高远的思想与艺术境界。

赵炜:这是一本敬畏之书:敬畏青藏高原,敬畏音乐,敬畏生灵。跟着墨白的目光,我们看到了探险家洛克、向导李大哥、画版画的陈师傅、铜匠李师傅、藏族司机此里定主、登山队员斯那次里、僧人和朝圣者等。他们有着洁净的心灵、坚韧的意志力,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努力实现生命的超拔。还有对音乐的敬畏,墨白在书中通过对自己喜欢的戏曲(如豫剧)、民歌、外国经典名曲,以及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人生经历的描述,让我们更深地体悟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还有,墨白通过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讲述,表达对高原生灵的敬畏。

奚同发:墨白的创作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他的内心极其强大,作品也因此充满力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自己都没有力量,怎么可能写出有力量的作品?内在的精神世界决定了文字的深度和张力,这一点在墨白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他的作品充满了思考和探索。从他最初的作品开始,我几乎一路跟随,也多次与他对话、访谈。我用“寻找”来形容墨白的整体创作,因为他从不停下自己的脚步和内心的追寻,无论是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还是随笔和散文,始终都是“在路上”。他的作品无论是文本还是人物,都能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刷新我们的观念和认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从未停止。

我们通过墨白在行文中不断地反省、认知与寻找,能感受到他对每个人的尊重,无论是挑水的女人

还是导游,摄影家还是不幸罹患脑瘫的小孩,在墨白的笔下都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在文本中存有一席之地。这部作品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家庭、爱情、历史、政治、社会大环境、自然环境,甚至还写到很多鸟禽兽类。墨白通过这些来拷问内心,拷问历史和我们当下的存在,因此,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作家的“自我心灵拷问之旅”。

陈霖东(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在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上,墨白始终不忘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他看到的许多细节都勾起了他的创作欲望,让人感受到墨白对小说的挚爱与热忱,这也是本书带给我的强烈感受。

郑和梅:墨白笔下对爱与慈悲的张扬,呈现为他对藏地人与物乃至全世界万事万物的体恤。墨白的爱与慈悲指涉的是辽阔的天地万物,哪怕一只鸟、一朵花、一片云,或者是回响在天地之中的转经声,在墨白这里,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让人读得热泪盈眶。

张向辉(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副教授):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墨白在作品里面所描述的生活,其实就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我曾经做过关于黄河文化研究的课题,墨白作品里关于黄河的印象、黄河边上的居民、黄河漂流探险及黄河边上的德昂乡等等,都让我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在说黄河文化的时候,一般都和过去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但墨白的作品展现了黄河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

郭海荣:在现实层面,作品中对实际行程的描写尤为突出,在《天果落、地果落》一章,田野资料被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文本,保持了较高的客观性。这一部分文字朴素,但不失文学的韵味。作品的写作重点在于展现青藏高原牧区在现代性与全球化中的剧变。墨白从畜牧经济、医疗、语言、文化等多个维度,展现了这个群体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牧区在现代经济影响下,被动却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当然,其中也可能存在主动因素。畜牧生产经营更加理性,包括传统的婚姻、语言、饮食等方面,墨白的文字呈现了一个逐渐消解的过程,这也从侧面展现了全球化和现代性对牧区的冲击,同时也展现了牧民强大的适应能力。作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婚姻家庭等方面,来展示地方群象的社会生活模式,展示藏区社会的过去和当下。他记录的不仅是藏地的风景,也是对自己幼时农业景象的一种怀念。

五、问答

在问答环节,墨白回答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王雨晴、万方、黄乐为、祁同悦的提问——关于创作中民间文化的运用、在青藏高原上最铭心的瞬间、理论与小说写作实践、如何发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墨白答道,民俗就隐含在我们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就体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习惯、饮食、穿戴、语言的表达等等,都包含着民俗的成分。比如我们生活中的红白喜事里的许多习俗都可以追溯到《周礼》。周代的很多礼仪制度,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成为我们的民俗文化。

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无数瞬间组成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叙事建立在当下这一刻,瞬间是其叙事核心,所有叙事都围绕当下展开。如果问哪个瞬间感动我了,我觉得生活中每一个瞬间都可能会感动我,由此转化成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

注重当下。我前几天看蔡志忠的一个谈话视频,他说:“哪里是天堂?此时此刻的当下,就是天堂。”他强调当下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生命呈现的形式,就在当下这一刻。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部长篇由54个故事构成,分为方块、红桃、梅花和黑桃四个部分,每部分13个故事。其中《◆高原》部分写的就是青藏高原。

我们阅读,就是为了找到一把认识生活和书写生活的钥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之中,而我们缺少的是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同样,你想了解一个地方的现实,你只有到那个地方去,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现实。就像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然后才是书写与表达。同学们的这些话题都非常宏大,如果有时间,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o the Spiritual Heights

—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Road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by Mo Bai

LIU Hongzhi, MA 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oad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a collection of Mobai's literary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Eyes of Locke* describes the journey from Yunnan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ianguoluo*, *Digoluo* writes the journey from Qinghai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 Journey Awakened by Music* is a record of the journey from Sichuan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ld Animals in Sanjiangyuan* is a documentary script that portrays a “Kangba man” who loves photography and cherishes the Tibetan area of Amdo in the plateau by virtual storytelling. Experts at the meeting discussed its “style”, “vision”, “narrative” and “theme”, and agreed that: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seems to be loose but is carefully structured, demonstrating an ice-breaking innovation in style; The book, with a spiritual power that runs through it, is an exploration to spiritual heights.

Key words: Qinghai-Tibet Plateau; Mo Bai; text

“他者”的旅行

——凌叔华《古韵》跨文化书写中的性别叙事

刘一昕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古韵》(Ancient Melodies)是凌叔华跨文化写作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名女性作者,凌叔华游走于中英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寻找着自我真实性的印证,同时自觉融入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于此想象现代中国的期待视野。总体而言,《古韵》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于东方古老文明的异邦想象,成就了作者对于跨文化理想的自我追怀,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凌叔华作为一名现代中国女性的自觉意识和世界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古韵》也反映出作者在创作时受到西方中心话语的制约,以及在这种制约下如何通过文字/图像叙事策略与之进行性别身份协商。

关键词:凌叔华;《古韵》;跨文化写作;性别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14-06

凌叔华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偏居“婉顺”闺秀一隅,她笔下的人物,曾被鲁迅盛赞为“高门巨族的精魂”^{[1]258},但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亦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古韵》(Ancient Melodies)是凌叔华跨文化写作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写于1938年至1952年间,最终由英国伦敦何盖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于1953年出版。虽然这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凌叔华的自传,但经笔者研究发现,“自传”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事件有许多细微的改编和虚构的情节。凌叔华作为身处中英两种文化边缘地带的一名第三世界女性作者,她是如何在尽力满足异国接受者对于古老中国的想象的同时,又印证着自我性别身份的真实性?在这个过程中,她是否只是作为沉默的“他者”而存在?

一、一位现代中国女性的跨文化之旅

凌叔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家庭,这个家庭

同时也是书画世家,她的写作风格经常被认为和她的成长环境及经历息息相关。她的父亲凌福彭曾任清朝户部主事等职,精于辞章、酷爱绘画,在京城组织过“北京画会”;她的亲生母亲是凌福彭的第四任妻子,尽管母亲在家中受到丈夫的冷落,但女儿凌叔华却是凌福彭最钟爱的子女之一,父亲也颇为重视凌叔华的传统书画教育。凌叔华曾前往日本深造,专门研习日本作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人的文学作品及一系列日本绘画艺术。但与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比较而言,凌叔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实践更主要的是受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未曾谋面的“文学导师”是曼殊斐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与曼殊斐尔的交集得益于当时结识的好友徐志摩及恋人陈西滢,他们二人都是曼殊斐尔作品的中文译者。凌叔华还被徐志摩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尔”。至于她和伍尔夫的交往,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结缘,则主要源于一位英国绅士——朱利安·贝尔。贝尔是伍尔夫的

收稿日期:2025-01-2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话语与文学生产的互动关系研究”(1243300002)

作者简介:刘一昕(1992—),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外甥,当时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与贝尔随后在武汉相识、相爱,并曾进行合作翻译,这些体验都为凌叔华后来创作《古韵》奠定了基础。

凌叔华在此阶段的文学作品展示了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既不拘泥于传统的礼仪,又没有完全受西方较为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在评述她时,一方面认为她笔下“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而另一方面也用“谨慎”和“适可而止”来形容她在面对中国家庭问题及处理女性困境时所采取的温婉态度^{[1]258}。凌叔华的小说充分展现出她对于个性解放和女性独立的渴望,但也表达出她对于女性如何在社会中获得更大自由的焦虑与疑虑。从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来看,凌叔华的作品既感性又不失谨慎。这一特点在《古韵》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

《古韵》的创作是凌叔华跨文化之旅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也是她作为中国现代女作家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凌叔华通过朱利安·贝尔结识伍尔夫后,便一直和伍尔夫保持书信往来。与贝尔的爱恋经历以及和伍尔夫的书信往来,最终成为凌叔华创作《古韵》的缘起。更为重要的是,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凌叔华产生了深刻影响,她曾表示自己十分欣赏伍尔夫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这无形中也影响着她的文学实践。《古韵》的创作主要源自伍尔夫的鼓励和指导,所以从一开始,《古韵》的目标读者除普通意义上的英语读者外,还有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

但是,伍尔夫的原始期待是想看到这位女作家撰写一部完全的自传。1938年4月9日伍尔夫致凌叔华的信中写道:“我所要说的唯一重要的事,是请你撰写你的自传,我将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改……朱利安常说,你的生活极为有趣;你还说过,他请求你把它写下来——简简单单,一五一十写下来,完全不必推敲语法。”^[3]目前很多学者依然将这部作品视为凌叔华的自传,但根据笔者考究,在这本“自传”中有关作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相关真实历史事件有多处改动,并存在大量的虚构成分。因此,在笔者看来,《古韵》更适合在“自传体小说”的语境中被加以讨论。

在1938年到1939年间,凌叔华陆续给伍尔夫寄去八篇左右的初稿。但此后不久,她们之间的通信因伍尔夫的突然自杀而停止。随着抗日战争战局的扩大,《古韵》的写作也被迫中断。1946年凌叔华迁居伦敦,她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真正实现了现实中的交流与对话,书稿得以继续完成。《古韵》最

终由伍尔夫生前与其丈夫伦纳德共同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于1953年付梓出版,获得英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片好评。英国开放的文学环境使这种很有可能被我们视作边缘文学的作品受到极大欢迎,伍尔夫生前对凌叔华的帮助也令世人看到两位现代女作家之间基于女性情谊的惺惺相惜。从东方到西方,凌叔华作为一位在异国漂泊的中国女性,为她的《古韵》打上了独特而珍贵的跨文化烙印。更重要的是,她在跨文化写作中表现出一名现代中国女性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先锋的世界意识,这也是她跨文化写作得以成就的前提。

二、从此岸到彼岸: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觉醒

现代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并非西方文化传播或者中国本土文化单方面因素所能决定,而往往是在中西方的互动与对话中产生,这也是超越个人意志的众多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所致。^[4]《古韵》的跨文化性,不仅体现在地域文化的跨越,还体现在现代知识女性突出的性别意识表现上。凌叔华的小说始终围绕女性问题展开,《古韵》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古韵》所聚焦的女性并非凌叔华以往常塑造的闺阁女性形象,而是首次将视角投向了封建传统家庭中有关姨太太们为人处事的日常生活,这是一次开放的女性自我日常表达的尝试,也是一次对女性自我身份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实践。

《古韵》中,家庭女性人物之间的竞争始终围绕着一位男性——“我”的父亲^[5]。在这个封建传统的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地位差距明显,女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紧张。大妈早早离开人世,二妈极力想要掌握财富,四妈则毫不在意这些利益,只是负责调停;五妈虽然性格坚强,但仍受到二妈的欺压;尖锐的六妈则被二妈拉拢,最终生下了孩子。凌叔华通过她的作品生动展现了中国封建传统家庭中姨太太们在经济利益面前的争吵,以及在脆弱时期的互相支持。凌叔华将家庭女性成员之间的利益之争与争风吃醋赤裸裸地展示给英国读者。

在《古韵》开篇《穿红衣服的人》这一章中,凌叔华对家庭成员作了详细介绍与描绘。父亲任直隶布政使,在当地具有较大权势,在家中深受子女们的崇敬。父亲的姨太太不少,姨太太的孩子也众多。“我”身为女儿,最初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我”的绘画天赋让“我”在众多子女中“脱颖而出”,于是在父亲那里得到宠爱。作者在此明显传递出对父亲的“妻妾成群”“重男轻女”观念的不满情绪。凌叔华的生母李若兰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旧女子,在《母亲

的婚姻》一章中,“我”专门介绍母亲的身世,同时叙述母亲当初选择嫁给父亲的来龙去脉。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时不小心走丢,后被卖到富贵人家做养女,嫁给父亲之前,她以为自己将会是家里的二太太,实则已是第四任太太。在这个妻妾众多的封建大家庭中,天然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母亲的生存十分艰辛。李若兰一直没有生出儿子,这让她既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在家中又不得不隐忍受气。凌叔华在《中秋节》一章中描绘到:生“我”的那天仅有四个人知道,一个是随身服侍的张妈,一个是老门房王森,再就是妈妈和接生婆了。家里其他人并没有关注此事,直到第三天接生婆来道喜讨钱的时候,家里才知道又添了一个女儿。由此看出,这个封建大家庭中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格外浓厚。中秋节这天在园子里扮家家做月饼这件事,将整个故事情节推向高潮。桃花是三妈的丫鬟,她在中秋节这一天大闹现场,而原因则是她没被邀请一起做月饼。桃花不仅将月饼都砸到了地上,还命人撤了大家使用的桌椅。桃花作为一个丫鬟之所以能如此嚣张跋扈,就是因为三妈生了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而桃花又是三妈身边的丫头,自然觉得自己地位也高。这清晰反映出“母凭子贵”这一连锁效应。到了第五章《一件喜事》中,作者娓娓道来父亲纳妾迎娶“新妈”的事。从题目本身,就可以看出其反讽性。对于女人来说,结婚本是件高兴的事,但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需要承受“一夫多妻”,女性没有自我独立意识,更无力抗争,只能逆来顺受。父亲娶六姨太太入门当天,五娘只是不作声地叹了口气,对“我”说:“我只想死,死了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她们而言,死亡也许是唯一的解脱与归宿。父亲纳妾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但当其与故事所透露的父权制婚姻中女性他者的悲剧命运之间完全是相反的调性,也就自然形成一种反讽性张力。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作为“他者”始终具有悲剧性,而她们也无力对父权制度予以反抗。作者的意图是用表面上的喜事来反衬故事潜在的悲剧性,从而对父权制予以强烈抨击。凌叔华不仅通过代表东方话语体系来向西方世界表达私人情绪,也代表着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生存所进行的一种性别叙事与“他者”表述。

从对闺秀女性婉转的嘲讽到对旧秩序下女性被压迫的深刻思考,凌叔华的转变是明显而深刻的,这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当时民国女性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且认可的新思想。凌叔华非常认同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关于女性主义的思想。帕特里卡·劳伦斯同样肯定了伍尔夫的女

性主义思想对凌叔华的影响。但是,凌叔华的女性意识在学者史书美看来是明显西方化的女性主义,同时,史书美也认为凌叔华在写《古韵》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女性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与伍尔夫的不平等关系所决定的。一种文化形态对另一种文化形态进行渗透性影响的同时,势必会伴随一定程度的倾轧。而这正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古韵》在跨文化语境下所受到的身份制约问题。

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制约与性别协商

凌叔华在完成《古韵》第一章后,便寄给了远在伦敦的伍尔夫。伍尔夫阅读后,很快给凌叔华回了一封信:

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当然,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一开始有点难,行文有些不连贯。我不太清楚这些太太之间的区分,她们是谁,又是谁在说话。但再读一段时间就开始逐渐清楚了,我发现了许多不寻常的魅力。我发现了许多奇特的诗意的比喻。虽然我还不太清楚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所解读,但我能够做的就是鼓励你寄给我更多的章节。毕竟,这一章只是一个片段,到那时便能对你的作品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请继续写作下去,自由地写作,不要担心你英文中的中国味道。事实上,我建议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蕴上都写得更加中国一点儿。写一些生活的自然细节,比如喜欢的房子、家居等等。写你想写的,就像在给中国读者写作那样。然后,再用英文文法润润色,我想一定可以保持中国味道,使英国人对文章既能够理解又保有新鲜感。^{[6]389}

从情感角度讲,伍尔夫给予凌叔华的回信本意出于一位师者的指导与一位朋友的善意鼓励。但必须承认的是,伍尔夫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她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于一位中国女性作者的“特殊”要求,即表现出“新奇”与“中国味道”。史书美认为,伍尔夫“在西方凝视下异化自己”的提案明显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将东方文化视为异己的做法,且这种赞赏和鼓励的语气中暗藏着一种攻击性的意味。

凌叔华在回信中表示她欣然接受这些建议,随即她在内容方面增加了许多关于日常饮食习惯、传统服饰特点、节日习俗、房屋建筑等细节。比如在《母亲的婚姻》《一件喜事》和《两个婚礼》等的章节

中,她从各种角度来展现中国传统的婚嫁文化,从新郎的着装、仪式的布置、餐点的搭配到祠堂的布置,将众多细节一一展开,以满足异国目标读者的需求。在《古韵》的开篇章节中,有一段对其所居住的四合院的描述:“现在没有人能告诉我它到底有多少个房间或院子,但我记得小孩子独自从自己的院子里走出来时,经常会迷失方向。”这个传统古朴的四合院,充满神秘的异域氛围。到了《古韵》的末尾,作者又描述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我”对北京的怀念:“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这段描写俨然一幅异国游子思乡的场景,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古老中国的镜像,这正契合西方对于东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想象。除此之外,凌叔华在《古韵》原文中还使用一些脚注,来解释和中国有关的成语俚语、风俗地理等,这可以被视为作者对于伍尔夫建议的积极回应,以满足读者对异国情调的喜好与“窥探”。由此观之,作者的隐含读者明显不属于中国本土。多年后,中文译者在译本中直接省略了这些脚注。

凌叔华选择接受“自传”作为写作体裁,显然暗含某种迎合之意。之前,她已经在中国文学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古韵》中她首次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与以往的中文小说大不相同。自传体写作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既不常见又不受重视,相反,英国一直有自传文学传统。伍尔夫曾告诉凌叔华,她觉得“自传比小说好得多”,并且她寄给凌叔华一些传记书籍,建议凌叔华从英国传统文学开始学习。虽然此前凌叔华在国内发表过一些小说,但她从来没有写过传记类作品。这与凌叔华惯常的写作方法不同,这种写作既符合英国自传体写作的文学传统,也符合英语读者的期望,裹挟着一种轻微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但是,从最终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文体的选择,的确有利于跨文化环境中的凌叔华对自我及其成长的文化环境进行新的发掘。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到,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自传进行写作,而是存在多处虚构的成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自传体小说”的诞生也恰恰说明了凌叔华的某种“反叛”。

《古韵》出版后,引起英国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反响热烈,除了评论的要点“新奇感”与“异国味”,作品中极具中国意蕴的插画也为其增光添彩,令这位东方女性作者的文化审美受到更广泛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古韵》中所有的插画均为凌叔华亲笔创作。相比较文字叙事,图像叙事对读者而言往往会形成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凌叔华为部分章节以水墨白描画的形式画了八幅插图,这些插图总体来看都是关于“我”的童年生活。那么,凌叔华的这些绘画作品难道只是为了完成《古韵》的插图?对于她这次重要的跨文化文学创作,这些绘画产生了什么实际效用?

1953年,凌叔华选择自己在第十四章《义父义母》中所作的插图,作为英文首版的封面,在该章节中插图取名《碰上好天气,义母便带我出门放风筝》。正如米切尔所言,图书的封面往往作为一种媒介,或者说这是“一张由文化代码组成的巨大网络”^[7]而存在。《古韵》标题设计的字角顿笔看起来更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抑扬顿挫,其明显和西方罗马体碑刻的上下粗细一致的特点完全不同,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了哥特式字体的装饰性,极具生动之感。标题右下方署名“Su Hua”中的“S”飞白特征明显,与其他字母虚实相生,上扬的衬线仿佛中国毛笔书写,可谓清逸秀丽,让观者在视觉上强烈感受到东方线条的形式美,可以明显从封面看出该书的地域归属及文化符码所在。除了封面的东方文化特色,在《义父义母》这篇文章中,凌叔华也专门刻画了“义母”的形象,这也是这部自传体小说所描绘的为数不多的“我”与女性长辈的亲密接触——既不是与她的亲生母亲之间,也不是与其他的太太之间,而是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妻子。这也从侧面呈现了凌叔华和那个封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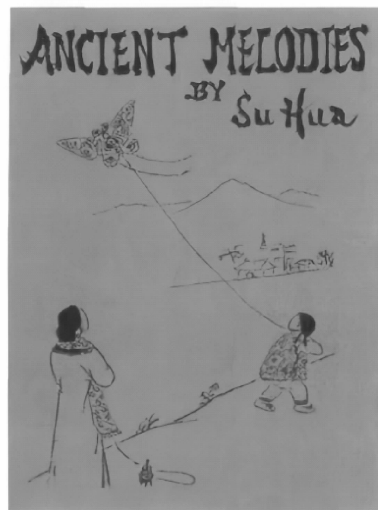


图1 《古韵》英文首版封面

风筝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古韵》封面中蝴蝶形状的风筝随风飘动,与小女孩衣服的蝴蝶纹饰遥相呼应,在其父母的静态观望下,形成动静相宜的画面。整幅画采用极具中国特色的自然主义景观表达方式,在传统中国文人画宁静致远的形式美感中,展现了当时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传递出中国式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感知和思考。在这种不对等的文化语境下,表现出作者明显的个人态度。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国文人画风格,实际符合自18世纪以来,尤其是中英开始经济文化交往后,英国人对于中国意象的构想。例如:“几乎每座宏伟的英式宅院都有中式房间或有‘中国式的奇彭代尔(Chippendale)’家具。中国图案中的借用——宝塔、蝴蝶、孔雀、龙、竹、蛇、金鱼和鲜花更是随处可见。”^{[6]389}该封面对于崇尚自然生态和以人物为画面中心的西方绘画来说,是一种友好的姿态。插画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基本选择白描、线绘的方式,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典型形式之一;采用了简洁自然的绘画风格,呈现出宁静祥和的日常状态。

在《古韵》的每一幅插图中,凌叔华都保留了中国传统人物山水画的精髓,但又不失内在的突破。这种绘画风格似乎也和她的叙事风格产生了相似的意境效果。在封面之外的其他插画中,同样能看出作者在运用传统风格和技法绘画时,保留了其相对包容的个人态度。魏淑凌曾说:“她画的还是中国式的山水,虽然画中的雾和帆船经常都是英国的。”^[8]

凌叔华的八幅插图基本以“我”为画面中心,营造出强烈的个人意识氛围,从而突出“我”的主体身份。插图看似采用中国传统画风格,但更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艺术理念。在图画的人物形象设计上,幼年的“我”,无论是在一旁欣赏父亲练字,和义母一起放风筝,旁观姨太太们之间的争斗,还是跟着贾先生认真读诗,始终处于画面中心。“我”在每一幅插图中身着不同服饰,衣服上的纹路样式也各不相同,由此可见画者的用心。除了在人物设计上独具匠心,凌叔华对周围环境的描绘同样颇为用心。值得一提的是,“水仙”作为一个植物意象,频繁出现在多幅插画中。在《五妈来帮妈梳头》里,画面最前方的石桌上,摆放着水仙花;《我们北平的家》描绘了水仙花的风姿;《老周带我去隆福寺》的卖花场景里,水仙花也赫然在列。此外,在《戴黄草帽的人弯腰在田里劳作》中,劳作的人被比喻成“一片黄水仙花”,画面里走在桥上的小女孩,手中还拿着一株水仙花。在古希腊神话里,水仙花象征着自恋,弗洛

伊德也将其视作“自恋”的一种表征。凌叔华对水仙花的喜爱,暗示着她对自我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她的“自恋”及“自我欣赏”的倾向^[9]。



图2 《古韵》内文插图

在《古韵》一书中,读者见证了凌叔华这位置身于中英文化边缘地带的中国现代女性,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是如何努力平衡地域差异造成的身份制约的。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写作体裁的选择,还是插图艺术的运用,都是凌叔华应对文化失衡困境的巧妙叙事策略。通过这些叙事策略,作家凌叔华彰显了自身的创作主体性,在跨文化的文学版图上留下了独特印记。正如胡适所言:“与不同文明的接触会带来新的价值标准,用它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本土文化,则会自觉地重塑与新生,这是价值观念改变的自然结果。”^[10]这反映出跨文化互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难以用简单的“霸权”或“顺从”模式来阐释,背后蕴含着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深层逻辑。

四、结语

学者周蕾运用“良性交易”(virtuous transaction)理论阐释凌叔华的女性写作,在她看来,女作家一般会主动选择具有“女性气质”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既便于女作家轻松驾驭创作,也默认、接受了主流话语将女作家定位在“边缘”位置的现状。凌叔华的创作,表象上同样符合这一情形。但凌叔华别具一格,她借助“反讽”叙事技巧,悄然挑战这种霸权秩序。表面上,她融入父权制主导的写作规则,文本深处却不动声色地瓦解这一规则,实现对传统创作秩序的重构,最终形成别具一格的“良性交

易”^[11]模式,为女性文学创作开拓全新路径。

周蕾所说的这种“良性交易”,看似能恰如其分地阐释凌叔华的叙事形态,但实际上,仅停留在语言模式分析层面,并未深入挖掘作者创作背后的心理世界与思想脉络。笔者认为,凌叔华作品呈现出的“复调”特征,是跨文化复杂互动下自然形成的选择与平衡机制。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凌叔华游走于中英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在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时,她借助跨文化视角,完成对自我女性主体身份的探寻与认知。在《古韵》中,凌叔华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就性别议题与西方话语的限制展开协商。既满足西方读者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异域想象,也成就了作者对跨文化理想的自我追怀,更重要的是,彰显出凌叔华身处西方文化语境时,作为现代中国女性的自觉意识与世界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C]//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倪婷婷.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遇合:以《古韵》为考察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17(4):185.
- [3] 弗·伍尔夫致凌叔华的六封信[J].杨静远,译.外国文

学研究,1989(3):9.

- [4] REY CHOW.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 Minnesot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68.
- [5] 凌叔华.古韵[M].傅光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2.
- [6] 弗吉尼亚·伍尔夫致凌叔华(1938年10月15日)[C]//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 [7] W. J. T. 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1.
- [8] 魏淑凌.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3.
- [9] 郑蓓蓓.凌叔华《古韵》插图中的自我认知[J].艺术与设计,2016(5):35-40.
- [10]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83.
- [11] REY CHOW. Virtuous Transactions: A Reading of three Stories by Ling Shuhua [C]// Tani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90-1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Journey of the “Other”

— Gendered Narratives in Cross-cultural Writing of Ling Shuhua’s *Ancient Melodies*

LIU Yixin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ncient Melod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work in Ling Shuhua’s cross-cultural journey. As a third-world female author, Ling Shuhua travelled on the fringes of both Chinese and British cultures in search of her own authentic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ciously integrated herself in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in London, which imagined modern China. On the whole, *Ancient Melodies* satisfies the Western readers’ exotic imagination of ancient civilisation, fulfils the author’s own self-pursuing of cross-cultural ideals, and demonstrates Ling Shuhua’s self-aware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as a modern Chinese woman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to a certain extent, *Ancient Melodies* also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of Western-centred discourses on the author’s creation, and how she negotiates her gender identity under such constraints through textual/image-based narra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Ling Shuhua; *Ancient Melodies*; cross-cultural writing; gendered narratives

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任丙超¹, 杜思源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 人文艺术学部; 2. 管理学部政府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中,数据技术应用与知识流动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中国沪深A股2010—2023年的数据,剖析了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显著正相关,且知识流动起到了中介作用。数据技术借助提升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知识扩散能力,助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增长。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行业分组检验下的回归结果均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正向效用,显著高于同标准分组下的其他样本组。最后,提出持续推动数据技术应用、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采取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等建议,助力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稳步攀升。

关键词: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知识吸收;知识扩散;知识产权产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4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20-0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1],这预示着数字经济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我国中信研究院数据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53.6万亿元,同比增长3.7%。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力推动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形成共识。数据技术应用不但降低了知识产权产出的门槛与成本,而且令知识产权信息呈现出高效、低成本、易共享和易扩展的特征,使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更为丰富与便捷,促使企业对内部生产管理流程予以全面改造升级与结构优化。例如,部分地区推行的“数字化+知识产权服务”政务平台中涵盖企业数字化应用和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相关政策,诸如利用数字化赋能企业提高专利创造数量、专

利转化能力等。数据技术应用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加速了知识扩散,推动了知识信息在公众中的传播,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由此衍生出如下问题:数据技术应用能否促进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数据技术应用对知识流动有着怎样的影响?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与知识产权产出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一、文献综述

“数据技术”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Don Tapscott 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一书,此后,学术界围绕数据技术、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展开了深入的思索与探究。国家统计局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中,将数据技术划分到“三新”经济,指的是“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技术、新链条”。针对数字技术和创新的关系,学者们从多元维度切入进行研究。

数据技术应用给创新带来的影响呈现多维复合

收稿日期:2025-01-28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知识产权数据融合发展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42400411127);2024年度河南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项目“促进我省知识产权数据融合的政策研究”(20240106035)

作者简介:任丙超(1984—),男,河南濮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艺术学部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管理。

的态势:微观层面,当数据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及业务流程时,它宛如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能够助力企业实现转型,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优化企业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削减企业各项资源的浪费^[2]。再者,数据技术应用能够加速企业产品流向客户,增强企业产品的传播效能,倒逼企业对产品进行优化和创新^[3]。中观层面,数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扩散性与低成本优势,能在产业内迅速形成创新示范效应,驱使企业之间展开创新追赶,增进企业间的知识外溢,同时推动企业间创新技术的共享^[4]。宏观层面,数据技术应用将对企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必然催生出新模式、产品与业态,为企业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助力企业创新水平迈向新台阶^[5]。

知识产权产出是指企业获得知识产权的相关创新,涵盖技术、产品以及知识等方面,常见的成果表现形式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度量的研究,大体是从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发力。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产出成果数量是衡量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最为关键且行之有效的标尺,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商业秘密四个维度^[6]。还有学者从知识产权产出质量维度探寻计量指标,认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包括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品牌三个方面的内容^[7]。此外,学术界也关注了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驱动因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激励效果^[8]。在内部微观因素方面,企业人力资本,尤其是技术人才的配备将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水平^[9]。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从知识流动视角对数据技术与企业创新展开的研究相对匮乏,系统剖析数据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产出二者关系的文献也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结合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技术应用的特征,探究其对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并剖析知识流动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本文可能的贡献有:其一,借助实证研究,揭示数据技术应用对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影响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检验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因素作用下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为政府推动知识产权数据融合、企业积极运用数据技术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其二,验证知识流动在数据技术应用影响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进程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完善数据技术应用助力知识产权产出的内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产出关系假设

从数据技术特点的角度看,其可编辑性能够改

变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方式。同时,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调整数据技术的应用模式,这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活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和数据基础。数据技术的可扩展性特点有助于企业高效识别自身需求和资源,通过数据融合和规划,助力企业合理开展知识产权产出工作,从而实现成本节约。而开放性和关联性特点则有助于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推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进而打破企业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并且,企业能够利用数据技术快速筛选出有效知识和信息并进行数据融合,为企业掌握市场需求提供参考,促使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知识产权产出,进而获得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数据技术功能的角度看,一方面,数据技术具备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活动前期,企业需要搜寻各类有用的相关信息,由于信息量巨大,仅靠人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处理。而数据技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时处理非结构化、非标准化的信息,从海量、碎片化信息中准确识别出对企业创新目标有用的信息,极大地节省了知识产权产出活动的时间,提高了创新效率。另一方面,数据技术中包含各类数学模型,能够利用筛选出的信息和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参数,为知识产权产出相关产品、商标等在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提供仿真模拟,降低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有效提高知识产权产出的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数据技术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二)知识流动中介效应假设

在数据技术应用的背景下,企业内外部信息流动速度加快,知识传播效率得以提升,由此产生的知识流动效应能够迅速增加企业知识存量,进而有力地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10]。从知识吸收维度来看,企业凭借应用数据连接能力和智能分析能力,能够从海量的信息中挖掘出对知识产权产出具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到企业信息库中,逐步形成知识储备。数据技术能够为企业数据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支持,助力企业充分地吸收创新信息。在知识扩散维度上,数据技术所具备的连接能力,可以通过搭建信息传输通道,有效消除企业与企业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壁垒,提升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交互能力。根据知识基础观的观点,知识是企业最重要、价值最高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源泉。知识吸收包括知识获取、整理和吸收以及利用的全过程。企业员工通过

与外部人才以及企业内部其他员工的交流,获取信息、知识和经验,从而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知识吸收为员工开展知识产权产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切实推动了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的提升。知识扩散是指企业员工之间、企业与外部其他组织的人才之间交流讨论,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传递给交流对象的过程。知识扩散促进了知识在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充分吸收和利用,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提供了有力的知识支撑。本研究认为,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而言,知识扩散更多地呈现出正向效用。在数据技术应用的推动下,企业内外部的沟通交流机制得到显著强化,企业获取、整理和吸收知识的能力也大幅增强,这有助于加强知识流动,进而推动知识产权产出。

表 1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指标层	计量方式
企业知识 产权产出 水平	研发水平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技术人员总数/员工总数
		人均研发费用	研发经费总额/技术人员总数
		人均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总额/技术人员总数
	转化水平	知识产权转化率	已经投入使用的知识产权数量/知识产权总数
		新产品开发成功率	正式投入生产的项目/研发项目总数
		广告支出强度	新产品广告支出费用/新产品销售收入
	营销管理水平	新产品销售率	新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总收入
		销售收入增长率	(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
		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本年度新产品销售量/本年度国内市场总供应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Dig*)。综合学术界现有的关于数据技术应用的相关研究,采用企业年报中数据技术关键词词频的计量方式具有两个显著优势:其一,计量数据获取的可靠性较高,在实际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其二,企业年报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资料,在我国政府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背景下,企业会积极地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信息。因此,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的词频越高,表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越深。以词频数量来计量数据技术应用水平,能够反映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的差异,该指标对数据技术应用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他数据技术 5 个维度构建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体系,然后通过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网站收集并整理样本企业 2010—2023 年的企业年报,最后利用 Python 语言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从中筛选出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并统计关键词的出现次数,以关键词词频加 1 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衡量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吸收在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H3:知识扩散在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 (*EIPIC*)。在现有的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知识产权授权数量等单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本研究借鉴梁凯桐等^[11]的研究,构建如表 1 所示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样本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进行评分,从而获取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数据。

本研究中介变量为知识流动,依据研究假设,知识流动可从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两个维度予以度量。知识吸收 (*Know-absor*) 以企业专利引用数量来衡量,知识扩散 (*Know-diff*) 以企业被引用专利数量来衡量。除上述关键变量外,本研究为控制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影响,分别从企业微观层面以及外部宏观层面选取了如表 2 所示的控制变量。在外部宏观层面,主要涵盖经济、产业与开放程度。其中,区域经济水平反映地区宏观经济环境,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的人均 GDP 取对数来衡量;产业维度主要体现地区产业结构状况,以企业所在地级市的年度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开放程度主要是指地区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即跨国贸易水平,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的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来衡量。企业微观层面选取了 5 个变量:一是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二是企业成立年限,采用企业成立年数来衡量,对年数先加 1 再取对数处理;三是资产负债率,用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计算公式为“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四是资产回报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采用净利润占资产总额比重来衡量;五是产权性质,即企业是国有企业

还是非国有企业,采用“0-1”虚拟变量进行赋值,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指标汇总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汇总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量方式
因变量	自变量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	<i>EIPIC</i>	利用因子分析法评价所得
		数据技术应用	<i>Dig</i>	企业年报中数据技术应用关键词词频加1取对数
中介变量	知识流动	知识吸收	<i>Know-absor</i>	企业专利引用数量
		知识扩散	<i>Know-diff</i>	企业被引用专利数量
控制变量	微观层面	资产负债率	<i>Lev</i>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企业规模	<i>Asset</i>	资产总额对数
		企业成立年限	<i>Age</i>	企业成立年数加1后取对数
		产权性质	<i>Soe</i>	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
	宏观层面	资产回报率	<i>Roa</i>	净利润/资产总额
		区域经济水平	<i>Eco</i>	企业所在城市人均GDP取对数
		地区产业结构	<i>Stru</i>	企业所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i>Open</i>	企业所在城市进出口总额/GDP
虚拟变量		年份	<i>Year</i>	样本数据对应年份
		行业	<i>Industry</i>	企业所处行业

(二)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时间段为2010—2023年,剔除研究期间内为ST、ST*的企业样本,剔除研究期间内出现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非正常状态的企业样本,以及剔除研究期间内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最终保留1924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象,样本总量达27521。为避免样本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数据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关于变量数据来源,数据技术应用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企业层面微观控制变量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知识产权产出评价指标数据、知识流动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宏观层面数据则来源于企业所在城市的统计年鉴。

(三) 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直接关系模型:

$$EIPIC_{it} = c + \alpha Dig_{it} + \beta \sum Control + \mu Industry_i + \varphi Year_t + \varepsilon_i \tag{1}$$

其中, $EIPIC_{it}$ 表示第*i*个样本企业第*t*年的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 Dig_{it} 表示第*i*个样本企业第*t*年的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Control$ 为控制变量, c 和 ε_i 为模型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 $Industry$ 和 $Year$ 分别为行业 and 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由行业差异和年份趋势导致的偏差。

在模型公式(1)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知识流动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EIPIC_{it} = c + \alpha_1 Dig_{it} + \alpha_2 Media_{it} + \beta \sum Control + \mu Industry_i + \varepsilon_i \tag{2}$$

$$Media_{it} = c + \alpha Dig_{it} + \beta \sum Control + \mu Industry_i + \varepsilon_i \tag{3}$$

其中, $Media_{it}$ 表示第*i*个样本企业第*t*年的知识流动情况,包含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两个部分。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四、实证分析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企业知识产权产出($EIPIC$)标准差为64.193,相对较高,这表明我国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最高评分达到76.835,最低仅有-107.061,差异较大;均值为18.266,这表明我国上市企业整体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数据技术应用(Dig)的均值为1.387,根据最大值为5.206来看,我国上市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相对偏低,且标准差为1.295,相对偏高,最小值为0,与最大值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我国上市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存在明显差距。知识流动变量中,知识吸收($Know-absor$)和知识扩散($Know-diff$)的均值分别为23.179、14.034,由此可见,我国上市企业之间整体知识吸收水平高于知识扩散水平,企业专利引用能力显著高于专利被引用能力,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趋势,企业知识扩散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 模型选择

本研究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在F检验下,F检验值为10.067,大于 $F_{0.05}(12984) = 1.8$,且 $P = 0$,拒绝原假设“采用混合模型进行回归”成立,即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在Hausman检验下,

检验值为 14. 385, 大于 $\chi^2_{0.05}(6) = 12. 592$, 且 $P = 0. 021 < 0. 05$, 在 5% 置信水平下显著, 拒绝原假设“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成立, 即应当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综合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来看, 本研究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IPIC</i>	27521	18. 266	64. 193	- 107. 061	76. 835
<i>Dig</i>	27521	1. 387	1. 295	0	5. 206
<i>Know-absor</i>	27521	23. 179	0. 721	0	64
<i>Know-diff</i>	27521	14. 034	0. 984	0	37
<i>Lev</i>	27521	0. 393	0. 211	0. 028	0. 895
<i>Asset</i>	27521	22. 016	1. 085	19. 734	26. 119
<i>Age</i>	27521	2. 902	0. 274	1. 583	3. 626
<i>Soe</i>	27521	0. 264	0. 417	0	1
<i>Roa</i>	27521	0. 042	0. 153	- 0. 631	0. 743
<i>Eco</i>	27521	0. 195	0. 306	0. 005	3. 724
<i>Stru</i>	27521	1. 797	0. 574	0. 268	5. 172
<i>Open</i>	27521	0. 471	0. 338	0. 029	1. 346

表 4 模型选择结果

原假设		采用混合模型 回归	采用个体随机 效应模型回归
F 检验	Statistic	10. 067	
	自由度	12984	
	P	0. 000	
Hausman 检验	Chi. Sq. Statistic		14. 385
	自由度		6
	P		0. 021

(三) 基准回归

根据上文模型公式(1)进行基础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从三列回归结果对比来看, 引入企业内外部控制变量后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回归结果保持显著正向影响, 由此可见, 企业内外部因素不会导致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关系发生变化。从列(3)结果来看, 数据技术应用(*Dig*)回归系数为 0. 169, 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表示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显著正相关, 研究假设 H1 通过检验。随着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加深,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将显著提高, 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每加深 1 个单位,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相应增加 0. 169 个单位。控制变量中, 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成立年限(*Age*)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即企业成立时间越长, 企业逐渐进入成熟期或者衰退期, 创新积极性逐渐降低, 进而导致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下降。资产回报率(*Roa*)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企业资产回报率越高, 企业内部资金供给能力越强, 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创新活动中,

有利于企业整体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宏观控制变量中, 地区经济水平(*Eco*)、地区产业结构(*Stru*)、地区对外开放程度(*Open*)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即外部社会经济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发展均衡、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列	(1)	(2)	(3)
因变量	<i>EIPIC</i>	<i>EIPIC</i>	<i>EIPIC</i>
<i>Dig</i>	0. 084 ** (2. 37)	0. 133 *** (3. 25)	0. 169 *** (6. 74)
<i>Lev</i>		0. 029 (0. 45)	0. 021 (0. 34)
<i>Asset</i>		- 0. 062 (- 1. 16)	- 0. 046 (- 0. 93)
<i>Age</i>		- 0. 494 * (- 1. 89)	- 0. 426 * (- 1. 75)
<i>Soe</i>		0. 073 (0. 64)	0. 059 (0. 41)
<i>Roa</i>		0. 102 *** (4. 38)	0. 089 *** (3. 92)
<i>Eco</i>			0. 034 *** (4. 62)
<i>Stru</i>			0. 014 *** (3. 71)
<i>Open</i>			0. 026 *** (4. 51)
常数项	0. 732 *** (61. 83)	0. 912 *** (45. 36)	3. 174 *** (12. 66)
样本量	27521	27521	27521
Adj-R ²	0. 416	0. 477	0. 492
F	12. 38	14. 69	21. 83

注: *、**、*** 表示 10%、5% 和 1% 的置信水平, 括号内为 *t* 值。

(四) 知识流动的中介机制检验

根据公式(2)和(3)检验知识流动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 结果如表 6 所示。列(2)和列(4)中, 数据技术应用(*Dig*)对知识吸收(*Know-absor*)、知识扩散(*Know-diff*)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335、0. 296, 均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加深, 有助于提升企业引用外部专利数量和企业内部专利被引用数量, 进而提升企业知识流动水平。从列(1)和列(3)结果来看, 知识吸收(*Know-absor*)、知识扩散(*Know-diff*)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52 和 0. 129, 均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提升均有助于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升。由此可见, 知识吸收(*Know-absor*)、知识扩散(*Know-diff*)在数据技术应用(*Dig*)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 Sobel 检验的 *Z* 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验证了知识流动的中介效应。且列(1)和列(3)中, 数据技术应用(*Dig*)对企业知识产权产

出的回归系数在 1% 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为正,即表示知识吸收 (*Know-absor*)、知识扩散 (*Know-diff*) 均为部分中介,其中介作用占比分别为30.130%、22.594%。上文研究假设 H2 和 H3 通过检验。综合上述检验结果来看,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加深,将提升企业从外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企业知识产权向外部流动,提升企业与外部的整体知识流动水平,进而有助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高。

表 6 知识流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列	(1)	(2)	(3)	(4)
因变量	<i>EIPIC</i>	<i>Know-absor</i>	<i>EIPIC</i>	<i>Know-diff</i>
<i>Dig</i>	0.154 *** (6.11)	0.335 *** (3.71)	0.162 *** (5.97)	0.296 *** (3.55)
<i>Know-absor</i>	0.152 *** (4.96)			
<i>Know-diff</i>			0.129 *** (6.89)	
<i>Lev</i>	0.018 (0.29)	-0.258 *** (-13.41)	0.014 (0.31)	-0.267 *** (-9.28)
<i>Asset</i>	-0.036 (-1.02)	0.037 * (1.83)	-0.039 (-0.77)	0.064 * (1.91)
<i>Age</i>	-0.367 * (-1.81)	-0.122 ** (-2.15)	-0.325 * (-1.69)	-0.083 ** (-2.04)
<i>Soe</i>	0.055 (0.36)	0.061 (0.74)	0.047 (0.23)	0.058 (0.67)
<i>Roa</i>	0.081 *** (3.68)	0.094 *** (4.56)	0.073 *** (3.24)	0.081 ** (2.27)
<i>Eco</i>	0.029 *** (4.51)	0.079 *** (3.84)	0.018 *** (4.37)	0.065 *** (3.26)
<i>Stru</i>	0.011 *** (3.45)	0.009 (0.25)	0.008 *** (3.12)	0.005 (0.14)
<i>Open</i>	0.023 *** (4.22)	0.417 *** (3.57)	0.021 *** (3.93)	0.365 *** (3.28)
常数项	2.835 *** (10.53)	0.683 *** (3.26)	4.365 *** (8.64)	0.739 *** (3.51)
样本量	27521	27521	27521	27521
Adj-R ²	0.512	0.398	0.533	0.414
F	22.83	10.09	18.74	6.57
中介占比	30.130%		22.594%	
Sobel 检验	Z = 22.374 (p = 0.000)		Z = 16.931 (p = 0.000)	

注：*、**、*** 表示 10%、5% 和 1% 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五) 异质性检验

1. 产权性质异质性

对比表 7 列(1)和列(2)的系数结果,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下,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样本组下系数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由政府掌握股权,企业人才和各类资源较为充足,享受的政府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较多,企业经营较为稳定,所以对知识产权产出的需求相对较低,多采用较为保

守和稳健的发展方式,致使数据技术在企业内部无法充分发挥效用。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激烈,企业需要不断地提升知识产权产出能力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因此,需要借助数据技术应用来推动企业创新。并且,非国有企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不受政府控制和干扰,能够全面地分析数据技术应用的优势与弊端,充分结合企业需求和能力来应用数据技术,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技术的效用。

2. 规模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7 中列(3)和列(4)所示,在两组样本下,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大型企业样本组系数显著高于中小型企业样本组,由此可见,数据技术应用对大型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主要是由于大型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较高,其内外部资源较为丰富,能够从内外部营造更好的数据技术应用环境,有助于数据技术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充分发挥效用。

3. 行业异质性

如表 7 列(5)(6)(7)所示,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三组样本下,资本密集型样本组下和技术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技术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而劳动密集型样本组下的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不显著。主要是因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多为高新技术类企业,对知识产权产出要求较高,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密集型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多用于支持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活动,能够充分发挥数据技术的效用,推动企业数据融合,其信息获取能力将显著增强,可以通过整合外部信息资源来提升内部知识产权产出效率,进而提升竞争实力。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从事服装等日用品制造业务,其生产模式较为传统,规范化程度较高,生产流程较为单一,市场对品牌和质量的关注度更高,因而这类企业对知识产权产出的需求相对较低。

(六)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较高,意味着企业内部对技术的关注度越高,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相应也会越高,由此将导致本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运

用二阶段法检验内生性,以样本企业所在城市的数字化发展水平(*C-dig*)作为工具变量,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目前该报告只公布至2020年,2021—2023年的数据通过趋势移动平均法计算获得。企业所在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应用数据技术。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C-dig*)与原变量数据技术应用(*Dig*)显著正相关,符合工具变量选择标准。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结果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即表明

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44.276,大于Stock-Yogo 检验在10%置信水平下的20.135,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弱识别”,Sargan-Hensen 检验伴随概率为0.006,在1%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由此可见,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具有合理性。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数据技术应用(*Dig*)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在1%置信水平下保持显著正向影响,在知识流动中,知识吸收与知识扩散的中介效应也保持显著。由此可见,控制关键变量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后,上文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表 7 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

列	(1)	(2)	(3)	(4)	(5)	(6)	(7)
分组	产权性质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			行业异质性	
	国有	非国有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劳动密集
因变量	<i>EIPIC</i>		<i>EIPIC</i>			<i>EIPIC</i>	
<i>Dig</i>	0.095 (1.32)	0.202 *** (5.17)	0.235 *** (12.39)	0.127 *** (4.61)	0.153 * (1.94)	0.326 *** (9.35)	0.087 (1.23)
常数项	2.684 *** (4.34)	1.926 *** (3.78)	3.572 *** (8.94)	2.506 *** (7.19)	1.792 *** (5.58)	2.037 *** (4.63)	4.193 *** (3.29)
样本量	7265	20256	11324	16197	10829	7345	9347
Adj-R ²	0.483	0.572	0.524	0.498	0.516	0.529	0.533
F	8.92	11.34	24.68	19.37	32.16	27.53	13.04

注：*、**、***表示10%、5%和1%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 8 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法检验结果

列	(1)	(2)	(3)	(4)	(5)	(6)
检验	一阶段			二阶段		
因变量	<i>Dig</i>	<i>EIPIC</i>	<i>EIPIC</i>	<i>Know-absor</i>	<i>EIPIC</i>	<i>Know-diff</i>
<i>C-dig</i>	0.035 *** (106.74)					
<i>Dig</i>		0.142 *** (5.84)	0.117 *** (4.23)	0.274 *** (3.95)	0.125 *** (3.79)	0.223 *** (3.26)
<i>Know-absor</i>			0.118 *** (3.63)			
<i>Know-diff</i>					0.102 *** (4.17)	
常数项	2.912 *** (3.54)	11.732 *** (6.89)	9.437 *** (3.26)	4.628 *** (4.47)	5.719 *** (3.93)	1.926 *** (3.81)
样本量	27521	27521	27521	27521	27521	27521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50.924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44.276 {20.135}					
Sargan-Hensen 检验	0.006 *** [0.893]					
Adj-R ²	0.476	0.517	0.536	0.498	0.561	0.509
F	39.84	12.73	23.28	19.34	27.18	22.06

注：*、**、***表示10%、5%和1%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t值。

2. 替换关键变量

首先是替换自变量。现有关于数据技术应用度

量方式较多,为控制由于自变量计量方式导致的偏差,以企业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据技术应用相关

的无形资产占企业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 (*Dig-rate*) 来度量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水平,并以此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中列(1)所示,变量 *Dig-rate* 的系数结果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这表明自变量计量方式差异不会对本文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是替换因变量。在学术界,目前多采用专利相关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以企业专利授权数量 (*Author*) 作为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替代变量,考虑专利申请授权具有时滞性,因此采用 $t + 1$ 期的因变量数据来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中列(2)所示,数据技术应用(*Dig*)系数结果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这说明因变量计量方式的差异不会对本文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是同时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同时替换本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中列(3)所示,数据技术应用(*Dig*)对企业专利授权数量 (*Author*) 的系数结果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上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9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列	(1)	(2)	(3)	(4)
因变量	<i>EIPIC</i>	<i>Author_{t+1}</i>	<i>Author_{t+1}</i>	<i>EIPIC</i>
<i>Dig</i>		0.132 *** (3.87)		0.297 ** (2.51)
<i>Dig-rate</i>	0.317 *** (11.02)		0.215 *** (4.56)	
常数项	20.573 *** (9.84)	7.157 *** (6.29)	12.436 *** (5.91)	4.285 *** (7.12)
样本量	27521	27521	27521	18693
Adj-R ²	0.527	0.494	0.538	0.509
F	11.26	9.88	14.69	10.48

注: *、**、*** 表示 10%、5% 和 1% 的置信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3. 调整样本数量

本文以沪深 A 股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样本企业遍布我国 31 个省份的 89 个城市。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对数据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程度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最终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 个直辖市的样本剔除,回归结果如表 9 中列(4)所示,数据技术应用(*Dig*)的系数结果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结果一致。这表明样本选取的地域差异和样本数量差异不会对本文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上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等构建了“数据技术应用—知识流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逻辑框架,以中国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据技术应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且知识流动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其中知识吸收和知识扩散的中介作用占比分别为 30.130%、22.594%。企业利用数据技术提升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收集和整理外部知识,并通过数据融合将其转化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所需的知识,最终将企业的创新成果向外部扩散,从而增强企业整体的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同时,本研究进一步以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为标准进行分组,检验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 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系数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数据技术应用对大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数据技术应用程度每加深一个单位,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将分别增加 0.202、0.235、0.326 个单位。这表明,鉴于不同企业受数据技术应用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需要对不同企业施行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二) 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推动企业数据技术应用,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政策启示。

一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企业要把握数字化的发展机遇,从自身经营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改变传统的生产观念,充分利用数据技术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推动传统技术与数据技术的融合,在企业现有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除了传统生产环境,数据技术也可逐渐深入销售管理环节,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系统和管理系统优化企业管理模式,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效率,激发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积极性,缩短企业应用数据技术的适应周期。此外,政府部门也需关注数据技术应用外部环境的建设。一方面,要超前部署

地方数据中心、5G 基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牵头搭建数据技术创新互动平台,推动不同地区间的数据技术信息互动和知识产权产出信息互动,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夯实环境基础。

二是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推动知识技术共享。实证结果表明,数据技术应用能够通过强化知识流动来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提升,因此,强化知识流动的保障机制、提高企业知识共享的积极性势在必行。从企业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借助合作交流打破企业间的信息壁垒,利用数据技术积极开展知识与技术的共享,拓宽知识与资源的共享范畴,深化共享层次,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需运用数据技术破除时间和空间上对知识流动造成的阻碍,加强与不同主体的协作,踊跃开展知识产权产出活动相关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合作伙伴的满意度,进而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能力。从政府角度出发,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制定清晰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划,从保护主体、目标、任务等维度构建完备的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借助数据技术搭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达成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运用、保护、服务的全方位监控,保障知识信息在全链条顺畅流动,激发企业知识共享的动力。

三是采取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从上文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不同类型企业的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所以,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数据技术应用方案。以不同行业企业为例,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技术和创新的需求相对较高,这类企业应紧抓当前国家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积极引进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数据技术,并将其合理、高效地应用于企业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达成企业经营中数据技术全流程覆盖,借助数据融合助力企业内部信息流通,从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应适度借助数据技术推动业务自动化进程,实现管理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管理效能,进而为企业创新注入活力。

四是激发行业数据技术应用积极性,为企业知识产权产出营造良好行业环境。行业龙头企业应发

挥引领作用,踊跃拓展数据技术应用范畴,整合行业内分散的生产资源,实现人力、技术、订单等信息在行业内的互通共享,树立全行业数据技术赋能知识产权产出的理念,充分释放数据技术创新的潜能,推动行业产业链的全面数字化升级,为企业数据技术应用和知识产权产出筑牢良好的行业根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2] 王欣亮,张家豪,刘飞. 大数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吗:基于数据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的双重效应解释[J]. 统计研究,2023,40(5):103-119.

[3] 彭影,李士梅.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1):30-39.

[4] LIANG S, ZHANG H, ZHANG Z.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natural hazards on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3(22):10-18.

[5] 杜栋,刘乐,苏乐天. 面向政府统计的大数据技术价值体系构建[J]. 电子政务,2015(6):99-103.

[6] 戚聿东,杜博,叶胜然. 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协同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机理与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22(8):5-24.

[7] 肖振红,李炎. 产学研协同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绩效: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机理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2023,35(6):72-81.

[8] KONARA P, BATSAKIS G, SHIRODKAR V. "Dista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NEs' foreign subsidiary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2(39):534-558.

[9] BHATTACHARYA S, CHAKRABORTY P, CHATTERJEE 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s and wag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2,154(1):102709.

[10] 毛昊,刘夏,党建伟. 对标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的制度经验与改革应对[J]. 中国软科学,2020(2):11-25.

[11] 梁凯桐,王玉学,刘子志,等. 广东省中药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创新效率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9,39(22):147-15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 65 页)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

金亚亚^{a,b}

(兰州工商学院 a. 经济学院; b. 甘肃省高校区域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 甘肃 兰州 730101)

摘要: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选取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先平稳后快速上升的历程,四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且存在较大差异。(2)从区域差异来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各贡献率变化相对平稳,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3)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地区存在集聚现象。由此提出把握两系统演变规律,实施政策调整,开展重点扶持,实现两系统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5

中图分类号:C812,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29-10

一、文献回顾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双碳”战略目标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要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损耗脱钩、协同推进的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支撑力,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化设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快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变,推进节能降碳,已成为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2-3]。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现数字经济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和方向。数字经济成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引擎和新动力,而绿色发展可以平衡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见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

异,对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平稳协调运行,推进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针对数字经济单个领域展开的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概念界定^[4],发展水平测度^[5-6],驱动因素研究^[7-8],以及对经济增长^[9]、产业结构^[10]、碳排放^[11]和绿色发展^[12]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二是聚焦绿色发展单个领域展开的研究,多数从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等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13],对绿色经济效率测算和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展开研究^[14-16],探讨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空间差异等^[17]。三是关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已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18],也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相互促进^[19],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0]。

收稿日期:2025-01-28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区域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项目“甘肃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QXKJ2023-009);2025年度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甘肃省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空间相关性研究”(2025B-284)

作者简介:金亚亚(1995—),女,甘肃平凉人,硕士,兰州工商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研究。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首先,现有研究多数聚焦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单向影响,关于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较少;其次,大部分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研究视角基于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地区和部分省域层面,而从全国层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全国视角出发构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分别测算出数字经济水平指数和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引入修正耦合协调模型,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动态时空特征分析,并用 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展开具体分析,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合理、科学。

二、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机理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的核心在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永续性,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优化作用。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能够获取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21]。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它以数字基础设施为硬件条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手段,以数字产业为发展支撑,是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天然地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发展过程中,对绿色经济发展有着推动作用^[22]。

(1) 数字化基础设施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以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中广泛应用,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化设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快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转变,推进节能降碳^[2]。(2) 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构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先进产业增长极,快速推进产业现代化进程。(3)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低投入、低能耗、低成本,促使传统产业逐渐智能化、轻量化和绿色化,进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智能手段完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监管能力,促进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模式,追求的是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能够倒逼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确保数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1) 绿色发展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解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基础材料和软硬件设施等问题,降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教育、医疗及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教育、互联网医疗等众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项

目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社会服务急需数字化转型,而绿色发展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实践场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2]。(3)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对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倒逼促进节能减排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先进数字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有着天然推动作用,绿色发展倒逼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两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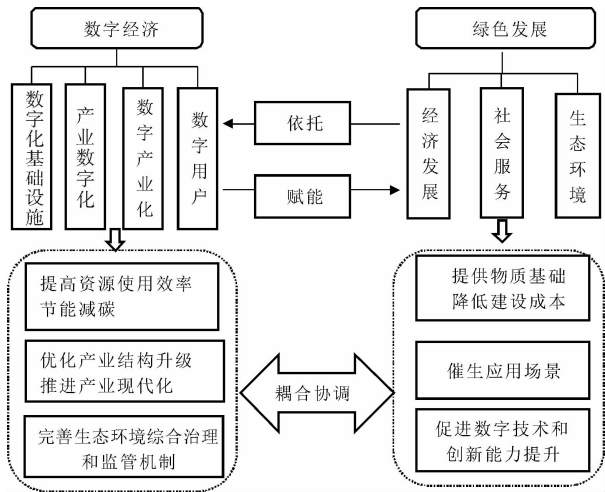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客观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依据操作的科学性、可比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考虑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5],从 4 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参考国内外典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构建 3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来评价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二) 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本文选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1) 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了能够科学地分析,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应当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因此对评价指标进行极差正规化处理。

①对于正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无量纲化处理的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tag{1}$$

表 1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数字经济	数字化基础设施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正向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正向
		网页数	万个	正向
		域名数	万个	正向
	产业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正向
		电信业务量	亿元	正向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台	正向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正向
	数字产业化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	正向
		人均快递业务收入	万元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	正向
	数字用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户	正向
		互联网普及率	%	正向
		人均 GDP	元/人	正向
经济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率	%	正向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正向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生态环境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正向	
	生活垃圾清运量	万吨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万元	正向	
	电力消费量	亿千瓦时	负向	
绿色发展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吨	负向	
	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颗粒物)	万吨	负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正向	
社会服务	R&D 经费投入强度	%	正向	
	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项目数	项	正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教育经费投入	元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医疗保险覆盖率	%	正向	

②对于负指标,即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其无量纲化处理的公式为:

$$X'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tag{2}$$

由此得到归一化的矩阵 X' 。

(2)计算信息熵值

$$e_j = -k \sum_{i=1}^n P_{ij} \ln(P_{ij}) \tag{3}$$

其中, $P_{ij} = X'_{ij} / \sum_{i=1}^n X'_{ij}$, 常数 $k = \frac{1}{\ln(n)}$, 当

$P_{ij} = 0$ 时, $\lim_{n \rightarrow \infty} P_{ij} = P_{ij} \ln(P_{ij}) = 0$ 。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d_j = 1 - e_j \tag{4}$$

当 d_j 值越大时,该指标值变异的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评价中起的作用就越大,该指标就越重要。

(4) 计算第 j 项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tag{5}$$

(5) 评价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值与其权重的乘积之和为其综合评价值。

2. 修正耦合协调模型

社会是由资源、生态、经济等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多系统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影响的体系,为研究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两系统协调发展动态变动情况,本文选用王淑佳等人提出的修正耦合协调模型^[23],修正耦合协调模型主要对传统模型中耦合度 C 的计算进行修正,提高了耦合协调模型的效度和解释力。修正耦合协调模型如下:

$U_i \in [0,1]$ 是各系统值, n 为系统个数,当 $n = 2$ 时,假定 $\max U_i$ 为 U_2 。

$$C = \sqrt{[1 - (U_2 - U_1)] \times \frac{U_1}{U_2}} \tag{6}$$

耦合度 C 的取值越大说明两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越强,特别地,当 $U_1 = U_2$ 时, C 为 1。

$$T = \alpha U_1 + \beta U_2, \alpha + \beta = 1 \tag{7}$$

T 表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综合协调指数, α, β 为 U_1, U_2 的发展系数。这里设置为 $\alpha = \beta = 0.5$ 。

$$D = \sqrt{C \times T} \tag{8}$$

D 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D 值越大表明协调度越高。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2^[1]。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程度
(0.0—0.2)	勉强协调
[0.2—0.3)	初级协调
[0.3—0.5)	中度协调
[0.5—0.8)	高度协调
[0.8—1.0)	极度协调

3.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为了避免数据交叉重叠和区域差异来源难以识别的问题,本文使用 Dagum^[24] 提出的基尼系数来验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来

源,公式如下:

$$G = \frac{\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2n^2\mu}$$

$$G = G_w + G_{nb} + G_t \quad (9)$$

其中, n 是省份个数, k 是区域数量, μ 是耦合协调度的均值, $n_j(n_h)$ 是区域 $j(h)$ 内省份数量, $y_{ji}(y_{hr})$ 是任意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G_w 是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 G_{nb} 是耦合协调度区域间差异, G_t 是耦合协调度的超变密度。

4. 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 I 指数是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它基于邻近省份的同一经济现象是相关的这一假设。本文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关联性分析,从整体上验证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主要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反映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两系统总体空间关联特征。在描述全局空间自相关时,引入全局 Moran's I 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 = \frac{n \sum_{i=1}^n \sum_{j=1}^n w_{ij} (D_i - \bar{D}) (D_j - \bar{D})}{\sum_{i=1}^n \sum_{j=1}^n w_{ij} (D_i - \bar{D})^2}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D_i - \bar{D}) (D_j - \bar{D})}{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10)$$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可有效识别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对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的不足进行弥补。计算公式如下:

$$I = \frac{n(D_i - \bar{D}) \sum_{j=1}^n w_{ij} (D_j - \bar{D})}{\sum_{i=1}^n (D_i - \bar{D})^2} = \frac{(D_i - \bar{D}) \sum_{j=1}^n w_{ij} (D_j - \bar{D})}{S^2} \quad (11)$$

其中, I 表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度,有效取值区间为 $[-1, 1]$,若 $I > 0$,表明区域内部空间表现为正向关联,若 $I < 0$,证明区域内部空间表现为负向关联,若恰好等于0,说明自相关性可忽略。 D_i 和 D_j 代表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bar{D}$ 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 n 为研究的31个省份数

量, S^2 为样本方差,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代表各省份间的邻近关系。本文选用邻接权重矩阵,即相邻省份用1表示,不相邻省份用0表示。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数》和各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资料,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在宏观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之前,首先需要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分别测算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系统的发展指数,结果见表3。

(一)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指数综合分析

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2016—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发展指数均值从2016年的0.2178上升至2022年的0.2304,但是增长速度呈现先快速上升又逐渐放缓态势。具体而言,2016—2018年间,增长速度缓慢;2018—2020年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长速度加快达到4.719%,2020—2022年间,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平缓。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同样,2016—2022年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指数均值由2016年的0.2519上升至2022年的0.2806,同时,绿色发展指数均值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16—2018年间,绿色发展指数均值增长速度较缓,为1.770%;2018—2020年间,增长速度提升至3.584%;2020—2022年间,绿色发展指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增长速度高达5.677%。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差异特征,区域协调性有待提高。具体而言,2016—2022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整体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远高于其他省份,取值范围为0.4199—0.7200,而西部地区的西藏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仅有0.0361,这也说明不同省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很大,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同样,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指数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特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指数整体

高于其他地区,但是东部地区内不同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差异较大,例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绿色发展指数普遍较高,而天津、河北和海南则相对较低,基本和中西部地区在一个水平线上。

表 3 2016—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区域	省份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2016	2018	2020	2022	2016	2018	2020	2022
东部地区	北京	0.6932	0.6799	0.6874	0.7092	0.5564	0.5377	0.5362	0.4321
	天津	0.2033	0.1767	0.1949	0.1871	0.2873	0.2410	0.2563	0.2181
	河北	0.2010	0.2072	0.2316	0.2253	0.2570	0.2382	0.2470	0.2911
	上海	0.4694	0.4477	0.4557	0.4808	0.3764	0.3881	0.3948	0.4341
	江苏	0.4957	0.4758	0.4920	0.4766	0.4152	0.4383	0.4792	0.5158
	浙江	0.4931	0.4822	0.4910	0.4741	0.3640	0.3622	0.4245	0.5349
	福建	0.3012	0.2945	0.2404	0.2568	0.2388	0.2644	0.2799	0.3145
	山东	0.3374	0.3244	0.3439	0.3807	0.3682	0.3811	0.3772	0.4625
	广东	0.7090	0.6996	0.7200	0.7100	0.5728	0.5738	0.6080	0.6813
中部地区	海南	0.0927	0.1012	0.0962	0.0913	0.1844	0.1868	0.1912	0.1630
	山西	0.1201	0.1266	0.1280	0.1250	0.2021	0.2329	0.2494	0.2200
	安徽	0.1675	0.1824	0.2106	0.2280	0.2213	0.2574	0.2853	0.3247
	江西	0.1094	0.1322	0.1585	0.1500	0.2011	0.2385	0.2368	0.2657
	河南	0.2201	0.2213	0.2467	0.2486	0.2105	0.2419	0.2328	0.2469
	湖北	0.2182	0.2074	0.2276	0.2387	0.2682	0.2869	0.2693	0.3485
	湖南	0.1583	0.1650	0.1971	0.2132	0.2116	0.2627	0.2290	0.2879
	内蒙古	0.1095	0.1082	0.1173	0.1117	0.2271	0.2147	0.2228	0.2410
	广西	0.1056	0.1242	0.1561	0.1549	0.1732	0.1837	0.1911	0.1993
西部地区	重庆	0.1529	0.1633	0.1708	0.1850	0.2396	0.2387	0.2236	0.2467
	四川	0.2535	0.2775	0.3007	0.2966	0.2449	0.2701	0.2898	0.2796
	贵州	0.0935	0.1099	0.1196	0.1430	0.1679	0.1973	0.2031	0.2282
	云南	0.1075	0.1223	0.1351	0.1254	0.1949	0.1904	0.2322	0.2382
	西藏	0.0458	0.0429	0.0361	0.0415	0.1165	0.1281	0.1165	0.1172
	陕西	0.1770	0.1822	0.2007	0.1928	0.2482	0.2475	0.2713	0.2532
	甘肃	0.0694	0.0816	0.0879	0.0890	0.1576	0.1546	0.1666	0.1725
	青海	0.0661	0.0604	0.0577	0.0690	0.1302	0.1324	0.1474	0.1351
	宁夏	0.0652	0.0772	0.0677	0.0699	0.1587	0.1346	0.1555	0.1397
东北地区	新疆	0.0898	0.0836	0.0847	0.0857	0.1470	0.1346	0.1463	0.1529
	辽宁	0.2049	0.1798	0.1835	0.1768	0.2444	0.2345	0.2367	0.2282
	吉林	0.1027	0.1072	0.1083	0.0913	0.1782	0.1804	0.1820	0.1550
	黑龙江	0.1176	0.1075	0.1229	0.1131	0.2437	0.1721	0.1483	0.1697
均值		0.2178	0.2178	0.2281	0.2304	0.2519	0.2563	0.2655	0.2806
标准差		0.1746	0.1679	0.1702	0.1719	0.1084	0.1085	0.1149	0.1310
增速		—	0.021%	4.719%	0.995%	—	1.770%	3.584%	5.677%

(二)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由表 3 可知,2016—2022 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指数取值范围不同,但两者发展趋势和分布形态极为相近,这也是两系统存在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为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采用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测算出 2016—2022 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 4 和图 2。

1. 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特征

图 2 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态势,且两系统耦合度大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最高可达 0.92,说明两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状态,相互影响程度

强。第二,研究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介于 0.42—0.48,处于中度协调,距离极度协调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着眼信息时代发展趋势,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注重绿色发展,坚持协调发展,使得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说明耦合协调发展还需持续关注。

2. 区域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表 4 为中国 31 个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数据。现从时空两个视角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展开分析。

表 4 2016—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

区域	省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均值
东部地区	全国均值	0.4171	0.4157	0.4229	0.4355	0.4369	0.4367	0.4773	0.4346
	北京	0.7211	0.7192	0.7081	0.6994	0.7056	0.5657	0.6966	0.6880
	天津	0.4444	0.4040	0.4159	0.4313	0.4365	0.4367	0.4465	0.4308
	河北	0.4436	0.4414	0.4522	0.4524	0.4795	0.4809	0.4996	0.4642
	上海	0.6005	0.6201	0.6143	0.6108	0.6193	0.5900	0.6683	0.6176
	江苏	0.6322	0.6649	0.6560	0.6538	0.6901	0.6793	0.6974	0.6677
	浙江	0.5862	0.5956	0.5859	0.5981	0.6412	0.6847	0.6992	0.6273
	福建	0.4825	0.5061	0.5106	0.5132	0.4860	0.5162	0.5265	0.5059
	山东	0.5767	0.5505	0.5622	0.5618	0.5818	0.5890	0.6356	0.5796
	广东	0.7317	0.7502	0.7343	0.7816	0.7583	0.8377	0.8280	0.7746
	海南	0.3060	0.3041	0.3184	0.3293	0.3114	0.3025	0.3500	0.3174
	东部均值	0.5525	0.5556	0.5558	0.5632	0.5710	0.5683	0.6048	0.5673
中部地区	山西	0.3449	0.3300	0.3540	0.3470	0.3560	0.3504	0.4051	0.3554
	安徽	0.4057	0.4093	0.4220	0.4478	0.4527	0.4673	0.5125	0.4453
	江西	0.3303	0.3497	0.3611	0.3959	0.3941	0.3872	0.4421	0.3801
	河南	0.4578	0.4560	0.4683	0.4771	0.4809	0.4939	0.4975	0.4759
	湖北	0.4624	0.4454	0.4490	0.4603	0.4729	0.4662	0.5263	0.4689
	湖南	0.3945	0.3989	0.4012	0.4866	0.4410	0.4404	0.4909	0.4362
	中部均值	0.3993	0.3982	0.4093	0.4358	0.4329	0.4342	0.4791	0.4270
	内蒙古	0.3313	0.3283	0.3292	0.3448	0.3417	0.3395	0.4056	0.3458
	广西	0.3243	0.3325	0.3504	0.3659	0.3926	0.3995	0.4160	0.3687
	重庆	0.3871	0.3833	0.3998	0.4134	0.4096	0.4083	0.4573	0.4084
	四川	0.4939	0.5046	0.5187	0.5319	0.5369	0.5359	0.5344	0.5223
	贵州	0.3063	0.3120	0.3309	0.3458	0.3442	0.3715	0.4213	0.3474
	云南	0.3275	0.3345	0.3478	0.3577	0.3648	0.3525	0.4138	0.3569
	西藏	0.2215	0.2110	0.2175	0.2358	0.2019	0.2092	0.2762	0.2247
西部地区	陕西	0.4159	0.4061	0.4222	0.4365	0.4423	0.4418	0.4649	0.4328
	甘肃	0.2681	0.2821	0.2874	0.2923	0.2978	0.3000	0.3538	0.2974
	青海	0.2602	0.2314	0.2505	0.2490	0.2474	0.2658	0.3140	0.2598
	宁夏	0.2613	0.2652	0.2791	0.2626	0.2652	0.2697	0.3179	0.2744
	新疆	0.2997	0.2742	0.2894	0.2812	0.2918	0.2970	0.3394	0.2961
	西部均值	0.3248	0.3221	0.3352	0.3431	0.3447	0.3492	0.3929	0.3446
东北地区	辽宁	0.4490	0.4220	0.4200	0.4221	0.4242	0.4128	0.4441	0.4278
	吉林	0.3202	0.3171	0.3267	0.3212	0.3282	0.3122	0.3452	0.3244
	黑龙江	0.3425	0.3375	0.3269	0.3949	0.3491	0.3338	0.3706	0.3507
	东北均值	0.3706	0.3589	0.3578	0.3794	0.3672	0.3530	0.3866	0.36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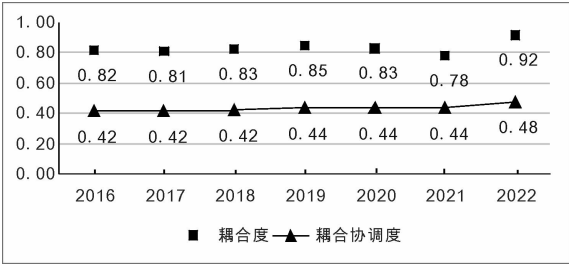


图 2 2016—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时间演变特征。2016—2022 年,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本保持上升态势。从上升趋势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6—2020 年,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平稳发展态势,部分地区呈现轻微波动状态;第二阶段为 2021—2022 年,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快速上升态势。这主

要是因为进入“十四五”时期后,党中央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期内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从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均值均呈现向好态势,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高于全国均值和其他地区均值,其他地区均值均低于全国均值,耦合协调度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 and 西部地区,呈现典型的“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趋势来看,在研究期内,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东部地区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高度协调,但北京耦合协调度出现轻微下降态势;天津、河北、海南 3 个东部地区省份,山西、安徽等 6 个中部地区省份,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 7 个西部地

区省份,以及3个东北地区省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但安徽、湖北和四川3个省份在2022年由中度协调升级至高度协调。由此可见,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中西部地区诸多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大部分省份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在2016—2021年期间,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4个省份处于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取值较低。直至2022年,该4个省份由初级协调升级至中度协调,而西藏一直处于初级协调。这表明这些省份两系统虽有一定程度的耦合,但耦合协调度较低,协调发展效果不理想,是后期提升发展的主要地区。

表5 2016—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年份	G	G_w				G_{nb}						$G_t(\%)$		
		东	中	西	东北	东-中	东-西	东-东北	中-西	中-东北	西-东北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16	0.174	0.128	0.070	0.127	0.077	0.183	0.268	0.212	0.135	0.085	0.121	20.2	69.9	9.8
2017	0.181	0.139	0.065	0.131	0.065	0.189	0.278	0.228	0.139	0.082	0.115	20.6	70.2	9.2
2018	0.171	0.129	0.058	0.128	0.058	0.174	0.260	0.226	0.133	0.088	0.107	20.7	69.5	9.8
2019	0.169	0.129	0.061	0.134	0.059	0.156	0.256	0.206	0.148	0.090	0.117	21.3	68.7	10.0
2020	0.175	0.131	0.056	0.144	0.058	0.165	0.263	0.229	0.145	0.096	0.115	21.4	68.0	10.6
2021	0.174	0.137	0.063	0.137	0.063	0.164	0.255	0.245	0.141	0.116	0.110	21.7	66.4	11.8
2022	0.151	0.126	0.048	0.102	0.057	0.148	0.226	0.228	0.115	0.112	0.088	20.8	68.6	10.6

注： G 、 G_w 、 G_{nb} 、 G_t 分别表示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区域间基尼系数、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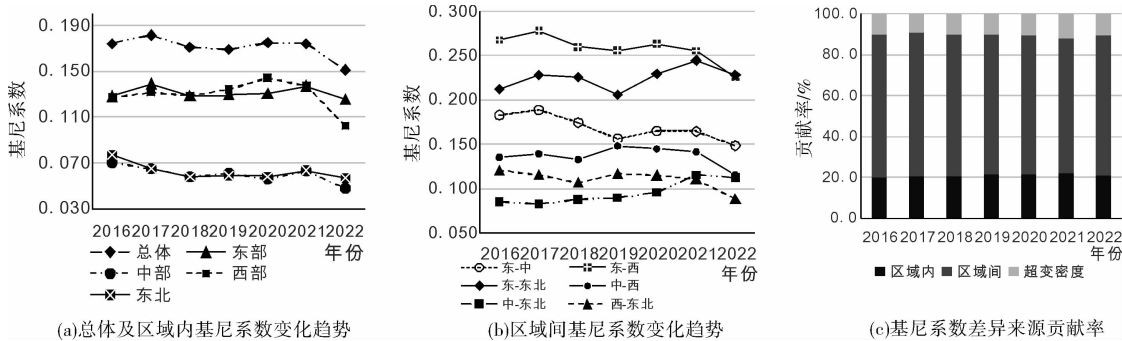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变动及贡献率

图3(a)刻画了研究期内全国层面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根据图(a)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从2016年的0.174降至2022年的0.151,其中2017年基尼系数升至最高0.181,这表明总体差异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从四大区域内部基尼系数来看,呈现东部(均值0.131) > 西部(均值0.129) > 东北(均值0.063) > 中部(均值0.060)的特征。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持续扩大,仅在2022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这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区域内部差异大,存在不平衡现象。这与东部地区内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有很大关系,东部地区既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份,也有河

(三)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解

本文已分析了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水平变动特征,以及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为了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Dagum基尼系数做进一步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本文测度了2016—202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区域间基尼系数及贡献率,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的视角分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测度结果如表5所示。

北、海南等相对落后省份;西部地区内各省份发展差异也较大,存在重庆、四川、陕西等较先进的省份,也存在西藏、青海等较落后的省份。中部与东北地区内部差异程度较小,且两地区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部和东北地区内各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不大。

图3(b)刻画了研究期内四大区域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东部与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与东北、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的区域间差异依次缩小。其中,2016—2021年间,西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大于中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2022年,中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大于西部与东北区域间差异。整体来说,东北与中部、西

部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这说明东北与中部、西部地区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相差不大。从变动趋势来看,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西部与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中部与东北、东部与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3(c)刻画了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来源及变动趋势。根据图 3(c)可以看出,在 2016—2022 年间,各个贡献率变化相对平稳。首先,区域间差异对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的贡献率最大,贡献率基本维持在 66% 以上,2017 年贡献率最高,达到了 70.2%。其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来源于区域内差异,其贡献率基本维持在 20% 以上,2021 年贡献率达到最高,为 21.7%。超变密度对耦合协调度差异贡献率最小,维持在 10% 左右,2021 年贡献率达到最高,为 11.8%。

(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特征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和规律,本文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6—2022 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见表 6。从表 6 可以看出,全局 Moran's I 指数在一般邻接权重下均为正值且大于 0.241,呈现持续上升走势,并且 p-value 值均小于 0.05(即均通过 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地区存在集聚现象。各地区可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

表 6 2016—2022 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Moran's I	0.241	0.262	0.270	0.283	0.302	0.312	0.318
p-value	0.005	0.003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在探索出我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空间关联程度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绘制 Moran 散点图来分析邻近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Moran 散点图被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为高一高集聚,第二象限为低—高集聚,第三象限为低—低集聚,第四象限为高一低集聚。本文以 2016 年和 2022 年为例具体探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状态。如图 4 所示,我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状态主要集中在第一象限(高一高集聚区)和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一直集中在第一象限(高一高集聚区),表明这些省份及邻近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值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条件优渥,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地区一直集中在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表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值区,自身发展基础制约导致发展不充分,对周围地区带动作用有限,是后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发展提升的关键区域;第二象限(低—高集聚区)主要位于广西、海南、江西等省份,表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值区,但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值较高;第四象限(高一低集聚区)主要是四川、湖北等省份,表明这些省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值区,但周围省份耦合协调度较低。此外,2016 年到 2022 年,第一象限(高一高集聚区)省份数量由 9 个变为 12 个,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省份数量由 12 个变为 14 个,在集聚程度上,第一象限(高一高集聚区)与第三象限(低—低集聚区)都处于扩张态势,不过依靠空间区位优势逐步拉开差距,优势地区暂未完全发挥出对全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整体协同发展的强劲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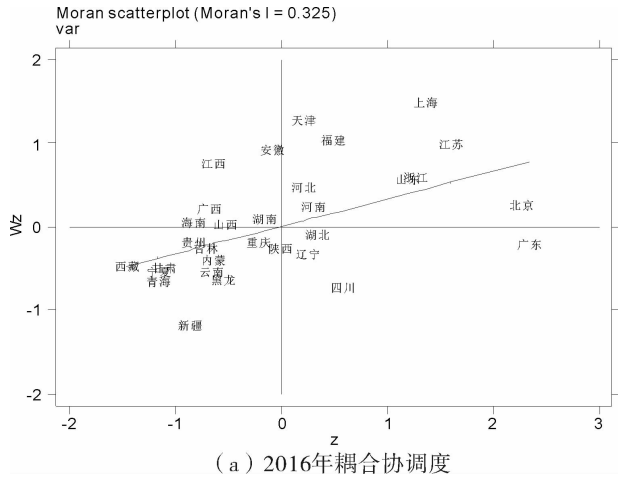
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是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分别选用熵值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法,选取 2016—2022 年中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研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第二,研究期内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态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推移基本保持上升态势;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

第三,从区域差异来看,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

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与不平衡现象逐渐减少。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征。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东北、东部—中部、中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依次缩小,并且东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



趋势,而中部—东北、东部—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差异来源及贡献率来看,各贡献率变化相对平稳,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紧接着是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对耦合协调度差异贡献率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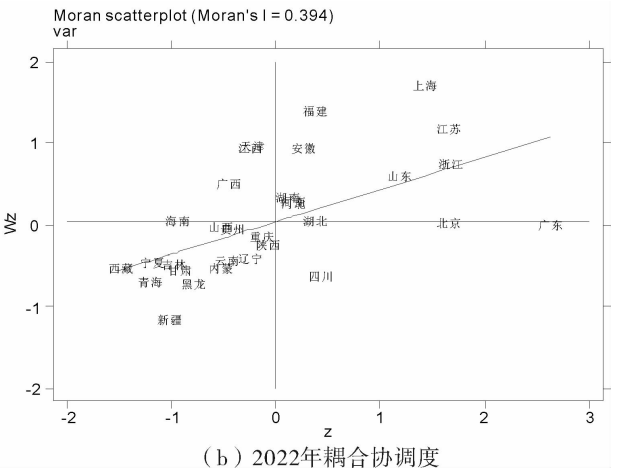


图4 2016、2022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局部 Moran 散点图

第四,研究期内表明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地区存在集聚现象。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状态主要集中在高一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

(二)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实施政策调整。其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将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有效结合,加快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协同发展。其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动态把握两系统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和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确保两系统相互促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解决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不均衡发展问题。其一,重点关注区域差异性发展问题,开展重点扶持和帮扶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引导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快速发展。其二,各地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补足短板,实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相互促进。其三,促进各地区信息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各地区信息差和数字鸿沟,实现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晓玲,韩平.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4,40(1):10-16.

[2] 裴潇,袁帅,罗森.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时空耦合及障碍因子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3,32(10):2045-2059.

[3] 尚娟,王珍梦.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J]. 生态经济,2023,39(3):47-56.

[4] 任雪,刘婉琪,周先东,等. 数字经济概念内涵界定与统计分类改进[J]. 经济学家,2024(1):45-55.

[5] 王军,朱杰,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7):26-42.

[6] ALIMBETOV U S, LARICHKIN F D, KRAUSE N V, et 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Kazakhstan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0(1):1-9.

[7] VUJICA L, TAMARA D. The Digit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s & microelectronics, 2014:1580-1585.

[8] 刘军,杨渊张,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0(6):81-96.

[9] 白雪洁,李琳,宋培. 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1):38-50.

[10] 刘洋,陈晓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8):15-29.

- [11] 缪陆军,陈静,范天正,等.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 南方金融, 2022(2):45-57.
- [12] 王帅. 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2022.
- [13] 汪凌,邹建辉,刘淑敏.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动态演进及空间效应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3,39(18): 97-102.
- [14] 王军,耿建.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2014(4):52-55.
- [15] 张旭,魏福丽,袁旭梅. 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演化[J]. 经济地理,2020,40(2):108-116.
- [16] WANG R.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economy based on the GMM model[J].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20,29(3):2395-2402.
- [17] 郝淑双,朱喜安.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J]. 经济经纬,2019,36(1):10-17.
- [18] 李玉梅,陈洋毅,雷鸣. 技术发展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4,44(1):213-222.
- [19] 钱立华,方琦,鲁政委. 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性研究[J]. 西南金融,2020(12):3-13.
- [20] BALOGUN A, MARKS D, SHARMA R, et al. Assessing the potentials of digitalization as a tool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rban centres[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0,53:101888.
- [21] 胡士华,黄天鉴,王楷.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时空分异、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9):3-19.
- [22] 郑晓云,陈金燕,苏义坤. 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修正耦合模型的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8):164-167.
- [23] 王淑佳,孔伟,任亮,等. 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J]. 自然资源学报,2021,36(3):793-810.
- [24]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 22(4):515-53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JIN Yaya^{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ollege; b.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in Gansu Province Universities, Lanzhou, Gansu 7301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help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elected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2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entropy method, modifi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level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ransitioned from stabilization to rapid growth. The four major regions show obvious spatial non-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overall difference and inequality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gradually decrease,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each system change relatively steadily.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largest.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regions with similar coupling coordination have agglomeration phenomena.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grasp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two systems, implement policy adjustments, carry out key support,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green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数字经济发展与省域绿色创新:赋能还是削弱

郭子煜

(埃克塞特大学 商学院,英国 埃克塞特 EX44PY)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东中西部 2011—2022 年区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 4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 SBM - DEA 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面板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数字经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化环境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产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效率;面板 Tobit 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6

中图分类号:F124.5;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39-08

近年来,低能耗、低污染物排放、高效率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绿色经济发展需要高效的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但是,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创新资源不足、配置效率低下、绿色技术应用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降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开发各个环节之间的深度融合对绿色技术开发与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深远影响。数据资源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源,数字化作为绿色创新驱动的新力量,是助力企业实现减排效应、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魏丽莉、侯宇琦,2022)^[1]。因此,如何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机遇,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对绿色创新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成为学者们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文献回顾

梳理现有文献,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其对绿色技术的影响,另一个是绿色创新效率的评

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其对绿色技术的影响

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的测算与发展。王军等(2021)^[2]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赋予权重,从而获得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但是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彭刚等(2025)^[3]同样采用熵值法,测度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王俊豪、周晟佳(2021)^[4]利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数字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产业未来规模将不断扩大,并呈现关键共性技术、数据集成、数字平台促使数字产业释放融合创新活力的特点。王智茂、纪峰(2025)^[5]基于 CRITIC - G1 - Bonferroni 算子模型测度了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许宪春、张美慧(2020)^[6]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数字经济

收稿日期:2025-02-05

基金项目:2025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视阈下数字金融赋能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25-ZZJH-155);2025 年度河南省高校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数字金融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绩效评价和路径选择”(2025-YYZD-07)

作者简介:郭子煜(2000—),男,河南驻马店人,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与企业管理。

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部分学者就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郭丰、杨上广(2022)^[7]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开发进而降低各地区碳排放规模,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高技术地区更显著。程琼文、陆思宇(2022)^[8]发现适度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促进创新主体间的绿色知识传播,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开发,但是过度的数字技术应用反而耗费过多资源,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绿色技术产生抑制作用。

(二)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两个方面:

在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方面,早期学者主要侧重于对绿色创新产出进行衡量(华振,2011)^[9],但对绿色投入的考虑不足,无法有效衡量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绿色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测算绿色创新效率(董会忠、李旋、张仁杰,2021)^[10],使得测算结果相对更精确。当前,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的主要两类方法分别是参数分析法(SFA、DFA)和非参数分析法(DEA)。Hansen、Birkinshaw(2007)^[11]主张使用非参数分析法(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吴中超(2021)^[12]采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总体绿色创新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吕岩威、谢雁翔(2020)^[13]等学者使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认为使用该方法比CCR-DEA模型得到的结果更准确。

在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两个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在宏观视角的研究方面,Dzemydaite et al(2016)^[14]在对中欧和东欧的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政府支持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罗茜等(2022)^[15]在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外部环境政策压力会促进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因此政府应当合理征收环境税。李涛、刘国燕(2021)^[16]发现随着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研发资源在中国不同区域间的流动越来越便捷,这使得绿色研发资源能够得到更高效配置,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得其绿色创新效率得到最显著提升。刘海英、王殿武(2020)^[17]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能够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开发,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在微观视角的研究方面,Xu(2018)^[18]认为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有助于提高绿色创新技术研发成功率,而充足的研发经费是绿色创新的前提,二者同时具备才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赵玉林、刘超(2022)^[19]发现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力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合理配置,将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Zhou(2012)^[20]认为绿色技术具有外部性,并且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保护环境的相关社会责任,因而相对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创新意愿。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学者们已经就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在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将数字经济作为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来进行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为此,本文将基于中国2011—2022年区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具体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绿色创新的实现源自对绿色创新投入资源的高效整理和利用。绿色创新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包括资源的挑选、融合和拼凑。相关绿色创新主体只有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绿色创新资源集合,才能够在绿色创新竞争过程中胜出。在数字经济时代,绿色创新主体可以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来实现和完成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得到更广泛应用,绿色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将实现数据化、透明化和智能化,各个环节对创新资源的需求都将得到及时的识别和满足,从而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顺利开发,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地区绿色创新资源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区的技术结构相匹配时,才能更好地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首先,数字经济能够带动绿色创新链条的数字化变革,加速绿色创新知识与技术在绿色创新主体间的融合交互,进而推动实现绿色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绿色创新链条的整体跃迁,有力促进数字经济红利释放以及绿色创新动力提升,能够在有效改善绿色创新资源供需错配的同时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普遍提升。其次,数字经济能够拓展绿色创新资

源配置范围,绿色创新主体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整合内外部绿色创新资源,并通过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与其他绿色创新主体实现信息交流、共享与互换,从而加速人才、知识、技术等绿色创新资源的跨时空整合,充分挖掘现有和潜在绿色创新资源的新用途,使得绿色创新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异质性绿色创新资源的汇集和融合,推动不同绿色创新主体摆脱技术开发惯性,创造新的绿色技术开发路径,拓展绿色创新边界,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不同部门间的密切合作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信息不对称现象广泛存在于绿色创新的各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催生出相关绿色信息平台,打破了不同绿色创新部门原有的信息壁垒,来自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不同绿色创新主体的绿色信息资源得以共享。此时,企业能够及时获取市场对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实时需求情况,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间更容易密切合作,增强企业协同绿色创新能力,从而推动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数字经济能够破除绿色创新信息传递的障碍并增强绿色创新主体的信息检索能力,实现绿色知识的低成本复制与传播。绿色创新主体能够及时更新自身内部知识数据库,降低绿色研发过程中的试错成本,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充足的金融资金保障是企业绿色创新成功的必要前提。由于绿色创新技术难度大、产出周期长、投资不可逆,以及绿色创新过程中相关信息的不透明,这使得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融资约束。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能够将企业生产、经营和绿色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及时向金融机构传递,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机构能够从中筛选出那些绿色创新成功率高的企业并向其提供金融资金,有效提高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绿色创新主体的相关管理部门,能够依托数字技术,掌握绿色创新各个环节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使得管理部门和绿色技术开发部门之间的合作更为密切,提升绿色创新的管理服务效率,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三)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促进

了大量绿色产业的兴起,这将吸引大量高素质科研型人才的流入,从而优化本地区绿色创新产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水平。随着数字经济在其他行业的渗透,这些高素质科研人才也会进一步促进传统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并应用到传统产业,通过对传统产业消费端、生产端、线上和线下的整个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传统产业的生产资源投入种类、规模和结构,绿色能源比重上升,化石能源比重下降,绿色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条得到改进,提高了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

三、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本文将进一步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测度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从实证层面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尚无统一的权威标准,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在参考陆建栖、任文龙(2022)^[21]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①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本文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环境构成,具体指标体系构建显示在表 1 中,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个细分指标的权重,进而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二)绿色创新效率测度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DEA 模型测算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该模型需要投入指标、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相关数据。

对于绿色创新的投入方面,从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和相关能源投入方面考虑。由于各地区的研发人员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故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衡量。研发资金投入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亿元)衡量。各地区的绿色创新活动离不开大量能源的支持,因而采用能源消费量(万吨标煤)和用水总量(亿立方米)衡量能源投入。

对于绿色创新的期望产出方面,如果采用传统的发明专利数量无法真正反映绿色创新,而绿色发

明专利则更能够体现绿色创新在环保、节约和先进性等方面的特点,故本文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2010年推出的专利分类清单,使用Python软件获取各省份相应年份绿色发明专利数据,并用此数据来衡量绿色创新的期望产出。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硬件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正向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正向
	网络设施	千人域名个数	正向
		千人网页个数	正向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正向
数字产业化	通信服务业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正向
		固定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正向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亿元)	正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数(人)	正向
产业数字化	企业电子商务情况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占总企业数比重(%)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正向
		快递(万件)	正向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企业信息化情况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正向
	智力支持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向
数字化环境	政府支持研发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万元)	正向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个)	正向
	研发绩效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正向

对于绿色创新的非期望产出方面,主要从环境污染方面考虑。最优的绿色创新不仅要求追求绿色发明专利产出的最大化,还要求最低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来衡量非期望产出。由于非期望产出变量过多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精确测量,为此采用熵值法,将多个非期望产出转换为一个综合的工业污染综合指数,并最终用此数据来衡量绿色创新的非期望产出。

(三)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各地区2011—2022年区间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测度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不同区域内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最大,平均综合得分为0.2832;西部地区最小,平均综合得分为0.1576。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综合得分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广东、北京和江苏,均处于东部地区,数值分别为0.4909、0.4881和0.4129,得分最低的两个地区分别是青海、新疆和甘肃,均处于西部地区,数值分别为0.1203、0.1281和0.1323。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转型升级最快,数字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所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最高。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完善的投融资体系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数字技术在各个产业的渗透率高,促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因而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表2 各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测度结果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平均得分 (2011—2022年)		绿色创新效率值平均数 (2011—2022年)	
地区	分数	地区	数值
北京	0.4881	北京	1.0000
天津	0.2106	天津	1.0000
河北	0.1903	河北	0.1079
山西	0.1494	山西	0.2081
内蒙古	0.1571	内蒙古	0.1863
辽宁	0.2011	辽宁	0.1617
吉林	0.1494	吉林	0.1742
黑龙江	0.1473	黑龙江	0.1693
上海	0.3425	上海	0.2541
江苏	0.4129	江苏	0.0891
浙江	0.3677	浙江	0.1211
安徽	0.2231	安徽	0.1344
福建	0.2345	福建	0.1391
江西	0.1581	江西	0.1463
山东	0.2897	山东	0.0938
河南	0.1964	河南	0.1040
湖北	0.2308	湖北	0.1231
湖南	0.1861	湖南	0.1204
广东	0.4909	广东	0.0910
广西	0.1458	广西	0.2341
海南	0.1562	海南	1.0000
重庆	0.1783	重庆	0.2651
四川	0.2429	四川	0.1479
贵州	0.1406	贵州	0.2824
云南	0.1459	云南	0.3253
陕西	0.2084	陕西	0.2622
甘肃	0.1323	甘肃	0.2986
青海	0.1203	青海	1.0000
宁夏	0.1342	宁夏	0.4494
新疆	0.1281	新疆	0.2217
东部地区	0.2832	东部地区	0.3385
中部地区	0.1907	中部地区	0.1394
西部地区	0.1576	西部地区	0.3403

从绿色创新效率值来看,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平均数值最高为0.3403,东部地区次之为

0.3385,中部地区最低为 0.1394。西部地区较高的绿色创新效率,表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新能源技术开发政策在西部地区得到了有效落实,绿色创新资源在该地区的配置机制运行良好,有效激发了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活力。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技术水平低、污染和能耗较高的产业后导致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中部地区不仅要高效利用绿色创新资源,还要避免盲目引进低技术、高能耗的产业,减少非期望产出,从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从各省份来看,2011—2022 年区间,绿色创新效率均值排名前 5 位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海南和西部地区的青海与宁夏。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海南集中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拥有强大的绿色技术开发能力、完善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而且上述地区已经将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其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绿色生态保护的加强,催生了西部地区相关绿色技术发展,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青海与宁夏等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 实证模型

在测度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基础上,借助两者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效应。

以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并控制其他可能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由于采用 SBM - DEA 模型测算的绿色创新效率值的取值范围为(0,1],如果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来估计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较大的偏误,所以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来估计截断回归方程。由于固定效应的面板 Tobit 模型无法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故本文的面板 Tobit 回归过程中不考虑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回归。

(二)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效率(*geffi*),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 - DEA 模型测度的绿色创新效率值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运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foundation*)、数字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产业数字化(*digitalization*)以及数字化环境(*environment*)4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进而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并以此数值来衡量。

控制变量。①绿色信贷(*gloan*):绿色信贷能够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参照现有学者的研究方法,使用六大高耗能工业产业^②利息支出占各省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的比率,并将该数据正向化处理来表征绿色信贷。②财政依存度(*gov*):合理的财政依存度意味着政府拥有适当规模的财力支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但是过高的财政依存度意味着该地区政府对市场的主导性过强,不利于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衡量该指标。③环境规制强度(*en*):环境规制是调节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倒逼机制刺激企业创新,进而影响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使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强度。④产业结构(*third*):地区的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所在地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从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衡量产业结构。⑤金融发展水平(*fin*):合理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使用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⑥人口密度(*pd*):本文使用各地区单位面积人口数量的对数值衡量。人口密度决定一个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绿色技术开发和绿色创新效率。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11—2022 年区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与就业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样本个体为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样本容量为 360 个。各年的货币金额数据均已经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到以 2011 年为基期的可比数据。表 3 展示了主要回归变量描述性统计信息。

(四) 基准回归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分别采用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和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来验证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基本影响机制,由于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所以本文主要以随机效应面板的回归结果来解释实证结果。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第(1)(2)列分别为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和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4 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相一致。

表 3 主要回归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量	均值	离散系数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geffi</i>	360	0.2921	0.9894	0.1795	0.0790	1
<i>digit</i>	360	0.2159	0.5558	0.1832	0.0470	0.7090
<i>foundation</i>	360	0.0412	0.6068	0.0362	0.0030	0.1310
<i>industrialization</i>	360	0.0517	0.7389	0.0420	0.0020	0.2231
<i>digitalization</i>	360	0.0742	0.4178	0.0730	0.0110	0.1790
<i>environment</i>	360	0.0512	0.7617	0.0350	0.0000	0.2090
<i>gloan</i>	360	0.4981	0.3614	0.5129	0.0168	0.9061
<i>govgdp</i>	360	0.1481	0.2903	0.1490	0.0889	0.3273
<i>en</i>	360	0.0160	0.6250	0.0121	0.0000	0.0442
<i>fin</i> <i>a</i>	360	3.3470	0.3224	3.1229	1.6878	7.5781
<i>third</i>	360	0.4621	0.2121	0.4632	0.2969	0.8392
<i>pd</i>	360	5.4572	0.2351	5.6621	2.0620	8.2753

表 4 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面板 Tobit

	(1) 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2) 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i>digit</i>	0.1104 *** (0.0420)	0.1104 ** (0.0457)
<i>gloan</i>	0.0004 (0.0127)	0.0004 (0.0091)
<i>gov</i>	0.2542 *** (0.0941)	0.2542 *** (0.0936)
<i>en</i>	0.3217 * (0.1696)	0.3217 * (0.1823)
<i>fin</i> <i>a</i>	0.0145 ** (0.0056)	0.0145 ** (0.0049)
<i>third</i>	0.2494 *** (0.0619)	0.2494 *** (0.0517)
<i>pd</i>	-0.1760 *** (0.0481)	-0.1760 *** (0.0622)
常数项	1.7946 (0.3510)	1.7946 (0.4291)
年份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360	360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控制变量中财政依存度(*go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财政依存度提高能够促进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财政依存度提高后政府不仅拥有更多财力支持企业绿色创新,而且更多财政资金有助于支持地方引进更多高素质绿色创新人才,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产业结构(*thir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发展第三产业能够显著推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相对于高污染物排放的重工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具有低污染、高收益的特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企业绿色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e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促进了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这可能是因为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下高能耗

和高污染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或者停业整顿,导致该类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回报率大幅下降,从而激励企业积极开发绿色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金融发展水平(*fin**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金融发展可以给本地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促进该地区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绿色创新效率良性发展。

人口密度(*p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人口密度不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人口密度过高会造成资源的过高消耗和污染物的过高排放,从而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五)基于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各维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从数字经济各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更高水平的绿色技术开发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从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随着数字产业化步伐加快,各类新型数字应用不断涌现,这使得各类绿色技术更容易在数字产业得到快速、规模化生产,激励企业合理配置资源,加快绿色技术开发,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化环境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数字化环境的不断完善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管理的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数字化应用氛围,从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六)稳健性检验

鉴于绿色创新效率较高有可能会使得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导致内生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

而降低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表 6 中使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因而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数字经济细分维度发展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面板 Tobit

	(1)	(2)	(3)	(4)
<i>foundation</i>	0. 4073 *** (0. 1385)			
<i>industrialization</i>		0. 2890 ** (0. 1429)		
<i>digitalization</i>			0. 1708 (0. 1643)	
<i>environment</i>				0. 2773 ** (0. 1131)
<i>gloan</i>	-0. 0039 (0. 0123)	0. 0014 (0. 0127)	-0. 0020 (0. 0126)	-0. 0014 (0. 0124)
<i>gov</i>	0. 2279 ** (0. 0934)	0. 2679 *** (0. 0913)	0. 2618 *** (0. 0893)	0. 2554 *** (0. 0912)
<i>en</i>	0. 3269 * (0. 1731)	0. 3552 ** (0. 1741)	0. 3687 ** (0. 1760)	0. 3590 ** (0. 1694)
<i>fin</i>	0. 0171 *** (0. 0061)	0. 0150 ** (0. 0066)	0. 0130 ** (0. 0061)	0. 0142 ** (0. 0061)
<i>third</i>	0. 1867 *** (0. 0548)	0. 2036 *** (0. 0554)	0. 1871 *** (0. 0545)	0. 1874 *** (0. 0492)
<i>pd</i>	-0. 1622 *** (0. 0469)	-0. 1594 *** (0. 0471)	-0. 1581 *** (0. 0483)	-0. 1833 *** (0. 0474)
	1. 8349 **	1. 7459 ***	1. 8231 ***	1. 9599 ***
常数项	(0. 3516)	(0. 3640)	(0. 3516)	(0. 3572)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360	360	360	360

注:同上

表 6 稳健性检验

	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固定效应面板 Tobit
<i>L. digit</i>	0. 1587 *** (0. 0469)	0. 1587 *** (0. 0535)
<i>gloan</i>	0. 0021 (0. 0119)	0. 0020 (0. 0077)
<i>gov</i>	0. 2637 *** (0. 0929)	0. 2637 *** (0. 0917)
<i>en</i>	0. 2374 (0. 1927)	0. 2374 (0. 1957)
<i>fin</i>	0. 0141 ** (0. 0066)	0. 0141 ** (0. 0063)
<i>third</i>	0. 2455 ** (0. 0581)	0. 2455 *** (0. 0674)
<i>pd</i>	-0. 2021 *** (0. 0481)	-0. 2021 *** (0. 0527)
常数项	2. 0480 (0. 3748)	2. 0480 (0. 4638)
年份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360	360

注:同上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首先,运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 4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 SBM – DEA 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最后,运用面板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数字经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化环境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产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推进数字信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先进数字技术研发,积极引进数字人才,积极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从而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快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的融合。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构建有利于产业融合的环境,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财政手段支持、引导传统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

第三,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产品消费两侧之间的信息壁垒,扩大绿色创新技术的应用规模,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第四,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提升绿色创新投入要素的质量,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积极改革并完善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体制,培养数字型、创新型的复合型人才。顺应绿色经济发展趋势,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普及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教育。

注释:

- ①因特殊性,本文考察的省份,不包括台湾地区、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 ②六大高耗能产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参考文献:

[1]魏丽莉,侯子琦.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8): 60 – 79.

[2]王军,朱杰,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7):26 – 42.

[3]彭刚,高劲松,沈亚楠.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分异[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4):16 – 31.

[4]王俊豪,周晟佳.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其溢

- 出效应[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3): 103 - 119.
- [5] 王智茂, 纪峰.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5(3): 25 - 46.
- [6] 许宪春, 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23 - 41.
- [7] 郭丰, 杨上广, 任毅.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1(3): 45 - 60.
- [8] 成琰文, 陆思宇.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J]. 软科学, 2022(8): 1 - 16.
- [9] 华振. 中国绿色创新绩效研究: 与东北三省的比较分析[J]. 技术经济, 2011, 30(7): 30 - 34.
- [10] 董会忠, 李旋, 张仁杰.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5): 134 - 144.
- [11] HANSEN M T, BIRKINSHAW J.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7, 85(6): 121 - 30, 142.
- [12] 吴中超. 网络结构、创新基础设施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网络 DEA 乘法模型的分析[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2): 79 - 89.
- [13] 吕岩威, 谢雁翔, 楼贤骏.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及收敛趋势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5): 78 - 97.
- [14] DZEMYDAITE G, DZEMYDA I, GALINIENĖ B.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fficiency in new member states of European union: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 sciences, 2015, 10(3): 317 - 327.
- [15] 罗茜, 庄缘, 顾晓燕, 等.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14): 52 - 62.
- [16] 李涛, 刘国燕. 时空压缩下研发资源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19): 37 - 46.
- [17] 刘海英, 王殿武, 尚晶. 绿色信贷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基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视角[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3): 96 - 105.
- [18] XU H. Regional R&D investment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nowledge activities[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 6(3): 183 - 199.
- [19] 赵玉林, 刘超, 潘毛毛. R&D 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4): 49 - 59.
- [20] ZHOU P, ANG B W, WANG H. Energy and CO₂ emission performance i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 non - 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2, 221(3): 625 - 635.
- [21] 陆建栖, 任文龙.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5): 142 - 15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Provincial Green Innovation: Empowering or Weakening

GUO Ziyu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EX44PY, Brita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it constructs a digital economy indicator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digit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unexpected output,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DEA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The panel Tobit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subdivision dimens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whil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panel Tobit model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向

张忠,陈第华*

(福建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新时代推进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医药文化观,加强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从中医药悠久的发展历程、对人和健康的正确认识、从与时俱进的健康照护能力中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在守正中捍卫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在创新中保持中医药文化的生机活力,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搭建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沟通桥梁,彰显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文化自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7

中图分类号:D61;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47-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架构和基本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看待文化的价值,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怎样实现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明为什么要交流互鉴以及怎样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发展,在中医药的定位上,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73};在中医药的价值上,强调它“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123};在继承传统医德上,强调

“我国传统医学历来强调的救死扶伤、道济天下的医德”^[3]。在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借鉴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等理念,以提高治理效能。新时代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有的放矢、系统推进。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医药文化观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以人民性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底色。“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4]103}坚持“二为”方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具体到文艺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收稿日期:2024-12-20

基金项目:2024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巩固探析”(FJ2024TWQX004);2022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进程中良好社会心态培育机制优化研究”(FJ2022B143);2023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之治’视域下乡村老年体育治理现代化研究”(FJ2023MGCA036);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建设研究”(FJ2024XZB063);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新时代福建精气神的三重逻辑”(FJ2024XZHQB88)

作者简介:张忠(1981—),男,福建福州人,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通信作者:陈第华(1985—),男,福建连江人,博士,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治理。

“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4]103}。

世界上没有完全中立、纯而又纯的文化,为什么人服务是文化发展的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4]223}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确保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人民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创作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诉求的高质量文化作品。“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4]2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重要论述,凸显了文化的人民性,这是党的初心使命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坚定人民立场,以多样化形式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的精神需要。

(一)以增强服务人民健康意识为导向加强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

将中医药文化渗透于中医医院运行管理中。在中医医院组织文化建设中凸显中医药文化特色,凝练具有中医药文化色彩的院训、院歌、行为规范、环境形象,使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成为全体职工的共同价值观,增强他们服务人民健康的能力;通过宣传教育、榜样示范等方式将“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深植于每个中医药医务工作者内心,端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行,提高中医医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使广大中医医院、民族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成为群众保健和诊疗的首选,以更加优质、丰富的中医药服务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健康需要。

增强中医药科研机构的中医药文化研究能力。中医药科研机构汇集了大量高端中医药人才,在加强中医药原始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医药典籍、民族医药文献的研究保护,系统挖掘古今中医药名家的人文精神、诊疗经验,通过出版著作、展陈研究成果等方式夯实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能力基础、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建设具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凸显独特性。中医药院校要结合本地中医药文化特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本地名中医思想、中医药科研前沿等内容,充实校园文化内涵;扶持学生中医药文化社团、办好校院自媒体,拓展校园文化发展平台,在润物细无声中指引师生向中医前辈看齐、坚定攻克中医药科研前

沿的信念。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医药院校教学、管理、服务全过程,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见习实习等各方面呈现中医药特色,以服务人民健康需要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专业自信和认同感,引导学生致力于以中医药知识增进人民健康。

(二)以提高全体人民健康能力为目标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

新时代,人民对维持和增进健康空前关注。“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5]增进全体人民的健康素质,最终由全体人民落实。健康维持和增进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作。通过宣传把专业性的中医药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推广,端正人们的健康观念,帮助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顺应媒介革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精品。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最重要的是开展受众分析,提高宣传有效性。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要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市场占有率高、受众面广、文化门槛低的休闲娱乐终端,依从受众视听接收习惯,以情景短剧、歌曲改编等形式向群众推荐中医经典、中医思维、中医诊疗观、中医健康理念等文化精品,丰富中医健康知识储备。

抓准宣传时机,及时回应人民健康需要。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究其根本是对群众的健康教育,把握教育时机是提高教育成效的关键。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要结合时令节气、季节性传染病等时机开展,通过中医药知识宣讲、义诊等活动解释易发病、高发病的生成机理,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疾病,消除恐惧;通过推荐预防方、食疗方案等健康方案,增强人民体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二、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6]536}。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所指。“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33}文化自信是民族自强的精神支柱。“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8]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化建设领域,它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源泉、精神动力。“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9]新时代文化自信主体的广

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说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7]350}。

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提炼为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作为“四个自信”的有机组成部分,写入党章,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根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6]479}。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它源于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8]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是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前提。

(一)从中医药悠久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医药文化自信

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发展史。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经验。春秋之后,扁鹊归纳提出“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法,奠定了中医诊疗的基础;以《黄帝内经》成文为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成型。此后,历经几千年发展,中医药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并对周边国家的传统医药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中医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抗争中,中医药一度面临生死考验^[10]。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中医药面临被取缔的风险。此后,中医药界和有识之士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抗争和请愿活动。迫于压力,“废止中医案”被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和发展空间。虽然中医药界在“废止中医案”中获得了胜利,但此后怀疑、轻视、排斥、打压中医药的现象此起彼伏,甚至出现了“中医是伪科学”的中伤。面对恶意言论,中医药界心无旁骛,以无可辩驳的疗效彰显其独特价值。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在近代以来虽曾出现发展低谷,但总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二)从对人和健康的正确认识体验中医药文化自信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中和为用、阴阳消长等理念,以此为理论内核,构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整体医学观,形成了对人和健康独特且科学的认识。中医的着眼点是“人”,而不是“病”。中医药文化认为,人是完整的人,构成人体的脏腑、经络、形神等在结构上密不可分、功

能上相互影响,形与神俱、形神体用、形神存亡,建构了一个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疾病治疗、养生保健的系统思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医药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自然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要道法自然、顺其自然,遵循与自然一致的阴阳消长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当然,人不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属性。社会生活中,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评价等社会因素都对人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由此,中医学构筑了一个“自然—人—社会”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三者之间既依据自身发展规律相对独立地运行,又通过气的升降出入、阴阳消长、五行制化等规律维持着彼此的协调平衡^[11]。

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中医药文化在健康供给时强调遵从自然规律,顺应四时,同时把人放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理解,在人与环境协调中实现健康。因此,在增进健康中,中医药文化倡导治本,因人因地因时因病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既关注形体,也关注精神,以整体和谐、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世界观正确看待人与健康,实现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价值自洽。可见,中医药文化自信并非盲目自信,而是源于其强劲的生命力和自洽的价值逻辑。

(三)从与时俱进的健康照护能力中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

中医药历史悠久,能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提供有效的健康方案,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健康智慧。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抗疫史上,中医药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医药防治疫病,秉承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愈防复的方针,坚持调和阴阳、扶正祛邪、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原则,根据症候分析核心病机来制定治疗方案,以不变应万变。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医名家通过对多个经典名方加减化裁,筛选出了临床效果显著的方药,有效避免了轻症转重症、普通型转危重型,减轻了患者痛苦,节约了医疗开支。三年抗疫实践,让全世界对中医药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医药在应对疫情中也丰富了防治疫病经验,促进了自身发展。中医药文化自信不是停留在故纸堆的孤芳自赏,而是对中医药与时俱进健康照护能力的理性认同。

三、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反映了一个民族怎样评价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文化发展和文化价值。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6]536}一个追求民族复兴的民族,不可能抛弃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斩断自己的文化根脉,而是要焕发其跨越时代的文化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格局中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掌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也是其基本方法。“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的体系更加完善、学理更加深刻。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坚守根本,守住马克思主义的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12]守住魂脉和根脉,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6]15}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不断根据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一)在守正中捍卫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民健康需要层次的提升,推进中医药改革具有广泛共识性。中医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先进的诊疗技术和方法,但必须守住中医药的根本,巩固中医药文化的主体性,不能邯郸学步。

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在关于人、健康、病理、药物解读方式、经络系统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独特性的认识。中医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人不仅有肉身和脏腑,还包含隐藏在脏腑之后看不见的气机运动,人是气化的人^[13]。基于此,中医形成了整体地、联系地看待世界的世界观,采取“取象比类”的方法防治疾病。“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由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构成的中药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具有治病救人的疗效。至于以何种物体入药,则取决于其“象”。“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下》)象即相像。取象比类绕过逻辑推理和定义,通过药物与人体“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巧妙回答了治病的机理^[14]。中医

以“望、闻、问、切”为主要诊疗手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独特优势。在防病治病中,中医药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治未病中,中医药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从关注治病向关注健康转变,从关注人的疾病向患病的人转变;在重大疾病治疗中,中医药发挥着协同作用,通过中西医协作,提高治病整体效果;在疾病康复中,中医药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养生、保健、调理等方法,防止疾病复发^[15]。这些原创性思维和独特性优势是中医药之所以为中医药的根本所在。

坚守中医药文化的原创性思维、独特性优势,才能避免中医药发展走入歧途。守住中医药文化的根本,必须加强对中医典籍、历代名医临床实践、民间奇方的整理工作,从前人的智慧中吸收养分,夯实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根基。当然,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健康需要以及不确定的健康威胁,中医药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

(二)在创新中保持中医药文化的生机活力

“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6]482}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中医药文化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极力破除与现代生活不相符合的旧观念、旧模式、旧做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发现和运用新技术、新规律,在守正的前提下探索中医药文化更多的可能性。

推进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深化中医药文化内涵,凝练更具共识性、包容性、时代性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中药炮制、中医诊法、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中医养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拉近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现代转型,开发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发展中医药文化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业态,探索中医药文化产业与旅游、研学等行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延伸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6]568}这种平等的文明观为丰富多彩的文明和谐共处创造了可能,也为不同文明交融互鉴提供了前提。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4]401}。他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

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48}。“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6]228}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全球交融互鉴的新理念新主张为如何止住国际纷争、如何实现各国共生共存提供了中国答案,其所强调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16]的理念为廓清人类文明迷思、守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

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不是停留于丰富彼此内容体系,更重要的是从不同文明中提炼应对人类共同发展难题的智慧。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未知的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等健康威胁,需共同应对挑战。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需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6]18}。中医药文化“走出去”,为世界各国提高健康治理成效提供了一套新的方案,也为中医药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极。

(一)搭建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沟通桥梁

中医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印记,中医药文化助力各国健康治理需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各国、各民族创造的医药文化都有其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文化渊源。只有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17]的原则,不随意贬低、否定其他民族的医药文化,尊重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独特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6]539},才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交流互鉴,在交往交融中吸收彼此精华,在丰富各自知识文化体系的同时,使世界医学文明万紫千红。

提高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的沟通成效,关键在于深化中医药原创思维和原创理论研究,凸显中医药文化精华。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必须构建中医药与当地民族医药、西医的沟通桥梁,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厘清中医与西医、中医药与当地传统医药在理论体系、知识结构、诊疗观念、疗效机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异同点,尊重多样化的诊疗模式和文化积淀,以普适性、通识性的话语体系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在地转化。要加快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医药文化宣传的新表述,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医药文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要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受众的个性化传播方式,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二)彰显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是阻碍中医

药文化“走出去”的障碍。在摆脱了缺医少药的束缚后,人们对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西药上市前都必须完成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药品说明书对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用药安全信息解释详尽,这有助于医生提前对症规避用药风险。反观很多中成药,虽投放市场多年,但是不良反应依然是“尚不明确”,导致医生和患者难以提前防控用药风险,出现不良反应也难以与用药建立逻辑关联^[18]。由于缺少特异性诊断指标,临床上重要安全性评价主要采用“排除法”,这既不符合中药特点,也缺少循证药学的支持,制约着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必须摆脱自说自话的论证逻辑,以各国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增强其说服力。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是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支撑^[19]。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必须走出孤芳自赏的误区,以科学证据彰显中医药疗效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不仅是中医药学的新增长点,也是中医药跻身世界医学体系的基础性工程。

(三)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

依靠医师经验为主的个性化诊疗是中医药的显著特征,但这也给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挑战。在跨文化交流中,标准降低了沟通门槛,尤其在由高度依赖标准的现代医学所主导的医学世界中,标准成了医学交流的通用语言。“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20]当前,中医药已走进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发展必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21],通过构建涵盖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标准化体系,减少中医药术语、操作技术、诊疗指南等不规范现象。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既有利于中医药规范化发展,也为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互联互通的载体。

循序渐进推进中医标准化建设,要继续完善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和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解决中医药概念过大、表述方式繁杂的问题,避免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时术语在地转化的歧义与滥用^[22]。在中医药技术诊疗规范的基础上,加快中医病症临床诊疗指南、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规范等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提高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重大疾病的规范化水平,减少因中医师临床能力良莠不齐影响疗效的现象^[23]。中医标准化建设服务于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可以减少中医药跨文化交流的文化障碍。在制定标准时要避免过于机械、僵化,以防标准成为限制中医药从业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束缚^[24]。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必须与国际接轨,中医药机构要密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联系沟通,

积极将相关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成为全球中医药诊疗的共识。

参考文献:

[1]郭建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贡献[N].北京日报,2023-11-13(9).

[2]习近平.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87.

[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5]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27.

[6]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7]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

[10]张婷婷.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论争[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46-150.

[11]陈震霖,张硕,张景明,等.论中医整体观的基本特性[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9):1348-1351.

[12]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

是,2023(20):4-9.

[13]邓杨春.伤寒气化六经浅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9):3399-3404.

[14]王前.“取象比类”的前世今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9-17(6).

[15]全小林.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N].经济日报,2019-02-13(11).

[16]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3(14):4-8.

[17]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96.

[18]肖小河.与时俱进,加强中药安全性建设[N].中国中医药报,2018-07-16(3).

[19]王琦.中医药高质量“走出去”,需提升辨识度、参与度、贡献度[N].光明日报,2023-10-21(7).

[20]习近平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6-09-13(1).

[2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86.

[22]田开宇,郑森,池晓华.中医药国际传播中术语语音译规范的探讨[J].医学与哲学,2022(20):69-71.

[23]施展,王燕平,史楠楠,等.中医药标准化研究述评[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1):30-33.

[24]裴中阳,胡安霞,段志光.复杂性视角下中医药治理体系优化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3(3):309-31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Practice Direc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Lead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ZHANG Zhong, CHEN Dihua*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22, China)

Abstract: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s guidance,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view of TCM cultur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CM culture;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in TCM culture by emphasizing the long history of TCM, correcting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and health, and advancing health care capabilities with the times; It is crucial to defend the subjectivity of TCM culture while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CM cultur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It is vital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TCM culture and other ethnic medicine cultures, highlighting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CM, and promoting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TCM culture.

Key words: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fidence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路径

张书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智慧沉淀,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第二个答案”的逻辑脉络深刻揭示了党的人民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特征。唯有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就要立足政治建设,以创新思维和创新手段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要打造新时代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的政治生态;就要立足新时代组织建设的新特征,持续锤炼自我革命队伍以保持强大的有生力量;就要以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第二个答案”;逻辑基础;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8

中图分类号:R181;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53-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14},旗帜鲜明地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人民监督”的答案相呼应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分别从内因和外因概括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把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当作执政党的实践法则。“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给出的新答案。

一、“第二个答案”的逻辑基础

自我革命理论的形成遵循着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自我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具有明确的历史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理论逻辑十分鲜明;是党的建设实践尤其是新时代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鲜活的实践逻辑。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来源。“第二个答案”是上述逻辑基础的良性互动、不断创新而生发

出来的结论。

(一)“第二个答案”的理论逻辑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思想、重民思想、廉洁思想以及革故鼎新的传统,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滋养。

在古代经典著作《论语》《大学》《孟子》《老子》《淮南子》中,自省自律思想一脉相承。自省自律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自我革命精神,强调通过自我审视、自我修养、自我矫正去培养德行。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敢于进行自我剖析、随时进行自我警示,才能不断修正方向,恪守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蕴含丰富的自我革命精神。“廉”是“房屋的侧角”,延伸为“清白”“公正”“俭约”。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旧唐书·魏征传》)。“廉政”即“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能力、更有义务弘扬廉政文化,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指引,发挥廉政精神内在的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25-02-29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哲学机理与方法论研究”(2024-ZZJH-241)

作者简介:张书霞(1969—),女,河南平舆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典籍里早已有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的“维新”^[3]“求变”^[4]是古圣先贤的气质和风貌。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新政”“革新”,无不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有一些革故鼎新的举措甚至有“脱胎换骨”的奇效,历史上能被称为“盛世”“中兴”的阶段,莫不如此。

其次,自我革命的逻辑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发展到今天,历经挫折而愈加壮大,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其革命性特征。革命性的最基本体现为:“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推进生产力发展的主张”^[5];把人类历史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史”^[6]的主张;把“最终进入‘自由人联合体’”^[7]作为美好理想的主张。唯物辩证法更是自带革命性。“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和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永远要用斗争的眼光处理问题;要想少犯错误,就要“能够学会克服弱点”^[8]。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进行自我否定,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自我革命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著作中系统论述了“为什么建党”“怎样建党”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他很好地解决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问题,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性;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同时,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强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对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9],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民监督下建设“新的作风”以拒腐防变。

邓小平以深厚修养和丰富实践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过系统论述。邓小平指出,党建科学化是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用唯物辩证方法对待新时期党的建设新主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第二个答案”的历史逻辑

回顾党的革命史,共产党人获得了无数的成功,也经受了无数失败。经验丰富,教训也很深刻。成功和失败,都为“第二个答案”的提出积累了历史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逻辑。

首先,“在挫折中摸索‘立党救国’的真理”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主题。自从有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道路探索中有了“主心骨”,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了正确方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革命取得了开天辟地般的革命硕果。但同时,此阶段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也是致命的,先后由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两次大灾难几乎葬送了革命的大好前途。在危机中,正是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化危为安,在此后的征程上也不断地自我净化和自我修复,开启了解放全中国的光辉历程。

其次,面临胜利与执政双重考验的执政党,自我革命成为完成“塑党兴国”的重要抓手。显而易见,革命胜利带来历史方向的重大转变,对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能够在胜利与执政面前都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自我革命”再一次成了标准答案。党在自我革命中淬炼自己的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思想和作风,确保党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党通过整风运动、整党建党运动等自我革命的重大举措,克服官僚腐败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再次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再一次经历华丽转变,确保和延续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再次,新时期,以“兴党富国”为主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把自己锤炼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进程充满风险和考验,一方面,党和国家刚从过去混乱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中摆脱出来,国内存在僵化思想的影响是难免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文化夹杂各种形态的“私货”蜂拥而至。在风险与考验面前,“打铁还需自身硬”,善于进行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给出了完美答卷。加强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建设应对执政风险,加大拒腐防变的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和谐,这些都成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最后,新时代,以“强党强国”为使命,党的自我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二个答案”的概括就是鲜明例证。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伟大目标需要在强大的执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在自我革命中塑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在新征程上“防腐拒变”,实现高质量的长期执政,诠释“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在塑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方面,中国共产党推进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的结合,并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实现高质量长期执政方面,中国共产党梳理百年历史进程,明确地指出,自我革命就是共产党人长期执政的“第二个

答案”。

(三)“第二个答案”的实践逻辑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实践第一”观点的忠实履行者。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自我革命伟大实践落在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概念,对人们提出了在实践中求真知的要求,因为实践无止境。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概念还说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们要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凸显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认知的重要性。这说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只能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要“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对党尽责”^[10]。

其次,“第二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提炼和概括,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标志。”^[11]“第二个答案”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检验和完善,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成功经验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自身建设问题,包括严肃党风、党纪的纯洁性建设,这是贯穿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实践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入手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清洗贪腐及后来警惕“糖衣炮弹”重要举措都是一脉相承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还体现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举措的有力推进上。

再次,“两个答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实现了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是力量之源”的真谛。党坚持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立场”是党不断走向成功的基因密码。从党的宗旨提出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初心”不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也正在见证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中构建的制度体系,不断产生从严治党的内生动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为引领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实践。矛盾的普遍性揭示了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现实。在充满矛盾的社会如何才能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进行系统的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社会的结构体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如何理解社会革命呢?共产党人认为,社会革命终究还是广大人民的社会实践。这当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中国人民社会革命实

践最具开拓性的实践,是指导性的实践,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可见,党的自身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围绕社会革命来展开、为社会革命做贡献,又在社会革命中得到历练,是以人民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等优秀品质来引领社会革命的。

二、“第二个答案”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判断庄严地写进党章修正案,抱定了坚决革命、不怕革命、誓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经过党的二十大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第二个答案”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统一的理论认识对于党的建设、对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对于民族复兴大业都具有决定性意义。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前进道路,唯有继续进行高质量的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才能在伟大斗争中强化党的领导,加快民族复兴步伐。

(一)立足政治建设,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两个答案”探索的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期执政依赖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力量源自人民的拥护,源自政治正确性。立足政治建设,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

首先,从认识上重视政治建设,明确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同时,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使命也需要政治建设。通过政治建设不断强化党性以确保党性的“永不变质”“永不褪色”,以此确保政治方向的正确。自我革命与党的领导辩证统一,自我革命使党的领导更有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自我革命才能顺利展开。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自我革命得以有序开展、方向正确。中国革命史反复证明,党的领导是人民事业的最高政治原则。

要把对党的绝对领导的认识具体化。对于执政党,维持组织的集中统一就意味着领导力;分散领导核心的凝聚力就意味着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成果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两个确立”的提出。“两个确立”是再一次统一认识的过程,也是提高战斗力的过程。通过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保障”^[12]。在今后的奋进征程上,全国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确立指导思想和指导地位,是人民心愿实现的需要,是新时代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需要。

其次,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在政治建设中打造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是事关国家命运、党的前途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斗争中锤炼党性,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所以,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党的领导核心得以巩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树立起党的威信,提高社会主义政治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将来的路怎么走,关键是党的领导。所以,要把握好意识形态领导权,强化执政党凝聚力和影响力。在新时代,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打造更加坚强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至关重要。

再次,以严明的纪律树立党的威信,在斗争中确保党的绝对领导。纪律和作风问题关系着执政党的党性特征。在纪律和作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避免歪风邪气死灰复燃,要抓住问题的根源,深入本质,实现标本兼治。近几年作风建设中“八项规定”的提出产生了良好效果,但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以严明的纪律进行正风肃纪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加强作风建设,才能更好地团结人民,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新时代新征程,要警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变异性。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警觉隐性问题 and 深层问题,更要进行调查研究,练就敏锐发现问题的真本领,真正地落实党的决策部署。

(二) 打造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政治生态

首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严明的纪律整肃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为人民利益前仆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惜,是因为有强大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发挥着内在的作用。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内化在灵魂和血脉里的价值观体系,是稳定地发挥作用的行为标准体系。理想信念反映着一个党员“常修常炼常悟”的所得,反映其思想境界的高低,也体现着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一个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必定能以极高的党性修养来自觉地践行初心,不忘宗旨,规范言行。

其次,打造风清气正的自我革命政治生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敢于同腐败现象做斗争。腐败是长在执政党“脸上”的“毒瘤”,是“政治之癌”,人见人恨。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腐败是很多政府、王朝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对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反腐败斗争也是极其重要的谈论话题。一个党员会因为腐朽思想、腐败行为而丧失根本、丢掉人性;一个政党会因为腐败侵蚀而丧失战斗力、远离人民。丧失根本、丢掉人性的人会被人民所唾弃,丧失战斗力、远离人民的政府和组织终究会被人民推翻。

反腐倡廉是党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也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新型腐败的隐蔽性强,某些特殊行业的腐败行为常常具有专业操作隐蔽性。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就要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警惕隐形腐败和变异腐败,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应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挑战,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再次,以道德建设为抓手,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为政以德”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道德建设,发端于个体而形成蔚然之风。受道德影响的工作风气直接地作用于“政风”,从而影响“民风”和“社风”。可见,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为清明的政治生态、良好的社会风气修好自己的“官德”。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除了规范体系外,要抓好“两头”。一头是考察任用;一头是考核和评价。在考察任用中,要把道德品质作为重要指标,从源头上把握队伍建设的质量关。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实把道德考核与政绩、能力考核相结合,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指标体系,努力打造政治生态建设的良好局面。

(三) 加强组织建设,确保自我革命队伍保持强大的力量

首先,要充分认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还在革命战争的时候,已充分认识到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政党的强大有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作风是前提和保障。革命理想和钢铁纪律在革命事业面前同样重要。纪律和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光荣传统和显著优势。新时代,党把纪律建设同政治建设共同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主要组成部分,突显新的时代特征下纪律建设的突出地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组织建设中,“严守政治规矩”被反复强调,明确“严守政治规矩”的党纪底线。可见,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对于增强自我革命队伍的力量意义重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紧盯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善和改造党的组织,严格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组织建设出问题。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把握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重点,积极探索并推动组织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其次,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正确使用党的权力,在“管好干部”的实践中抓住“关键少数”。抓牢“关键少数”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宝贵经验。党的领导干部要认识到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的责任和使命,自觉地进行自我矫正,做好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

“领头雁”。党的长期执政必须首先抓好、管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要正确使用党的权力,通过“关键少数”树立政治生态的“风向标”,用实际行动告诉人民,权力姓“公”不姓“私”。通过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使自我革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权力结构的现实,使领导干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关注的重点是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这样密切党同人民的关系、正确使用党的权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双重约束下,防止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或滥用权力。领导干部要大力提高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用权为民”。

再次,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发挥基层领导的榜样示范效应。党的基层组织最接地气,在日常与广大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上传下达,搭好广大人民与上级党政部门的“桥梁”,传递上级党组织的各种为民惠民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感受党的温暖;同时,反映人民呼声,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是人民大众最先接触到的党组织,最能让人民感受“党”“国家”“政府”的概念,榜样示范效应巨大。基层组织是党的重要战斗堡垒。从其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来看,基层组织是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我们不能忽视基层组织这个“网”。自我革命的力量源自人民,人民的支持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依靠。只要有群众的地方,基层组织的“网”就应该覆盖到那里。基层党组织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共同织就这张体现党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大“网”。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为党的自我革命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

首先,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党要管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13]。其中,制度规范体系是党长期执政的需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在党内法规制度中,确保党能够“管根本”“管长远”“保全局”,确保党能够管党。制度体系建设可以保证自我革命的持续性,保证自我革命的内容和质量。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党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要求,实现了辩证统一。实现依规依法治党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在党的建设中,也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局面。自我革命发展到使用制度规范体系加强效果的阶段,体现了执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及纯洁性方面的认识的不断深化”^[14]。在

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进程中,提高制度执行力,把制度生命力落实到制度的执行过程中。

其次,建立和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是夯实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实践反复证明,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对改革的成败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没有高质量高标准的监督体系,再好的决策部署也难以得到高质量高标准的执行。所以,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和部门的监察制度建设常常被作为改革的重点工作。我们党建立起来的政治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是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只有在严格高效的制度执行环境中,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充分释放制度优势。因此,党要把强化自身监督作为根本问题来抓,使党内监督发挥统领作用,强化党的监督体系建设。

再次,重构党的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突出自我革命的评价权重。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党要改革完善自我革命的评价体系,在政治生态的土壤中厚植“担当”意识、“清廉”思想,以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为突破口,科学地重构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指标的评价体系,借助评价体系提高评价的权威性、有效性。以评价促进队伍建设的政治性和原则性,有利于把准党风政风社风的“脉搏”,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三、结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经验证明,自我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千秋伟业,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中逐渐成为一种有力的“制度形态”^[15],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美好,能够在长期执政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时代,面对风云际会的世界变局,“人类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16]。中国共产党把准时代主题,再次强调“练好内功”,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深化自我革命,把准从严治党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7]。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旗帜更加鲜明,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自我革命的表述出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1]^[14]“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15]“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16]等。中国共产党明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18]。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将会伴随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而不断丰富和发

展。

新时代新要求,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呈现新内容和新特征,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先进政党的本质属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要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和实践主动,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把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作为事业成功的保障;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通过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来证明“第二个答案”的正确性,并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带领中国人民迈向新的伟大征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大学·中庸[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7.

[3] 诗经[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308.

[4] 周易[M]. 郭彧,注译.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331.

[5] 唐正东.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J]. 阅江学刊,2024(1):13-25.

[6] 黄令坦. 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10):37-46.

[7] 寇东亮. 论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的人类文明观[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9):107-113.

[8] 列宁.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19.

[9] 本报评论部. 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N]. 人民日报,2024-02-06(005).

[10] 李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26(002).

[11] 顾海良. 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思想智慧[J]. 红旗文稿,2024(3):4-9.

[12] 朱思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及现实启示[J]. 2023(11):87-92.

[13] 禹竹蕊.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之动力解析[J]. 理论导刊,2023(12):23-30.

[14] 周航.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宪法展开[J]. 社会主义研究,2023(6):62-70.

[15] 杨现勇.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思想溯源、实践指向与经验启示[J]. 南方论丛,2024(1):14-17.

[16] 陈家刚.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价值与完善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2023(11):12-23.

[17] 李丹琪. 从战略高度认识党的自我革命[N]. 中国教育报,2024-02-29(006).

[18] 柳宝军. 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表征、生成机理及应因之策[J]. 理论导刊,2023(11):19-2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Log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and “the Second Answer”

ZHANG Shuxia

(Library,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elf-revolution” is the “second answer” giv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escape the historical cycle”. The “second answer” is the wisdom accumul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with clear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e logical trajectory of the “second answer” profoundly reveals the people-centered, revolutionary and critical features of the Party. Only through self-revolution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intain its advanced, pure and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party. To achieve self-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ase 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onsolidate its absolute leadership position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means; create a politically pure self-revolution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base on the new features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continuously forge a self-revolutionary team to maintain a strong fighting force;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normative framework as a lever to solidify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self-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Second Answer”; logical basis; practical path

行政处罚视域下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的法律适用

——(2020)浙03行终467号判决评析

边品三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在存在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学理层面应当重视对信访行为的法解释学探究。以重复信访、采用走访形式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上访、在受到训诫后仍再次上访等行为为特征的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实践中颇具普遍性。(2020)浙03行终467号案件对于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行政处罚视域下的法律适用极具典型意义。于行政处罚视域而言,就地域管辖而论,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是否“管辖更为适宜”,取决于越级信访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实际所处何地,在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回到其居住地的状况下,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存在合理性。针对行为的定性,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前3项列举的情形在“扰乱公共秩序”程度方面并不相当,不应予以相同评价,也无法通过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审查,故而并不属于该条第4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关键词:重复信访;越级信访;行政处罚;地域管辖;寻衅滋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09

中图分类号:D922.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59-07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抓手,更是联系群众的坚实桥梁和紧密纽带。信访法治化指的是民众的信访行为以及信访工作机制都应该受到法律规范的严格约束,公权力应当依法行使,民众应当依法依规信访^[1]。国务院2005年颁布《信访条例》^①后,尤其是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以来,信访法治化,将信访纳入“良法善治”的轨道,已然成为理论界的广泛共识。然而,当下有关信访法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访制度的建构与完善^[2-4],却对适用现有规范的法解释学研究欠缺应有的关注。目前,涉及信访的、处于不同效力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已然颇具规模。倘若不对这些规范加以阐释,厘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进而明晰规范的内涵,实务部门在信访实践中便会茫然无措。因此,法解释学研究——查明特定用语在规范中的含义——显然不可或缺。

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信访工作条例》第20条规定,采用走访形式进行信访应当前往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进行。越级信访指违反该条规定,采用走访形式前往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之外的机关、单位信访的行为。就越级信访的法律效果而言,《信访工作条例》第47条第1款有较为清晰的界定,与此同时,该条第2款还将信访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转致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实践中,信访人居住地行政机关常常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对越级信访行为给予行政处罚。^②然而,信访人越级信访的行为应当由何地行政机关管辖,是否属于该项所谓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尚存诸多疑点。本文选取(2020)浙03行终467号行政判决书为分析对象,首先从基本案情中归纳出相关问题,然后从解释论的视角对越级信访行政处罚的管辖以及重复越级信访是否属于寻衅滋事等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2025-02-20

作者简介:边品三(1998—),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行政法。

一、基本案情与问题归纳

(一) 基本案情

2017年以来,蔡晓东就宏都小区安置房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分配的户型及楼层、工程决算未审计等诸多问题,运用信件、网件、走访等多样化形式,频繁向温州市信访局、浙江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信访,各部门均已给予答复或处理。蔡晓东还于2019年2月18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4月11日奔赴浙江省信访局信访,6月13日再度前往国家信访局信访,其诉求均聚焦于反映宏都小区建设工程质量以及房屋分配等相关问题。2019年8月27日,瑞安市公安局针对蔡晓东的信访行为实施了训诫。

2019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期间,蔡晓东与案外人贾应迪同往北京,至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住建部等部门进行信访,诉求仍为宏都小区房屋建设及分配相关问题。瑞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20日认为蔡晓东的行为属于以同一事实提出无理诉求、越级信访,已然构成寻衅滋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规定,决定对蔡晓东处以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蔡晓东对此不服,便于2020年1月20日向瑞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瑞安市人民政府于同年2月25日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蔡晓东继而在同年3月13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以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瑞安市人民法院判定:蔡晓东在2019年期间累计出现4次越级走访行为,并且在被公安机关训诫之后,依旧再次进京上访。蔡晓东的有关信访事项在得到有关单位的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多次越级进京上访,该行为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国家信访秩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的规定,对蔡晓东处以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准确无误。

二审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一,蔡晓东的信访行为虽然发生于北京,但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对蔡晓东信访的起因、诉求等情况了解更为透彻,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规定,由该局负责处理并无不妥之处;其二,蔡晓东自2017年以来频繁到国家、省、市各级信访部门信访,2019年更是多次赴杭进京信访,在历经训诫、被告知需依法维权之后,仍执意前往北京信访,此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在信访过程中存在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瑞安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

应予以纠正。

(二) 问题归纳

第一,越级信访行为究竟应当由何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二,重复越级信访行为^③到底是否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范畴?

二、越级信访行为的地域管辖

(一) 越级信访行为地域管辖的规范

越级信访行为的管辖的争议焦点在于地域管辖,即由何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的越级信访行为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行政处罚法》对于行政处罚的地域管辖以违法行为发生地行政机关管辖为原则,这主要是考虑发生地是违法行为的核心要素以及避免多头执法、相互推诿。但是,行政处罚地域管辖权多元化也有其优点,可以保证违法行为打击力量的丰富,还可以避免被排除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即使发现了违法行为,也会因不享有管辖权而放弃监管的问题。^[5]因此,尽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仍然以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为原则,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地域管辖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该款只是规定了在“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下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情形下都有管辖权。如果认为居住地公安机关理所当然“管辖更为适宜”,显然没有必要再写明这个要件。更何况该款对于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依然坚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的原则,这更表明需要对“管辖更为适宜”这个要件进行实质性的理解。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公安机关需要举证证明存在“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从而符合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

与其他对行政处罚地域管辖进行明确的另行规定的法规^④不同,该款中“管辖更为适宜”是一个不确定概念,需要进行价值补充^[6],探求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7]。否则,该条作为一个模糊的弹性条款,容易成为各个公安机关争揽或者推诿管辖的理由^[8]。然而,笔者以“管辖更为适宜”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上检索相关案例,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判决对此进行论述,往往仅根据被告公安

机关是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就依据该条得出该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的结论,全然忽略了“管辖更为适宜”这个要件,说理并不充分。^⑤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无权威判决提供对该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方案。因此,应当探寻该条款的旨意,也即法律的规范目的,从而确定该款的适用案型^[9]。

(二)越级信访案型中“管辖更为适宜”的界定

1. 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范目的

如上文所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通过不确定概念对地域管辖另行规定,显然有必要探求该款的规范目的。《行政处罚法》第22条放开地域管辖权的设定权限,是考虑行政处罚案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赋予下位规范进一步细化各类行政处罚地域管辖规定的权限,以求更好地贯彻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范目的。因此,尽管该款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然而在适用于行政处罚案件时,有必要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2条,在规范目的层面达成统一。

针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有释义书认为“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包括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以及更有利于案件的处理^[10]。就《行政处罚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指出,以违法行为的发生地作为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基准点,优点体现于:其一,有利于行政机关及时打击行政违法活动;其二,便于调查、取证,提高工作效率;其三,实现地域管辖固定化,促使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但该释义书同时提到,行政处罚所面对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活动错综复杂,允许拥有权限的特别法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作出特别规定^[11]。另有释义书认为,《行政处罚法》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管辖原则,是基于提升行政机关工作效率方面的考量^[12]。

在学理层面,有观点认为,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管辖原则,即属地管辖原则,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同时便利当事人。而其他法规的特别规定,则是考虑行政处罚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3]。另有观点认为,行政处罚地域管辖应遵循便利当事人、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灵活运用原则^[14]。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行政处罚地域管辖的规范目的包含方便当事人、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以及固定地域管辖权。鉴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1款在“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下,并未排除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所以固

定地域管辖权这一规范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影响,对于“管辖更为适宜”的理解,更多需要着重考虑方便当事人以及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2. “管辖更为适宜”在越级信访案型中的具体化

实践中,越级上访逐渐成为主流,上访群众往往舍近求远,从基层到中央的信访量呈“倒金字塔”结构^[15]。对于越级信访案型,信访人往往更倾向于进京、进省或在重大活动、会议期间到举办地上访。如果认为越级信访是违法行为,那么违法行为发生地自然是信访人到访的信访机构所在地,而非信访人居住地。对于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是否“管辖更为适宜”,本案二审法院判定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对信访的相关事项更清楚属于“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之一。诚然,由于信访事由发生在信访人居住地,该地公安机关方便获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本案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在于“越级”,与具体信访事项并无直接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并不会降低工作效率。

本文认为,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是否属于“管辖更为适宜”应当取决于越级信访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实际身处何地。实践中,越级信访行为被发现时信访人有可能已经回到其居住地,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也有可能仍滞留在信访机构所在地。^⑥对于前者,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既方便当事人,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工作效率,应当认为属于“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形。因此,本案中由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后者,如果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往往需要其他机构配合完成。即便各地驻京办或是维稳工作组本身就有劝返的职责,就行政处罚而言还是需要由当地公安机关移交相关证据材料,徒增工作负担,也没有方便信访人,同时冲击了管辖的固定性。因此,如果信访人仍在信访地,则应当回归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的原则。

三、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上的评价

对本案中信访人的行为进行梳理,可知信访人受到违法评价的行为包括:重复信访、采用走访形式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上访、在受到训诫后仍再次上访等行为,本文将其统一表述为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信访工作条例》并没有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设立行政处罚,而是使用转致规范的立法技术,使应受行政处罚的信访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范。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并无针对信访行为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

过适用该法第26条第4项这一兜底条款,也即将应受行政处罚的信访行为界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进行处罚,且非正常上访行为在“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中的占比颇高。

(一)“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界定

兜底条款具有扩张法律规范的范围,避免法律漏洞的功能,历来备受立法者青睐,成为一项重要的立法技术^[16]。然而,与不确定概念类似,兜底条款也存在内容含糊的缺点^[17]。围绕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与边界,理论与实务中一直存有争议。在刑法领域,由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明确性要求,对于兜底条款的运用始终持高度审慎态度^[18]。过于宽泛的兜底规定或许被视为变相允许类推解释,进而引发法理层面的争议。相较而言,在行政法领域,为了灵活应对多样化的违法形态,立法者常在法律规范中设置兜底条款,不过这也滋生了执法不确定性以及滥用风险。实践中,部分执法机关倾向于将各种难以归类的行为纳入兜底条款予以处理,然而这种“口袋条款”式的适用方式极易突破法律原有的打击范畴,背离立法初衷。

具体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其文字表述颇为宽泛,如何精准把握“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边界,在司法实务中并不明晰。由于缺乏明确列举,这一条款在不同地域、不同案件中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由此可见,该兜底条款在治安处罚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倘若对其放任扩张使用,极有可能出现将正常的社会行为不当刑罚化的情形。因此,对于兜底条款的运用,应当遵循谦抑原则,严格限定在与前项列举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相当的情形之内,谨防其被滥用以扩大处罚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书指出,从形式上看,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横行霸道、打群架,破坏公共秩序,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从动机上讲,寻衅滋事一般不是完全为了某种个人的利害冲突,还包括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或者为寻求精神刺激,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等^[19]。因此,应当从行为与动机两个维度理解寻衅滋事行为。

在行为层面,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是一项兜底规定,目的在于将前项没有列举但仍应界定为寻衅滋事的行为纳入条文,予以处罚,但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兜底条款涵盖的情形应当与前项列举的情形在规范目的上予以相同评价。该条的规范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所谓秩序,指各种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可以根据对某个部分的

了解获得对其余部分的正确预期的事态^[20]。但仅解答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公共秩序同样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因此,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理解应当回到前项列举的情形之中。换言之,并非任何处于“扰乱公共秩序”语义边界内的行为都应当被界定为寻衅滋事行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应当理解为与前项列举的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在“扰乱公共秩序”上程度相当的行为,借此避免兜底条款的滥用。

在动机层面,尽管动机并非寻衅滋事行为的构成要素,但有助于对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判断。应当注意寻衅滋事不是单纯为了某种物质利益,而是包括某种卑劣的“精神需求”,即所谓寻求刺激或卑鄙欲念的满足。

(二)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之证伪

在行为层面,如上文所述,“其他寻衅滋事行为”需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前3项列举的行为在扰乱公共秩序上程度相当,在认定时需要关注系争案型与前项列举行为的共性。不难看出,该条前3项列举的行为常常会导致不特定的人身、财产损失。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官方释义书,寻衅滋事行为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财产利益,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19]。本文认为,对该条应当理解为不特定的人身、财产利益是公共秩序的载体之一,相当程度的不特定的人身、财产侵害损害了属于社会交往中的全体公民的信赖利益,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信任感与安全感^[21]。行为人是通过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侵害以达到对社会秩序破坏的目的^[22]。由此,与该条前项列举行为程度相当的侵害不特定人身、财产利益即为该条所指向的扰乱公共秩序,这才是“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含义。至于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应当适用第三章第一节的其他条文,而非将其认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以免产生体系上的混乱。就此而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3]25号)中将违法信访导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而非第26条的立场可资赞同。

如上文所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将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分解成数个行为。但无论是重复信访、采用走访形式越级信访、在得到有关单位答复后仍以同一事由上访还是在受到训诫后仍再次上访,尽管有扰乱信访秩序的嫌疑,但似乎都没有造成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前3项列举情形程度相当的不特

定的人身、财产损害。因此,从行为层面看,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并不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此外,从信访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角度进行考量,信访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一种方式,其正当性受到法律 and 政策的肯定。对于重复越级上访等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程序规定进行规范管理,但不应动辄上升到治安处罚层面,更不能将正常的信访诉求视为扰乱公共秩序予以制裁。如果信访人在维权过程中并未实施其他违法过激行为,仅因多次上访或违反了逐级走访的程序要求就受到治安处罚,这未免有违《信访工作条例》的规范目的,也可能对公民行使合法权利产生寒蝉效应。解决信访问题应侧重于法治化的制度疏导和矛盾化解,而非简单依赖处罚手段,行政处罚的适用边界应当谨慎把握,既要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又要防止侵蚀公民正当权利的空间。

在动机层面,对一般的重复越级信访而言,应当认为信访人的目的还是在于信访事项的解决。在没有证据证明其目的是寻求刺激、发泄不满时,也不应将其认定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三)比例原则下重复越级信访行政处罚的实质正当性审查

行政处罚行为作为一种公权力干预手段,其适用不仅需满足法律形式的要求,更应符合实质正当性的要求,其中尤以比例原则为关键。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应当适合于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适当性),在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权益侵害最小的措施(必要性),并且所获得的利益应大于损害的法益(均衡性)。

首先,对适当性原则进行分析。行政处罚是为了制止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公共秩序。但在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中,行为人主观上大多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表达和申诉,并非为寻求精神刺激或宣泄社会不满。这种行为尽管形式上违反了信访程序,但从实质角度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6 条前 3 项规定的结伙斗殴、任意毁损财物、追逐拦截他人等明显针对社会秩序破坏的行为相比,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其不加区分地纳入兜底条款,不仅无法准确打击实际违法行为,更可能产生过度处罚现象,进而引发社会不满。因此,在适当性原则下,对一般的重复越级信访行为适用行政处罚并不恰当。

其次,在必要性原则层面,即使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违反了信访程序,也未必只有通过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才能实现目的。实际上,相

关法律法规已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设计了非惩罚性的规制手段,如训诫、劝返、告诫等,这些更为轻缓的措施已足以提醒和引导信访人回归正常途径。而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带有强烈的惩罚色彩,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足以维护公共秩序时才具有必要性。本文所评析案件中,当事人虽然存在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但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公共秩序混乱或者对不特定人群的具体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因此行政拘留等惩罚手段显然超出必要范围。

最后,在均衡性原则下,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应与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应。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虽然形式上可能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程序,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公共秩序混乱,更没有造成不特定主体的人身、财产损害。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远低于如结伙斗殴、任意毁损财物、强拿硬要等寻衅滋事行为。如果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没有明显维护公共秩序的收益,却导致了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损害,存在处罚强度与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匹配,从而违背了均衡性原则的要求。这不仅不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反而可能损害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任。

综合比例原则的上述 3 项要求可见,在重复越级信访行为中,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6 条第 4 项难以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实践中之所以仍存在将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简单适用兜底条款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执法部门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没有充分考虑行政处罚措施的实质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行政执法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足够的法治意识,易将行政处罚简单化、工具化。因此,为避免重复越级信访行为被不当纳入寻衅滋事兜底条款的范畴,应当强调严格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评估是否存在其他更为适宜、更为轻缓的规制方式,严格控制行政处罚措施的适用范围,避免行政权力被滥用,防止出现权利救济渠道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失衡。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公民合法信访权益,也符合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综上所述,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并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6 条第 4 项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2020)浙 03 行终 467 号判决的结论可资赞同。由此可知,一些规范信访行为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的认定并不准确,至少是不明确的^⑦。

四、结语

(2020)浙 03 行终 467 号案例虽然并非权威案例,但其观点突破了长久以来认为重复越级信访行

为构成寻衅滋事行为的观点,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予以重视。本文针对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对其在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地域管辖以及是否构成寻衅滋事行为问题展开研究,完善了对本案争点的论证,相信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以本案为原型的案型,尚待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明确“管辖更为适宜”所考虑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明晰寻衅滋事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等。在更抽象的层面,与民法等重视法解释学研究的法律部门不同,在行政法领域,尤其是对于信访法治化的研究,或许是由于规范供给不足,或许是因为政策导向性更强,理论上并不十分强调法律解释与法学方法。然而,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盘”与“自留地”,在存在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法解释学应当在研究层面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研究中致力于形成逻辑严谨、价值无冲突的法律体系,并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这个体系,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注释:

- ①该条例已于2022年5月1日废止,被《信访工作条例》取代。
- 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519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900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809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吉行申44号行政裁定书。
- ③本文将本案信访人的重复信访、以走访形式越级信访、收到答复后就同一事由再次信访、被训诫后再次信访等行为表述为重复越级信访行为。本文所谓的重复越级信访行为在实践中有一定代表性,仅指单纯的重复、以走访形式越级信访,并无吵闹、聚集等过激行为。
- ④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2022年修订)第3条,《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20年修正)第4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15年修正)第6条。
- ⑤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2123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618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6293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申248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881号行政裁定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书。
- 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519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551号行政裁定书。
- ⑦如杭州市萧山区五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置非法信访行为的通告》第二点第五项,温州市鹿城区六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打击缠访、闹访、扰序以及越级上访等违法信访行为的通告》第二点第五项,均认为反复越级上访行为本身应受到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 [1]陈柏峰.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J].中外法学,2016,28(5):1202-1203.
- [2]彭小龙.涉诉信访治理的正当性与法治化:1978—2015年实践探索的分析[J].法学研究,2016,38(5):86-107.
- [3]杨小军.信访法治化改革与完善研究[J].中国法学,2013(5):22-33.
- [4]张红,王世柱.社会治理转型与信访法治化改革[J].法学,2016(9):34-42.
- [5]熊樟林.行政处罚地域管辖权的设定规则:《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第21条评介[J].中国法律评论,2020(5):39-40.
- [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85-186.
- [7]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2.
- [8]张泽涛.规范对民营企业刑事立案的制度设置[J].法学,2020(9):158.
- [9]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M].6版.蒋毅,季红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8.
- [10]孙茂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32.
- [1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4-56.
- [12]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162.
- [13]胡建森.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386.
- [14]关保英.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418.
- [15]陈广胜.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5(4):184.
- [16]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5,27(2):530.
- [17]黎宏.“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J].法学评论,2008(5):46.
- [18]张明楷.兜底规定的类型与适用[J].清华法学,2025(1):26-46.
- [1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72.
- [2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54.
- [21]李世阳.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分化[J].法学评论,2021,39(2):178.
- [22]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J].中国法学,2015(3):26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Legal Application of Repeated Cross-Level Petition Behaviour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 Commentary on the Judgement of Case No. 467 (2020) of Zhejiang 03 Administrative Final
BIAN Pinsan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China)

Abstract: Where there are effec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force, theoretic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udy of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petitioning acts. The behaviour of repeated appeals is common in practice, which is characterised by repeating petitions by visiting higher authorities to petition, petitioning for the same reason even after getting a reply from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petitioning again even after being admonished. Case No. 467 (2020) of Zhejiang 03 administrative final is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the repeated acts of petitioning at a higher level under the view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 the contex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with regard to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whether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of the petitioner's place of residence has "jurisdiction over significant cases" depends on where the petitioner was actually located when the act of repeated letters and visits was detected, and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of the petitioner's place of residence to take jurisdiction if the petitioner returned to the place where he/she resided when the act was detected. With regard to the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act, the act of repeated petitions does not have the same degree of "disturbance of public order" as the situations listed in the first three subparagraphs of article 26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Law, and should not be evaluated in the same way, and therefore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category of "other provocative behaviours" in subparagraph 4 of that article.

Key words: repeated petition; cross-level petitio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provocative behaviour

(上接第 28 页)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Knowledge Flow and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utput

REN Bingchao¹, DU Siyuan²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Faculty of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and the flow of knowled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output.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knowledge flow on the enterprise IP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P output, and knowledge flow plays a mediating role. Data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IP output power by improving their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In addition,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results under firm size, ownership type, and industr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on the enterprise IP output leve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sample group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subgroup.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 of knowledge flow,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o help Chinese enterprises steadily improv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level.

Key words: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knowledge flow; knowledge absorp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utput

编写按: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故事”。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营造红军长征研究的浓厚学术氛围,本栏目特开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以飨读者。

严肃、严明、严格: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

丁俊萍,李秉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严守纪律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条件。严守纪律守的是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明的军事纪律、严格的群众纪律。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以严肃的政治纪律铸造军魂、以严明的军事纪律执行命令、以严格的群众纪律凝聚民心,打造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命铁军,完成了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长征。

关键词:红军;长征;纪律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0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66-0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其中包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1]。严守纪律守的是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明的军事纪律、严格的群众纪律。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堵、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民族地域矛盾,红军何以突破重围、绝境重生?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拖不垮?原因是多方面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党的正确领导、革命的英雄主义、铁一般的纪律等,都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密码”。本文考察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既揭示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又彰显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严肃政治、纯净思想,以严肃的政治纪律铸造军魂

“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2]政治

纪律是党的纪律的根基。红军纪律教育的首要内容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严肃的政治纪律,是党领导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纪律指针。

(一)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红军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既是政治纪律,也是军事纪律。党指挥红军,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在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以及红军对党的指挥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并非机械的等级遵从,而是通过政治纪律服从与理想信念跟从的双重规范,实现“党指挥枪”,同时使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成为锻造政治忠诚的熔炉。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深刻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八七会议后,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新时期。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

收稿日期:2025-02-10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

作者简介:丁俊萍(1955—),女,安徽芜湖人,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等。

领导。此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65-66}。

长征途中召开的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实际上明确了红军军委对党负责,这既是对红军领导干部层的政治纪律规定,也是对广大红军战士的政治纪律教育。1935年1月1日,红军即将强渡乌江,需制定渡江之后的行动方针,故召开猴场会议。会议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书记处和军委保持与军队的密切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4]2},并要求军委必须在战斗前汇报作战方针、时间和地点。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明确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这些规定,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新领导集体的军事意图有时并不能为广大红军战士所立刻理解。严肃的政治纪律要求红军维护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即使思想有分歧,也能避免各部队各行其是,做到行动一致、坚决服从。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沙窝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4]277},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可见,长征途中不断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政治纪律教育,是红军长征中纪律教育的关键一环。

沙窝会议提出,“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地)为苏维埃革命斗争到底”。对政治纪律的遵守,“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4]281}。红军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在团结配合、相互应援之中,体现在许多部队和个人为了大局利益做出的局部牺牲。无论是红七军团为主力部队开路,还是在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的部队在极端困境下为保障大部队的顺利撤退而英勇牺牲,都是红军对党中央指示绝对服从的体现。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军渡金沙江时,所有部队都服从于渡河司令部的指挥,“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5]。

政治纪律的规训,有时难以触及军队每一个神经末梢,艰苦的行军仍易使部分红军战士信念动摇,出现开小差的现象。红军政治委员、指导员在政治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回忆录《离开老家的一天》生动记录了政治纪律教育融入红军日常生活的画面,“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歌唱《直到最后一个人》,将严肃的政治纪律潜移默化植入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中^{[6]195-196}。回忆录《大王山上行路难》则是有的红军战士长征中面临信念动摇的一个缩影,身处寒冷饥饿之中,有情绪、想放弃是人之常情^{[6]235-238}。“政治工作人员耐心的(地)鼓动他们跟上队伍,大家又慢慢的(地)前进。”^{[6]236}正是由于长征途中政治工作人员不断的纪律教育、将士们严格地遵守纪律,红军才能在长征的熔炉中将自己锻造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

(二) 坚决维护党的团结

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红军将士必须坚守的政治纪律。面对长征途中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目标之一是纯净思想、反对分裂、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绝非空洞口号,体现在党中央以政治纪律化解消弭分裂风险,体现在红军将士以政治信仰支撑自己英勇向前。

长征途中,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不服从党中央决策,擅自率领部分红军南下,另立党的“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坚定地贯彻团结统一的原则,维护了红军的整体性。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4]309},并指出要“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4]310}。张闻天通过分析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应该通过讨论、批评、解释的方式,“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4]312}。林育英指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4]519}。维护党的团结的政治纪律得到反复强调。

长征路远,加之战斗频繁,忍饥挨饿和负伤前行是红军战士时常要面临的事情。艰难的外部环境考验着红军政治的坚定性,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发挥着强大的激励作用。《长征纪实》记载:“愈是困难,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愈是发挥得好。”^{[7]531-532}在草地的短暂休憩间隙,或在政治委员和指战员的组织下,或红军战士们自发开展文娱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象。川籍战士说评书、摆龙门阵,革命乐观主义在红军士兵心中流转^{[7]532}。《红军长征记》记录了《夜行军的一幕》,展

现了红军夜行军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6]215-218}。面对艰苦的生活与行军,路途上红军时而歌唱时而畅谈,团结、勇敢、乐观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着每一位红军战士。由于“部队的日常工作制度,始终坚持不懈;在严重的困难面前,部队的团结和组织纪律观念更强了”^{[7]532}。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政策文件建构了纪律框架,成为自上而下的政治纪律教育。政治委员的思想工作、宣传员的宣传工作、行军间隙的文娱活动,以及行军途中形成的精神氛围,共同构成了红军的自我政治纪律教育。政令刚性与精神韧性的有机结合,使政治纪律从纸面规范转化为红军的自觉行动,使红军在长征中能够始终坚守政治纪律,完成长征的壮举。

二、严明军纪、雷厉风行,以严明的军事纪律执行命令

长征途中,红军的军事纪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行军纪律,二是生活纪律,三是战斗纪律。铁的军纪关系到行军顺利、红军形象的塑造、战斗目标的达成。陈云指出,“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4]405},可见严明的军事纪律,是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是红军正确执行战术、完成军事目标的纪律保障。

(一)行军纪律教育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时常趁黑夜行军,甚至与敌人擦肩而过,这需要严守行军纪律,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行军纪律有着切合实际的具体要求,例如,夜行军时,如果“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6]214}。长征伊始总政治部的政治工作训令也要求红军“严格的(地)注意行军的肃静与秩序,维持严整的行军序列”。同时,训令还给出了教育红军战士遵守行军纪律的具体措施,“团政治处可用白布或白纸预先写些大字的夜行军须知的标语与鼓动口号,利用月光在大路转弯或有标兵处,置于路旁,由后卫部队收拾”^{[8]588}。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记载,通过敌人可能设卡的道路时,总政治部会“通令各单位检查行军纪律,并作通过公路的政治动员,晚间组织会餐和文艺晚会”^[9]。

《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一文,从卫生医疗角度记述了行军中的纪律。例如,在途经雪山时,红军战士要“多穿衣服,饱吃食物”,“每人要带强心药数包,及济众水一小瓶”^{[6]664}等。而在松潘战役前进途中山多田少,红军战士则要每人背足十五斤粮

食,“十五斤粮至少须食半月,更困难时应减食,吃至二十天以上”^{[4]244}。同时规定,“严禁少带多食、浪费抛弃、打埋伏与破坏纪律,犯者严罚,由禁食、背粮直至开除军籍”^{[4]245}。行军纪律教育经常融入日常行军中,由政治委员、排长、班长等以身作则。例如,在长征初期红军行军需要担负辎重,《大苗山上》记录:“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却毫无损坏”^{[10]101},刘排长身先士卒,用性命保卫着器材。大苗山上行军难是红军整个长征的小小缩影,而先锋战士一次次对纪律的身体力行,既是行军纪律的落地,也是对其他红军战士的纪律教育与带动。

(二)生活纪律教育

红军长征途径多地且人数众多,易影响途经地百姓的生活,故需生活纪律的约束。生活纪律落在实处,体现为各种具体而细微的规定。1934年11月《红星》报发表《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制定了七条纪律。其中,第七条要求“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11],这是为了防止红军数万名战士行军、安营扎寨时随地大小便对当地百姓生活造成不良影响。1935年1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有关生活纪律的“注意”就有5条:“4.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6.不乱买东西吃!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8.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12]从红军的集体性来看,上万人的集体行动必然会影响村落、村镇的生活环境,中央不断的训令、通令,经常性的纪律检查,保证了红军生活纪律的执行。

1935年4月10日出版的第14期《红星》报,发表了题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的文章,再次强调“严整纪律是目前我们(党)争取地方居民,创造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一切破坏纪律的行为,“把遵守纪律提到我们生活的最高位!”^[13]从红军战士个体来看,长征途中为适应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战士们的恋爱、结婚、生育都有严格纪律规定。行军途中“女战士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前已谈了恋爱的,不准在征途中结婚;已经结婚的,不准生小孩”。违犯“政策”的,要受“军纪处分”^[14]。集体性的纪律规训多数时候表现为对群众的尊重和维护,易于遵守和执行,而个体性的纪律要求则更考验红军战士的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战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经受住了长征途中的纪律考验。

(三) 战斗纪律教育

红军官兵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坚决服从战斗指挥,在政治上遵守政治纪律,在行动上服从战斗纪律。四渡赤水时,部队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佯攻诱敌等命令,以纪律严明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飞夺泸定桥时,突击队员顶着枪林弹雨坚决执行冲锋指令,用生命诠释战斗纪律。红军之所以能不断突围,严守战斗纪律是关键。

1934年10月长征之始,李富春就强调“严格遵守射击纪律与战斗纪律”^{[8]599},严明的军纪伴随战略转移的始终。红军在迂回斡旋、渡江过河时,要采取多种战略战术甚至障眼法,这都依靠红军战士对指示的坚决执行。强渡湘江的战役中,党中央发出指令,“要求明确的(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的(地)协同动作”,“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15]。四渡赤水河时,党中央每一次都明确规定了渡河地点、时限以及渡河后的行动^{[16]20-28}。其中第四次渡赤水河时,朱德强调,“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16]26}。巧渡金沙江时,各部队未到江边前,就被告知渡江纪律,要求各部到江边时必须停止前进,不能走近船旁。中央军委规定好迅速渡江的路线后,强调“各兵团应严格执行此计划之规定,关于路线行程及作战部署之每一步的实施均关渡江大计,应力求协同动作不得违悞”^{[4]146}。正是纪律严明且执行坚决,红军能够在转移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最终顺利渡河。

演唱战斗歌曲的方式深化了红军将士对军纪的理解与执行。《提高红军纪律歌》的歌词有:“提高红军铁的纪律,保障战争的胜利”“军纪风纪战场纪律,平时好坏关系战时胜利”“上级命令坚决执行,毫不动摇毫不犹疑”“遵守时间动作迅速,整齐清洁爱护武器”^{[6]685}等,经过红军将士的集体传唱,严明的军纪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党中央通告训令的军纪刚性、指战员军纪教育的引导性、红军战斗精神的感染性,形成了红军严守严明军事纪律的内外动力。

三、严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以严格的群众纪律凝聚民心

红军长征是完全没有后方的流动作战,部队的给养保障比在根据地时要困难得多。保障的不足则容易使军队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但红军是执行群众纪律的模范。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提出,“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的(地)与脱离群众、

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8]585}。红军长征过程中穿过藏族、苗族、彝族、回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区域,在不同的民族区域,党中央都要根据当地民族风俗做出一些纪律规定,使官兵做到对当地群众秋毫无犯。红军严守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根据形势丰富其内涵,塑造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并因此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一) 维护广大工农群众利益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4]43}。红军是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人民军队,维护广大工农的利益,是红军在长征中能得到人民群众帮助的根本原因。“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4]43}

长征中严守群众纪律首先体现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的优良作风。区别于政策训令的规训,从红军战士个体与群众交往的视角来观察群众纪律教育更为生动。《聂都游击队的记述》中记录,游击队对群众态度和蔼,“没收土豪的东西,分给劳苦群众,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对工农群众东西,不许侵犯一针一线”,“群众与游击队好像亲兄弟一样”^{[6]229}。《占领宜章城》记录,红军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6]248},《干事去!》记录了红军救济失业工人^{[6]250},《粤汉路旁》记录了红军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6]252}。可见,缴获土豪的财物归公,不只是归于红军集体,也用于改善群众的生活,红军扎根群众绝不是政治空话。

其次,红军十分注意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为应对长征途中的一些群众不愿与红军交易这一情况,红军将三大纪律其中一条“买卖公平”扩充为“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11],从群众实际出发,替群众着想。《胜利后的一幕》记录一位红军战士误把墨汁当作牛乳购买来喝而出了糗,与商铺老板争吵,其他红军战士纷纷“批评他,制止他这种脱离群众的举动”^{[6]211},最后以这位红军战士的道歉而结束。陈云在西行见闻录中记录,红军“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4]400}。

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红军严守筹粮纪律。群众的粮食“要用钱买或用茶叶换,无钱时要给购粮证,说明将来还钱或茶叶”^{[4]249}。1935年5月,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说明红军“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

足”^{[16]29}。7月,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等发布《中央决议售粮政策》,再次强调:“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他应照价收买。”^[17]

如上所述,通过纪律规定来教育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执行纪律得到群众拥护,形成良性循环。这一过程既是纪律教育的开展,也是纪律遵守的达成。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长征中,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民族隔阂和矛盾较深的困境。党中央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出台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律和规定,赢得了各族群众的支持。1935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1)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2)绝对的(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3)严厉的(地)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4]163}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这是红军穿行诸多少数民族地区而不受阻碍的原因。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苗族群众很多,李富春制定了《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原文如下:“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8]这一指示是经过前期调查而了解到苗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之后作出的,规定了绝不杀牛等纪律,避免与苗族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既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也赢得了苗族群众的支持。1935年5月,红军经过彝族聚居区域,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内容清晰易懂,“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16]29}。此等话语深入人心,加之红军身体力行,最终赢得了彝族群众的支持,许多彝族青年加入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入西康^①,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并分别发布了《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纪律规定^{[10]624}。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的行动,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疑虑,赢得了信任,取得了民心。红军不仅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区域,而且吸纳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有志青年加入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四、红军长征途中纪律教育的特点与启示

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以铁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史诗。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中,红军的纪律教育通过自上而下的严格纪律规训和精神文化感染相结合的途径,形成了“政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性循环,使红军在长征中遵守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明的军事纪律、严格的群众纪律,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19],“长征永远在路上”^[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纪律刚性约束党员干部,以精神感染引导“关键少数”,形成遵规守纪的良好氛围,才能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20]。

(一) 纪律规训与精神感染相结合

红军长征中的纪律教育具有纪律规训与精神感染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并由此产生强大的内驱力量。红军长征途中的纪律规训以中央下达的政令、训令和通令为核心,建立了严密的纪律框架,自上而下地进行纪律教育。这些命令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行军中的注意事项和战斗中的命令执行,为红军提供了遵循纪律的方向和准则,使红军“有纪律可依”。行军途中,红军将领、党员干部身先士卒践行纪律,政治委员、宣传员讲述纪律,红军战士演唱行军歌曲、战斗歌曲、纪律歌曲等文化艺术作品,将纪律融入生活。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以身作则,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驻扎时,都严格遵守纪律,成为战士们们的榜样,维护军纪严明,使军心稳定。政治委员和宣传员在一线开展政治工作,不断将纪律的要求与革命的理想相结合,激励战士们将纪律视为信仰与使命。红军在行军途中自发开展的歌唱表演、晚会活动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革命乐观主义氛围。战士们通过唱歌、念顺口溜等形式,舒缓长时间行军的疲劳,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将纪律内化为一种自觉。在这中间,行军歌曲、战斗歌曲、纪律歌曲等革命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与传播,成为红军精神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红军战士们的情感与信念,在无形中强化了战士们对纪律的认同,使纪律教育从“硬性”规矩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精神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纪律教育和精神感染,使红军在长征这条充满险阻的路上,始终严守纪律,攻坚克难,英勇向前。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汲取红军长征中纪律教育的有效经验,将纪律规训与精神文化感染有机结合。党组织既要通过严明的制度确保纪律的刚性,又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只有使纪律约束与思想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21]。

(二)“政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性循环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3]296}。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基本观点,对纪律的实践同样是检验纪律教育成效的标准。“政令教育—纪律执行—群众反馈”的良性循环,是红军长征中纪律教育的又一鲜明特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央发布的有关规定建立了纪律的基础框架,对红军战士形成了初步的纪律约束。然而,长征中的纪律教育并非单纯依赖上级的命令与规定,更在于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与反馈。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时局动荡,普通百姓长期处于受压迫之下,但纪律严明的红军却能迅速赢得群众的支持。红军帮助途经地的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开仓放粮,救济失业工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优良的作风使红军最终取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看到红军对待自己与他人一视同仁、严守纪律、不谋私利,主动为红军提供帮助,甚至受到革命精神的感染而加入红军。群众的即时反馈成了红军纪律教育形成闭环的关键节点。红军纪律愈是严明,群众愈是欢迎,支持愈是坚定。得到反馈的红军更加严格要求自身保持良好纪律,维护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群众的认同不仅帮助红军解决了后勤补给和路途向导的实际问题,更让红军深刻感受到纪律带来的力量与意义。这种良性互动形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促成了长征中纪律教育的良性循环。

以长征途中的纪律教育为镜,新时代纪律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纪律制度的严格约束,更应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注重群众反馈以深化纪律教育的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22]。党的纪律建设需要扎根人民,以人民的反馈作为评价纪律教育成效的标准。当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党的纪律带来的公正与秩序时,纪律教育的效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注释:

①西康省是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一个省,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10-22(02).

[2] 中共中央.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陈云. 陈云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5.

[6]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M]. 刘统,整理注释.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7] 刘波,杜福增,等. 长征纪实(上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成仿吾. 长征回忆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50.

[10] 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段刘娇,邓强. 从《红星》报看红军长征中的纪律建设 [J]. 长征学刊,2025(1).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献和研究(1985 年汇编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8.

[13] 肖居孝,王敏. 长征路上红军如何严明群众纪律 [J]. 党史文苑,2020(7).

[14] 叶心瑜. 红军长征轶事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8.

[15] 中央档案馆. 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7.

[16] 朱德. 朱德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河南与长征

韩洪泉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摘要: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征程中居于特殊地位,影响深远。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加强长征文化建设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建好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重要意义。河南与长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其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北上先锋突围转战地”等更成为河南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多年来,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新时代的河南长征文化建设要继续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以克服历史条件局限,进一步加强统筹以探索高效协作机制,进一步打造精品以做强河南长征品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创造新的成就。

关键词:长征文化;红军长征;长征精神;红色文化;河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1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72-08

1934年至1936年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影响深远。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既书写下一部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起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又积淀为一脉厚重深沉的红色文化。河南与长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河南与四支长征队伍之一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关联尤为密切,既是长征的重要决策地和重要出发地,也是长征部队的重要作战地和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还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和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河南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从红色文化的视角对河南与长征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河南在百年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新时代推动长征文化传承发展、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有益镜鉴。

一、河南在长征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河南的地位非常突出。它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转战地,也是多支长征部队(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重要来源地。作为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豫陕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同时,在长征精神的熔铸和赓续、长征文化的积淀和发展过程中,河南也都占有重要一席。这都彰显了河南在长征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一)河南是长征行动的重要决策地

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要决策地。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行动,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1933年10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再转入中央苏区,向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1934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出《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认为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

收稿日期:2025-01-20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红军长征史”(21@ZH048)

作者简介:韩洪泉(1981—),男,山东沾化人,法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国防大学首届名师名家工程人选(青年英才),兼任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长征文化等。

在适宜的时候应当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豫南桐柏山区建立新的苏区。2月25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并加按语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一个参考的材料”^{[1]112}。省委收到《建议》后,4月间经过讨论认为困难较大难于实行,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苏区,改向原根据地的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并写成书面报告上报中央。7月1日,省委又收到2月12日的中央指示信和6月13日中央与中革军委联合发出的军事训令,经研究后仍确定以保持和逐渐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其后随着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省委关于战略转移的酝酿逐渐接近成熟,但仍未能下定决心。8月底,程子华奉命从中央苏区辗转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卡房(河南罗山县境内),向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周恩来在指示中明确指出红二十五军要实行战略转移,并对选择新根据地的条件作了详细指示^{[1]115}。当时率红二十五军在豫皖边活动的省委收到郑位三的来信后,立即率领部队赶回豫鄂边地区。11月11日,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14次常委会会议(即花山寨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花山寨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去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确定以平汉线以西豫鄂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花山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关于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酝酿和决策最终确定。

(二)河南是长征部队的重要出发地

河南罗山县的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1934年下半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红二十五军一直处于艰难的转战之中。11月初收到郑位三来信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指挥在鄂豫皖边葛藤山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兼程西进,先后突破敌军4道封锁线,于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50公里的斛山寨地区,并在这里与“追剿”之敌10个团展开激战,取得毙伤敌4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为接下来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并召开了花山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部队进行了领导人调整和部队整编,迅速做好出征的准备工作。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部队西移至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

第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等4个团共2980余人。在紧张的准备中,向全军指战员着重进行了“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明确人员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2]。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从何家冲出发挥师西进,正式踏上长征之路。出发之际,省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宣布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

(三)河南是长征突围的重要作战地

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主要在河南省境转战,鏖战独树镇更成为长征中的经典战例。1934年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以南的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5支队进攻后,当晚乘敌部署间隙,由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迈出了战略转移的关键一步。进入河南、湖北交界的桐柏山区后,鉴于该地区不利于立足发展,省委决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并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佯攻湖北枣阳,然后转向进入河南桐柏县北上,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路,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谷田、刘庄铺、贾楼等地北进至驻马店西北地区,于11月25日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准备在方城县独树镇附近通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恶劣天气下与优势之敌遭遇并展开激战。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军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奋勇当先,全军官兵顽强战斗,最终得以转危为安,连夜突出重围,在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于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其后,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向陕西南部前进,经一行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于12月4日到达卢氏县叫河附近。在敌军已控制入陕大道、对我形成前堵后追的态势下,红二十五军在一位名叫陈廷贤的货郎帮助下,由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县城南的隐蔽小路,迅速把敌人甩在身后,于12月8日突破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即箭杆岭)进入陕西境内,进入了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的新时期。此外,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曾进入河南卢氏、淅川等县境内转战,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四)河南是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

河南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力量的重要来源地。在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中,豫籍将士占有相当比重,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所载长征时期牺牲的《营以上干部烈士名录》统

计,河南籍烈士就有46人,其中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牺牲的有袁良慧(河南济源县人)、毛德贵(河南人)、杨刚(河南人)、陈英琦(河南开封市人)、杨春华(河南人)、胡宗万(河南新县人)等;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牺牲的有耿协丰(河南光山县人)、刘栋勋(河南罗山县人)、余娃子(河南罗山县人)、袁永庆(河南新县人)、胡光祖(河南商城县人)、黄绍宽(河南商城县人)、林培松(河南新县人)、叶道武(河南新县人)、卢炎文(河南光山县人)、郭启焰(河南新县人)、魏新涛(河南人)、陈学柱(河南商城县人)、王振亚(河南商城县人)、丁先华(河南新县人)、何立池(河南新县人)、韩家仁(河南光山县人)、漆承龙(河南商城县人)、罗明焕(河南新县人)、吴立斌(河南商城县人)、吴启松(河南商城县人)、胡山宗(河南光山县人)、高继贤(河南光山县人)、丁绵莲(河南商城县人)、周绍城(河南商城县人)、胡永香(河南新县人)、韩文吉(河南光山县人)、黄耀宗(河南商城县人)、沈家铎(河南商城县人)、韩家松(河南光山县人)、林树松(河南新县人)、张子义(河南商城县人)、徐其坤(河南商城县人)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牺牲的有易德高(河南商城县人)、叶光宏(河南商城县人)、刘传根(河南商城县人)、吴焕先(河南新县人)、吴维儒(河南新县人)、杜本润(河南新县人)、宋国兴(河南新县人)、卢祖和(河南新县人)、罗文直(河南新县人)等^[3]。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豫籍将士所占比重尤大,主要来自豫南地区的新县、商城、固始、潢川、光山、罗山等县^[4]。以许世友(河南新县人)为代表的豫籍开国将帅中,绝大多数参加过长征。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焕先(河南新县人),历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为长征胜利和鄂豫陕根据地创建作出卓越贡献,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指挥部队南渡汭河时与敌激战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是将士们公认的红二十五军“军魂”,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双百人物)。

(五)河南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

长征书写了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了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长征精神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长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河南以其在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之地。伟大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具体内涵,都在长征前后红军在河南的转战历程中得到生动体现,这里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熔铸生成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有些甚至是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环节。比如,红二十五军全体红军将士听从党的号令,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打远游击”,最先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出征和转战期间,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战,勇越平汉路、鏖战独树镇、巧过铁锁关,长驱1800余里胜利入陕,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决定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沿途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同时结合部队人数较少、行动灵活、敢打硬仗的特点,确定了军事上实行高度机动但又不消极避战的方针,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与鄂豫皖、鄂豫陕根据地以及长征沿途地方党组织之间密切合作、精诚团结,与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主动配合、积极策应,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比如,红二十五军在河南转战期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统战政策,深入发动和教育群众,沿途党组织和群众热心带路、筹集粮草、送水送饭等,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河南长征文化资源的类型与蕴涵

长征文化博大精深,蕴涵丰富,它由特定历史事件中衍生出来,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涵盖了许多相关范畴和领域,外现为“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历时态”的长征文化,从长征时期直到今天,始终在与时俱进中创造发展。“共时态”的长征文化,就其内在结构而言主要包括长征精神文化、长征物质文化和长征制度文化。河南长征文化资源贯穿于两种样态三重结构之中,形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累积,“红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北上先锋突围转战地”更成为河南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集中的领域。

(一)厚重深沉的精神文化

所谓精神文化,一般指在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念、行为准则等。广义的长征精神文化,是指长征文化中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5]。长征精神文化是长征文化的核心

部分,尤以长征精神最为重要,此外作为其生动呈现的长征文学艺术、作为其高级形态的长征学术研究,也都是狭义长征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河南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对此前文已有阐述,下面将从长征文学艺术、长征学术研究等精神文化要素进行考察。

长征文学艺术。红军长征从河南出发和转战的过程中,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沿途群众所创作的诗词、歌谣、标语、绘画等,都是长征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部宣传员和文书的徐兴华,在长征途中创作了歌曲《一支红军出罗山》并流传至今^[6]。1936年黄镇(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创作的《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歌》,当时即在部队广泛传唱,其中就有关于红二十五军从河南出发长征和突围的记载和反映^[7]。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河南信阳籍女红军危拱之,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凤阳花鼓》等,深受红军将士欢迎^[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经典红色歌曲,就是从河南首唱、从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传播直到在全军全国唱响的,其主要创作者是曾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河南新县人)以及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华清^{[9][10]}。新中国成立以来,红二十五军或河南籍的长征将士撰写的回忆录文章(许多都收入《星火燎原》等),在河南创作或发表的长征文学艺术作品等,为数不少,影响颇大,进入新时代以来更是呈现日趋繁荣的发展态势。比如2016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河南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推出了新编越调历史剧《飞夺泸定桥》、交响合唱音乐会《长征组歌》、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八月桂花香》等文艺精品;2020年三门峡市蒲剧院创演的大型原创现代蒲剧《布衣英雄》演绎了货郎陈廷贤带领红二十五军由豫入陕的历史故事,获河南省第15届戏剧大赛“河南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等;2021年,开封市歌舞剧院创演的河南坠子《长征托婴》,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曲艺作品展播;近年来,信阳市陆续推出了电影《红星闪亮》、舞台剧《银杏树下》、歌曲《何家冲,红色的摇篮》、光山花鼓戏《花山寨》、广播剧《“娃娃军”的长征》、长篇小说《大别山》《红二十五军》等一批长征文艺作品。

长征学术研究。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长征学术研究领域,河南省占有重要一席。根据笔者编纂的《长征论著目录》(未刊稿)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出版的

长征主题图书(含内部编印的重要资料)2500余种,许多都涉及河南与长征的内容,其中以红军(以红二十五军为主)长征在河南为主题的就有20余种,出版(印刷)地在河南者有40余种;截至2024年底发表的长征主题文章(含论文集和资料集析出文献,不含长征文艺作品)约有3万篇,其中仅主要以红军长征在河南为题材者约有300篇,此外作者(机构)、发行(编印)地属河南省者,以及包含或涉及红军长征在河南者,也为数不少。以长征著作而论,其中有代表性者有中共新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1985年),卢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广瑾、方十可编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初版,2006年、2016年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书名再版),卢振国著《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蒋建农、刘家齐、江水主编《长征画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郑广瑾编著《长征事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方城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血战独树镇》(1997年首版、2016年修订版),李国城、姜廷玉、张海主编《长征颂》(中央文献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与南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2006年),孙俊杰著《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田青刚、陈显志主编《吴焕先》(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胡培刚、彭国运主编《红色花山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征战南阳》(2016年),马福运主编《长征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共信阳市党史研究室编著《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长征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孙俊杰主编《情深谊长》(海燕出版社2021年版),牛宁主编《河南罗山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修缮工程实录》(学苑出版社2023年版),尹霞著《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中共罗山县委宣传部编著《北上,从何家冲出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版),等等。多年来,河南省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史、红军长征转战河南、吴焕先研究等领域,都推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机构策划推出了《长征画典》《长征事典》《长征颂》等有影响的重点图书;《河南日报》《信阳日报》《党的生活》等对长征纪念活动和长征文化建设持续跟踪报道,《史学月刊》《党史博览》

《学习论坛》《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都成为长征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近年来,河南省学术界牵头或参与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河南省高校(如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信阳师范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发表了数十篇以长征研究为主题的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本省的长征研究。

(二) 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相关技术,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生产技术等。长征物质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长征文物是最主要的物质载体。河南长征物质文化遗存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独具特色。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位于信阳市罗山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于1996年11月被列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及军部旧址(何氏祠)、总医院旧址等。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我心中的长征纪念地”中,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成为20个人选单位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位于信阳市光山县的花山寨会议旧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周洼村当年开会的瓦房、红二十五军军部、花山寨顶、将军旧居群等^[11]。位于南阳市方城县的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经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建成,程子华、刘华清分别题词,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12]50-51}。位于三门峡市卢氏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以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为依托,包括红军文化广场、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等,其中军部旧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位于信阳市新县的吴焕先烈士故居和纪念碑、位于洛阳市嵩县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木札岭战斗旧址和纪念碑等。在保护开发利用方面,近年来河南推动出台了《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公布了两批革命文物名录、6个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分县片区和16家河南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基地,革命文物主题游、红色文化游成为社会新时尚,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在党史学习、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的“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线”,就包含罗山县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等处。2005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2016年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信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中也都包含罗山县铁铺乡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等多处长征相关景点。2021年、2022年公布的河南省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中,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

令部旧址、卢氏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地、花山寨会议旧址、吴焕先烈士故居、过山庙红二十五军长征宿营地旧址、红二十五军上马村战斗遗址、柳林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地等一大批长征文物均入选其中。

(三) 赓续传承的制度文化

所谓制度文化,“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包含着制定制度的原则、价值和理念等”^[13]。长征制度文化主要指长征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治化表现,一般包括在长征和新长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价值理念、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长征制度文化在河南有着丰厚的积淀和呈现,在彰显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作用、熔铸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建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对此前文均有涉及。下面仅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为例加以分析。

纪念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仪式和象征,长征纪念活动是长征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呈现。河南省的长征纪念活动,既与全国全军的纪念活动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一般与长征出发和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的重大纪念日相重合,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益。比如,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在郑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省会军民1000余人参加;共青团省委、省青联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座谈会;省社联、省党史工委、省党史学会在信阳联合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报告会,省党史学会举行了学术讨论会;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地市举办了各种小型纪念活动,其他地市也通过召开老红军座谈会和组织参观慰问等活动的方式进行纪念;《河南日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等媒体除跟踪报道相关纪念活动外,还分别选登了纪念文章、回忆录,组织了各类专题纪念节目和文艺节目等;出版部门编辑出版了有关主题图书^[14]。这次纪念的规格和形式,在以后基本被延续下来并与时创新。1996年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座谈会,省党政军领导和老红军、老干部代表出席;省团委、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了全省各界青年代表纪念座谈会;省博物馆主办了“钢铁洪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展览,并在全省各地市巡回展出;省文化厅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7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文艺晚会”;省历史学会等在洛阳举办了“河洛文化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之际,对全省健在的老红军逐一走访看望慰问,并编辑出版了《闪闪的红星——河南省健在的 115 位老红军影像集》;在罗山县举行了“河南省‘文化共享长征行’活动出发仪式”,并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共享工程宣传、农村文化建设等工作;省文联等举办了书法、美术、摄影展,各地市举办了各类座谈会、文艺演出、重走长征路活动等。2016 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在省会郑州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书画展、交响诗会等文艺活动;在大别山干部学院举办了“红军长征与党的建设”学术研讨会;各地区都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如信阳市举办了专题展、书画展、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三门峡市在北京举办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卢氏突围采访座谈会等活动,南阳市在北京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图片展等活动。近年来,河南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更趋常态化,“重走长征路”等群众性活动产生良好反响。比如 2017 年信阳市主办的“北上先锋·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专题展览”外地巡回展览活动和在大别山干部学院开展的“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活动,2019 年在信阳罗山县举行的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大会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暨“花山寨会议”85 周年座谈会,2021 年在全省开展的“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2024 年《河南日报》等举办的“从何家冲再出发——重走长征路 奋进新征程”全媒体大型行进式报道活动和信阳市主办的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大会等。

三、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进路与前瞻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 90 年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几十年来,河南长征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短板,在迎来宝贵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统筹和加强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努力践行的时代课题。

(一) 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回顾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已经起步。如前所述,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工作、创作了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其中包括从河南首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1936 年《共产国际》第 7 卷第 3 期发表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生动记录和高度评价了红二十五军这支从河南出发长征的“儿童军”,“儿童军”“娃娃军”的称谓由此在世界上传播开来。这些都

可视为河南长征文化的初萌。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正式起步。这一时期有许多长征亲历者撰稿的《星火燎原》等刊发的回忆录文章中,反映河南与长征内容的为数不少。1960 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徐海东领导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至 1965 年形成初稿(20 世纪 80 年代又修改形成第二稿和第三稿),其中红二十五军长征包括在河南出发和转战的历史,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在 1986 年、1996 年、2006 年红军长征胜利逢十周年前后,结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和胜利到达陕北、红军长征胜利等重要纪念活动,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不断掀起热潮。1985 年吴焕先牺牲 50 周年之际,中共新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写出版了《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1996 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又有许多长征文物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了一批纪念设施,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受到重视,在 21 世纪以来的红色旅游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借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重大纪念活动带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驱动的东风,进入了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新阶段。河南省对此高度重视,长征文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16 年长征胜利 80 周年前后,在全省范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由省文物局主抓、新县文物局负责开展了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境内的遗址、遗迹专项调查课题,足迹遍及 5 省 40 余市县,行程 1.3 万余公里,调查遗址遗迹 115 处,收集文字材料 170 多万字,拍摄图片 6000 余张,从而进一步摸清了长征革命文物家底^[15]。2020 年以来,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工作,河南省以红二十五军长征红色资源为主线,全面梳理长征文化资源,确定了一系列意义重大、主题鲜明、影响突出的重点建设项目,在弘扬长征精神、整合文化资源、激活红色基因方面走出了一条崭新新路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辩证性考察

河南长征文化建设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丰富、要素齐全。河南是历史文化大省,也是红色文化大省,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留存了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长征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河南省不但孕育了红四方面军、红

二十五军两支长征队伍,而且在长征文化要素方面比较齐全,举凡重要人物(以吴焕先为代表)、重要会议(以花山寨会议为代表)、重要战斗(以麇战独树镇为代表)等均在长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以长征决策地和长征出发地之一成为特色。二是主题聚焦、品牌鲜明。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第一阶段战略转移主要征战地、鄂豫皖和鄂豫陕两个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又是最先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因此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突出红二十五军“北上先锋”鲜明品牌,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出发和在河南转战的长征历史与红色资源为主题主线,形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三是各方重视、协同推进。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历来受到各级重视和各方关注,并形成了持续跟进、久久为功、密切协同的优良作风。以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的建设为例,1986年中共方城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就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修建纪念碑的建议,并争取程子华为纪念碑题写了“烈士精神不死”的碑文,但建碑一事后因故搁浅;1994年,再次推动筹建纪念碑,并请刘华清题写了“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的碑文;1996年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复同意建碑后,于1997年正式动工,同年11月26日独树镇战斗63周年之际终得落成^{[12]49-51}。近年来,河南长征沿线地市不但在省内组织协作共建和巡回展出,而且走出本省在北京组织采访座谈会、专题图片展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河南长征文化的影响力。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既有其独特优势,也存在一些客观主观上的制约条件及现实困境。比如,河南作为同时涵盖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省份,其建设重心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相比较而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地位尚不凸显。再比如,河南主要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和途经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均未经过河南,而且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河南的时间(约20天)和距离(1800余里)都相对较短,因此在地位作用和资源分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局限。又比如,关于河南与长征研究的主要成果聚焦和积淀于红二十五军战史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总体还相对薄弱,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其他一些长征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在《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中尚无专门章节,仅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一目不足2页篇幅,等等。

(三)河南长征文化建设的对策性思考

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

贵的机遇。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的河南长征文化建设必须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新突破、创造新成就。

一是进一步在拓宽视野上下功夫。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立足红二十五军长征长期深耕,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要突破先天不足的局限,就要从“大长征”维度进一步拓宽视野、打开格局。在长征历史进程上,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途经河南至川陕的战略转移,既与后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动有很大关联,也可视为广义长征的重要内容;1935年五六月间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西征的行动,1944年11月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经河南向湘粤边界挺进的行动,被视为未完成的长征或类似长征的战略转移行动,也都可以在宣传和研究中进行比较。在重要人物纪念上,除吴焕先等代表人物外,其他河南籍贯或与河南有重要关联的革命先烈和英雄群体,都可纳入纪念范围统筹考虑。在建设要素选择上,除长征出发和胜利、重要会议和战斗等传统的建设要素和纪念节点外,长征途中以及长征时期那些反映长征历程、折射长征精神、涵育长征文化的相关要素,都可视情纳入建设范畴。

二是进一步在加强统筹上下功夫。河南的长征文化建设,以红二十五军长征在河南沿线为主线,以信阳、南阳、三门峡等6个省辖市17个县(市、区)为重点,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规划中突出“一线”“三片”“五点”总布局,目前已初步取得扎实成效。今后加强长征文化建设,要在进一步加强统筹上下功夫,确保形成合力、带动全局。要加强与省内黄河、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力,加强与红二十五军长征沿线省区(湖北、陕西、甘肃)的协作,加强与鄂豫皖、鄂豫陕根据地属省(湖北、安徽、陕西)的协同,加强与其他长征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协调,在前期成立“红二十五军长征沿线红色文旅联盟暨乡村振兴联盟”、加入“红军长征论坛”联盟城市和“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城市联盟”等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推进长征文化的共建共享、共同繁荣。

三是进一步在打造精品上下功夫。近年来,河南长征文化建设在研究宣传、保护传承、文旅融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红色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初步形成了闪亮的文化名片。今后加强长征文化建设,要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创新发展长征文化的形式内容,着力在推出和打造精品上下功夫用气力。要深入打造特色品牌,聚焦“红二十五军长征

决策地”(以花山寨会议为标志)^[16]、“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以何家冲等处为重点)^[17]、“北上先锋突围转战地”(以独树镇为代表)等,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发挥红军长征主要决策出发地之一、红二十五军长征首要转战地的引领作用。要潜心创作文艺精品,像当年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河南首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样,以长征精神研究揣摩长征历史、服务实践,创造出长征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作。要扎实推进学术研究,依托省内科研机构和研究力量,加强整体研究,推出重点著作,搜集历史资料夯实研究基础,开展专题调研推动实践应用,组织学术活动扩大影响。要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深入探索“红色+”实践经验,把长征文化同传统文化、自然风光、产业布局融为一体,在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古色添彩中带动长征沿线区域乡村振兴,使长征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彰显出更加重要的实践价值、谱写出更加绚丽的河南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2] 本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97.
[3] 本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综述大事记表册[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307-324.
[4] 杨晓军. 记忆建构与价值传承:豫籍红军参加万里长征

述略[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5] 韩洪泉. 长征文化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23:30.
[6] 徐海平. 难忘的红军歌谣[J]. 党史纵览,2006(10).
[7] 黄镇. 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歌[J]. 党的文献,1994(3).
[8] 李安葆. 红军与文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289.
[9] 谢建晓,陈慧,李宜鹏. 豫西边陲兰草花开[N]. 河南日报,2006-09-23(02).
[10] 胡元平,董绍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大别山首先唱响[J]. 党史博览,2012(12).
[11] 胡培刚,彭国运. 红色花山寨[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52.
[12] 中共方城县委党史研究室. 血战独树镇[M]. 内部资料,2016.
[13] 张西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0.
[14]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河南年鉴[M]. 1987:177.
[15] 孙鹏. 河南文化文物年鉴[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75-76.
[16] 蒋宁宇,李萍,张曦. 花山寨会议被称作“小遵义会议”[N]. 南阳晚报,2016-08-19(09).
[17] 何军. 做好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大文章[J]. 协商论坛,2021(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Henan Province and the Long M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 Culture

HAN Hongquan

(School of Politic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2, China)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holds a unique position and exert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ver-a-century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Red 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ng March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arrie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continuing the red legacy,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Henan Province, closely linked to the Long March,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Henan’s role and value are both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Decision-Making Site of the Red 25th Army’s Long March,” “Departure Site of the Red 25th Army’s Long March,” and “Breakthrough and Combat Zon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Vanguard” have become the most distinctive labels. Many years ago, Henan’s Long March culture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a solid progression, yielding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while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juncture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advance Long March culture development in Henan during the new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on past accomplishments, address shortcomings, and innovate while upholding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This requires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to overc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enhancing coordination to establish effici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creating high-quality projects to strengthen Henan’s Long March brand, thereby achieving new breakthroughs and accomplishments.

Key words: Long March culture; the Long March; Long March spirit; red culture; Henan Province

新时代粤剧“出海”新路径探索

李永秀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粤剧是中国戏剧最早在海外传播的古老剧种之一,也是最早受到跨文化经验影响的地方戏剧之一。自19世纪中粤剧就开始在世界各地经历了从萌芽生根到开放革新、繁荣延续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粤剧海外传播是一部优秀的戏剧传播史。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创新是粤剧海外传播的一个永恒话题。其实,粤剧在海外传播早期阶段就率先在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上进行“中西合璧”“洋为粤用”的创新,从这方面来说,粤剧海外传播历程又是一部出色的戏剧守正创新史。新时代背景下,各种媒体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粤剧的“出海”方式。粤剧在“出海”过程中,如何创新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如何创新剧目创作模式与国际合作模式,如何创新翻译模式,如何创新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是亟需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粤剧创新;粤剧传播;粤剧创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2

中图分类号:J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80-09

研究缘起

2024年11月20日至30日,第九届羊城粤剧节在广州举行。仅仅在活动期间,广州文旅海外社媒发布的内容就覆盖了全球45个国家、使用35种语言的用户,引发线上关注与讨论,全网曝光量超6500万次^[1],第九届羊城粤剧节以创新、时尚、国际化的方式成功将粤剧文化推广至全球。2024年7月4日至12日,广东粤剧院的艺术家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了《三水儿女·红头巾》。剧目讲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佛山三水女子为建设新加坡热血沸腾的故事。这部粤剧的创作在保留粤剧传统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在音乐和群体舞蹈中融入了流行元素,剧目创作凸显跨文化性,使新加坡观众与舞台上的人物共情共鸣。我们从这两个粤剧成功的“出海”案例中得到的启示是,新时代粤剧“出海”,创新就是生命力。

粤剧流行范围广阔,遍及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澳门等地;在海外,遍及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华人华侨聚居地区^{[2]436-437}。粤剧也被称为二

黄、梆子,其形成受到了昆、汉、徽、秦、湘、戈等多种剧种的影响与滋润,并吸收了徽剧、汉调、秦腔、湘剧的音乐而形成皮黄剧种^[3]。清末民初“志士班”的出现,使粤剧由最初的“戏棚官话(类似桂林官话)”改为白话(粤语)演唱^{[4]79}。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粤剧伶人到国外表演,他们把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好莱坞电影银幕美学等西方艺术元素融入粤剧,因此粤剧被认为是“最早受到跨文化经验影响的地方戏剧”^{[5]26}。另外,粤剧也是中国戏剧最早在海外传播的剧种之一。19世纪中叶,一段交织着悲惨、愤恨、血泪的华人海外务工史拉开序幕,随着东南亚发现锡矿和种植橡胶,美洲发现金矿和修建铁路,以及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外国资本家需大量海外工人开采、种植和修建铁路,华人因经济原因、被迫、被骗等出海,数量较多,且大部分为粤籍华人^{[6]16}。粤籍华人乡土情结浓郁,为粤剧在海外的广阔传播与落地生根撒播了种子。就像后人所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7]104}。无论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还是欧洲,

收稿日期:2024-03-15

基金项目:2024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广西粤剧名伶研究”(项目批准号:24YSB004)

作者简介:李永秀(1982—),女,广西梧州人,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国际传播。

粤剧都是几代海外华人的乡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8]。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9]¹。新时代背景下,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也变化迅速,粤剧要在新时代“出海”中大放异彩,唯一的方式就是创新,利用好新媒体、AI技术不断探索粤剧“出海”新途径。目前粤剧在“出海”中,也有一些创新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如文章开头所述。但是,完整成熟的戏曲“出海”路径是需要不断实践、研究与总结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内外对粤剧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从多维度、多视角对粤剧的海外传播进行研究,主要通过论文或专著呈现,如论文《从三种社团形态看粤剧在当下新加坡的传播趋势》《近现代粤剧在越南的演出与传播》。在不胜枚举的相关粤剧专著中,较多专著都或多或少提及粤剧的海外传播,如《粤剧史》《广西戏剧史论稿》,都有关于粤剧海外传播的论述。但是,从新时代视角研究粤剧“出海”新路径的相关内容成果却很罕见,尤其对新时代粤剧“出海”的新路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当今,国家重视传统戏剧“走出去”,加上各种媒体和AI技术的快速发展,能为新时代粤剧“出海”提供强大的支持。基于此,本文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探索新时代粤剧“出海”的创新路径,希望能为新时代粤剧“出海”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视角,让世界观众透过粤剧这个切入点认识和理解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一、粤剧海外传播概述

19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下南洋”“闯金山”“走五洲”出国谋生,其中多为广东华人,粤剧也逐渐传播至东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乃至非洲等地。粤剧的海外传播历程是一部充满艰辛与辉煌的历史。以下将粤剧海外传播总结为四个阶段,简要阐述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代表人物和传播特点。

(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粤剧在海外落地生根

东南亚:因为地缘关系,广东、广西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华人移民南洋,粤剧也随之传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缅甸、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其中,新加坡的粤剧演出活动最为活跃^[10]。早在1857年,新加坡就成立了粤剧戏班的

行会组织“梨花堂”。清咸丰四年(1854年),粤剧伶人李文茂率领梨园子弟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十一年起义失败,清朝统治者对粤剧艺人进行捕杀,李文茂和许多粤剧艺人被迫逃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避难^[11],这些艺人使粤剧在东南亚早期的传播更趋专业化、艺术化。

美洲:美国是粤剧在美洲传播的第一站^[12]⁵⁰。冉奈尔德·瑞多尔曾说:“19世纪中叶,当中国先驱一开始离开他们家乡的珠江三角洲,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华裔美国人社区……很快在新世界建立起音乐剧场。”^[13]³⁸1852年10月,《上加州日报》刊登了中国粤剧团“同福堂”(Toog Hook Tong)的广告与报道,并称这是“著名的天国剧团同福堂在美国首秀”^[14]⁸³。此后,不断有粤剧戏班踏上美洲各国的舞台,不仅在美国的多个城市如三藩市(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等地演出,还前往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墨西哥的墨里卡利、墨西哥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南美洲的秘鲁等国家表演^[6]¹⁶⁻¹⁷。20世纪20年代,旧金山有“大舞台”和“大中华”两家戏院经常上演粤剧,这进一步证明了粤剧早期在美洲的影响力^[14]⁸³。

欧洲、大洋洲及其他国家:1867年,广东粤剧戏班在法国第二届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进行表演,这是一次具有粤剧早期向欧洲传播历史意义的演出。到了1950年前后,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的香港移民逐渐增多,香港移民也把粤剧带到了新的居住地^[6]¹⁷。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多处发现金矿,大量中国人前往。到1856年,澳大利亚的华侨总数已达到2.7万人,这些华侨中约90%来自珠江三角洲^[15]²⁶⁻²⁸。粤籍华侨是粤剧在澳大利亚早期传播的主要因素。1852年前后,粤剧戏班开始在墨尔本周边的乡村演出^[16]。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一些粤剧戏班和艺人从泰国、新加坡、缅甸到印度加尔各答、曼谷等城市演出。20世纪初,粤剧团体和艺人到过中东的埃及和非洲的南非演出^[6]¹⁸。

(二)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粤剧从革新、繁盛到式微

辛亥革命前,爱国人士开始创办“志士班”,粤剧表演者穿上时装表演“改良新戏”,剧目创作上是革命的内容,粤剧语言从“戏棚官话”变为“粤语”。1908年,“志士班”开始赴东南亚各地演出^[17]¹³⁰⁵,也随之把革新后的粤剧剧目和表演艺术传播到海外。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可以借助粤剧的“高台教化”而收宣传鼓动之效。许多海外的

戏班也开始编演革命剧目,如南洋的“振天声”“真相”,北美的“新舞台”等等,^{[18]109}当时粤剧还相当于孙中山等革命者和海外华侨沟通联系的桥梁,海外华侨借助粤剧支持祖国革命,而粤剧又因此提升在海外的影响力,推动了剧目内容、表演艺术的革新。

清末民初,因清政府屡禁以至于几近销声匿迹的戏剧女伶,再绽生机,异军突起。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全女班的鼎盛时期,有数十班^{[19]25}。女班的盛行直接促成了粤剧女伶的崛起,不仅革新了粤剧剧目的题材,也拓展了粤剧音乐声腔、表演技巧。这些粤剧女伶源源不断到海外登台演出,也促进了粤剧海外传播与繁荣。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国内粤剧名角辈出的时代,如粤剧名伶薛觉先、马师曾、千里驹等等,特别是粤剧大师薛觉先和马师曾的“争雄”阶段,竞相吸收中西优良艺术元素,不断地改良粤剧,推陈出新。这些粤剧大师也经常到东南亚、美洲登台演出,进一步推动粤剧在海外的蓬勃发展。据《粤剧大辞典》之“粤剧在海外”篇老艺人刘国兴介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演戏的粤剧艺人有 2000 多人^{[20]52},可见其繁盛。随着 40 年代二战爆发,粤侨流离颠沛、食不果腹、忙于生计,也因为新兴影视等文艺行业的冲击,粤剧在海外传播进入了式微阶段。

(三)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粤剧海外传播焕发生机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粤剧团体相继崛起。据 96“羊城国际粤剧节”时期的统计,众多国家成立了粤剧粤曲社团,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牙买加、巴拿马、秘鲁、巴西、委内瑞拉、南非、埃及、印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及毛里求斯等。^[21]此时,粤剧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同时,国内大量的粤剧名伶到海外登台演出,进行文化交流,如当时风靡两广、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的广西粤剧名伶潘楚华,1990 年至 1997 年间,赴美国、新加坡、法国等十多个国家演出。

政府和民间共同办粤剧,使其从唐人街走向国际舞台。1990 年,广州市隆重举办首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后来称“羊城粤剧节”),自 1996 年第二届起,“羊城国际粤剧节”便确立为每四年举办一次。1994 年,在法国华人彭溢威的努力下,欧洲粤剧研究会联合总会在巴黎成立,并举办了首届欧洲华人粤剧大会演,该会演后来成为传统,每年 10 月或 11 月在欧洲各国轮流举办。1990 年,值“四海剧社”创

立 20 周年庆典之际,美国曼哈顿自治区区长罗斯瓦特·梅辛吉出席并表彰该剧社对戏剧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及对亚裔美国群体的积极影响。^[22]1981 年和 1997 年,敦煌剧坊的成员胡桂馨与卢眉桦分别赢得了新加坡政府颁发的“文化奖”^[23]。1994 年,粤剧名伶罗品超,获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美华艺术协会联合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华人财富的增多,粤剧从被主流文化漠视到由政府 and 民间共同保护,粤剧也从唐人街走向了更大的国际舞台。

(四)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粤剧多元化的海外传播

剧目创作内容的多元化。其一,粤剧传统剧目依然在海外传播中发挥作用,如 2017 年广东粤剧院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出的《紫钗记》;2023 年,新加坡敦煌剧坊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粤剧经典《帝女花》。其二,跨文化的剧目创作,如《三水儿女·红头巾》剧目讲述的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佛山三水女子热血奋斗,为新加坡的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故事。这部粤剧剧目的跨文化性,使新加坡观众与舞台上的人物共情共鸣。其三,英语粤剧的创作,如 2002 年新加坡敦煌剧坊黄仕英先生以英文创编“英语粤剧”《清宫遗恨》,该部英语粤剧在曲牌、音乐、程式、布景、服装等方面均与传统粤剧无异,但其唱词、念白均用英语。

传播方式的多元化。20 世纪 90 年代后,粤剧的传播方式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线下演出、线上传播、影视化等多种形式。其一,国内粤剧团体到海外演出交流,如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团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演,国外的华人剧社剧团也经常在唐人街、社区、学校等地方演出。其二,线上演出。如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广州粤剧团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粤剧搬到线上,通过直播平台推出“云端粤剧”系列。其三,粤剧的影视化传播。将粤剧改编为电影或纪录片,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如 2021 年由张险峰执导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2019 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粤剧纪录片《粤剧百年》。

受众群体的多元化。其一,受众地域多元化。粤剧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华人社区中依然拥有较广泛的受众。其二,新生代华裔。加拿大华人颇多,其中广东人及后裔占 60% 以上,加拿大的粤剧学院有十多所,包括悦声粤剧曲艺学院、白雪梅粤剧艺术学院等,这些粤剧学院为华裔三二代移民传承粤剧发挥重要作用。其三,非华裔戏剧爱好

者,如2017年8月,由深圳民间文艺团体打造的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粤剧《夫人计》,在英国爱丁堡艺穗节上演,非华裔是主流观众。

二、新时代粤剧海外传播的窒碍与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也变化迅速,粤剧在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的创新仍显不足,难以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在剧目创作、国际合作、翻译传播以及新媒体应用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壁垒与问题,这些壁垒与问题限制了粤剧在海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一)粤剧“出海”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创新的不足

全球年轻人的兴趣和审美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粤剧国际传播如何创新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喜欢和热爱上粤剧,是新时代背景下粤剧艺术“出海”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与困难。事实上,粤剧作为最早“涉外”的剧种,从早期的海外传播开始,为了与当时海外观众审美趣味相结合,就率先在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上进行“中西合璧”“洋为粤用”的创新。早期海外走埠的粤剧伶人,将海外接触到最新的艺术形式、艺术理念、舞台技术、音乐表演等与传统粤剧相融合。“特别是在旧金山等北美地区走埠的伶人,更容易受到好莱坞电影、西洋乐器以及滑稽秀、综艺秀、墨面秀等舞台表演的熏染。他们极力汲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元素融入粤剧演出之中”^{[18]85},为当时的海外观众在视觉和观感上带来新鲜且共通的文化体验。这些早期“粤剧+西方艺术元素”融合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的成功经验,也为新时代背景下“粤剧+西方艺术元素”的跨界尝试带来启示。然而如何实现中西跨界,如何结合粤剧的传统精髓和海外观众的审美兴趣,如何创新粤剧表现形式与表演艺术是新时代粤剧“出海”面临的新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粤剧的创作形式、创作内容与国际合作存在局限

粤剧在剧目创作上国际化叙事能力有待提高,粤剧剧目创作既要保留粤剧精髓,又要符合国际审美的叙事模式,这是剧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另外,共通性文化理念的植入是粤剧剧目创作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粤剧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在海外传播中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展现和深入挖掘,这给新时代剧目创作提出了新要求。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粤剧剧目创作目前主要依赖

国内的剧作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粤剧创作的国际化。国内剧作家的创作虽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但缺乏与国际戏剧作家的交流与合作,可能导致粤剧在剧目上出现不符合国际审美的叙事模式,共通性文化缺失等情况。其次,在粤剧“出海”表演的剧目中,国内粤剧演员占主导地位,国际华人、非华裔戏剧爱好者参与极少。这种表演模式缺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可能导致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文化隔阂,难以产生共鸣。此外,缺乏国际华人、非华裔戏剧爱好者的参与演出,也限制了粤剧在当地的传播和普及,影响了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同时,粤剧在国际文化品牌建设上的合作还比较罕见,缺乏与国际知名文化机构、艺术团体的深度合作,导致粤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

(三)粤剧翻译存在的壁垒与困难

其一,粤剧翻译融合了语言性、音乐性、文学性的多重挑战,需要翻译者同时精通粤语、音乐、文学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翻译时要注意唱词与音乐的结合,包括乐句、节奏等,这给粤剧翻译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就像新加坡敦煌剧坊粤剧表演艺术家、剧作家黄仕英创作英语粤剧《清宫遗恨》所说:“要对两种理论(音乐和语言)都很了解,要很深入,要对词汇了解很广。英文押韵和中文押韵不一样,完全两回事,同时要把词和广东音乐都考虑,真的很难写……”^{[24]59}粤剧的唱词和念白与广东音乐紧密结合,翻译时既要保留原文的语义,又要考虑音乐的韵律和节奏,可以说粤剧翻译难度极大。其二,粤剧翻译理论有待系统化。从翻译类型来看,戏曲属于文学范畴,粤剧翻译应归属文学翻译。但是粤剧不仅仅具有文学属性,同时也具有音乐属性,这也是戏曲翻译的特殊性。加上粤剧在语言上具有粤语演唱这一地方戏剧特色,因此,粤剧翻译本身属于一个小众化的研究领域,既归属于戏曲翻译的大范畴,又具有粤剧翻译独特的文化表征。如果仅用文学或者戏剧这两大范畴的翻译理论是无法高质量指导和实现粤剧翻译的,这也造成粤剧翻译缺乏有效理论的指导和经验上的广泛积累。同时,在传统戏曲式微的背景下,粤剧翻译乃至整个戏曲翻译得不到翻译界的广泛重视,这使得粤剧翻译成为一个小众化的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关注。这也给粤剧翻译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其三,翻译内容的局限性。目前国内外不少粤剧研究学者、翻译或粤剧从业人员也在粤剧的翻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粤剧剧目翻译、粤剧表演时的双语字幕、创作英语

粤剧、创作马来语粤剧以及剧目海报和剧目简介的翻译方面。然而,对于粤剧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服饰、脸谱、化装、名伶推介等)则涉及较少。这种翻译范围的局限性不仅限制了粤剧文化的全面传播,也影响了海外受众对粤剧艺术的深入理解和兴趣。

(四)粤剧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有待拓展

粤剧19世纪中叶就开始“出海”,有着悠久的“出海”史,从最早在海外华人区表演,到粤剧伶人在不同国家的走埠演出,再到粤剧艺人们在国际舞台的表演与文化交流,其主要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是线下演出,即线下舞台演出为主。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短视频、社交媒体、数字化技术、AI技术为粤剧国际传播提供新机遇与新方式。但是,粤剧在国际传播中,受到资源、技术、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海外传播仍依赖于传统的线下演出,如剧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等,这些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虽然能够直接展示粤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但由于受到地域、时间、观众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导致粤剧国际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因此,目前线上直播、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仍需努力拓展。另外,粤剧的传播对象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社区,而对非华裔受众的吸引力不足,对国际受众反馈和精准传播方面的机制也有待完善,这些都会影响粤剧国际传播的效果。其次,要实现粤剧国际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与拓展,在内容制作、渠道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资金往往成了粤剧国际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创新的瓶颈。

三、新时代粤剧“出海”的新思路与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25]。如何使粤剧“把握住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并创作“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粤剧,是新时代粤剧“出海”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激发活力,推进粤剧表现形式和表演艺术的创新

1. 推进跨界与融合,创新“粤剧+西方艺术元素”“粤剧+国际共通文化元素”的粤剧表现形式,让粤剧国际传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今,中国戏剧与种种现代艺术形式结合,在国内形成了“戏曲+”的新美学风格追求,跨界混搭、艺术融合成为

中国戏曲新的艺术形式。戏曲可以结合影视、流行音乐、综艺、现代舞蹈、游戏竞技、说唱、真人秀、游艺等多种形式,以适应社会对于文化艺术多元化、多维度、多样态需求,让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喜爱戏曲。基于国内的“戏曲+”艺术创新理念与成功实践,粤剧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尝试运用“粤剧+西方艺术元素”“粤剧+国际共通文化元素”的粤剧表现形式进行创新传播。其一,粤剧+西方芭蕾。在国际粤剧表演中将粤剧台步、圆场、云手等动作与芭蕾舞的脚尖旋转、跳跃、手位相融合,这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舞蹈形式相互融合,就像是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在舞台上的一次艺术对话。其二,粤剧+动画。动画作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艺术形式,能为粤剧提供全新的表达方式,能推动粤剧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创作中充分利用强大的AI技术,将粤剧的经典元素与动画技术相结合,通过生动的画面,更具吸引力的视觉、听觉体验和有趣的故事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包括儿童观众。其三,粤剧+游戏。游戏是全球流行的互动娱乐形式,将粤剧融入游戏,通过视觉、听觉和互动体验,能够更全面地展现粤剧的艺术魅力,不仅能够吸引国内年轻观众,也能吸引国外观众,这种跨界融合能为粤剧海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

2. 坚守粤剧传统艺术精髓,同时结合外国受众的兴趣点,彰显粤剧艺术的表现力。在新时代粤剧的“出海”过程中,结合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进行表演艺术的创新,是提升粤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外国人对中国的功夫、中医药、乐器、传统节事活动、舞蹈、剪纸等非常感兴趣。粤剧可以结合这些文化元素创新表演艺术,使其更贴合海外观众的审美和兴趣。例如,“排场戏”和“南派武功”是粤剧的传统精髓,“南派武功”要求功底扎实,难度较高,针对国际受众对中国功夫的兴趣,在粤剧表演中,可以强化武打情节,凸显粤剧“南派功夫”的独特魅力,这不仅能够吸引对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海外观众,还能通过“南派武功”进一步展示粤剧的独有文化。同时,粤剧还可以结合中医药文化,通过剧目创作展现中国传统医学的理念与故事,以此吸引对中医药感兴趣的海外观众。这方面同样可以借鉴中国影视的经验,如2025年春节上演的电影《唐探1990》,就融合了中医的“望、闻、问、切”,也在影片不少的画面中展现了精湛的中国功夫,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3. 尝试让粤剧登上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潮流起来。粤剧在国际表演中,可以尝试紧跟时代年轻人

喜好的方式与潮流,舞台也不仅仅局限于戏剧院的舞台。这方面中国乐器、中国功夫已做了比较勇敢与时尚的尝试,在国际时尚街区、公园、高校草地等场所进行表演,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粤剧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经验,凭借一套粤剧戏服、一位粤剧伶人、一把中国传统乐器,让公园、街道、草地都成为粤剧广阔的国际舞台,表演一段粤剧传统“南派功夫”,或演唱一段经典剧目,或展示粤剧一套身段组合,让粤剧成为国际时尚的风景区,让国际观众对中国粤剧惊鸿一瞥。

(二) 开放视野,推进粤剧剧目创作模式与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

1. 在粤剧剧目创作方面,邀请国际剧作家及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合作,树立粤剧国际形象。中外戏剧艺术家之间的深度合作能有效地提升粤剧“出海”效果,融入国际文化的粤剧更能引起国际观众的兴趣。在合作创作中,注重共通性文化理念的植入,增强文化认同,探索国际化叙事模式。国际剧作家对中国的经典文学或粤剧作品进行大胆创新,从他们的视角诠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跨文化的改写有时更利于帮助国际观众理解、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打造一台成功的国际粤剧作品,在剧目创作上,邀请国际剧作家合作,在合作中注重采用国际叙事的模式,挖掘共通性文化,增强文化认同,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音乐、舞美、服饰这些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要邀请音乐、舞美、服装等设计人员合作。只有当这些创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粤剧有正确认知,他们所呈现出的舞台、粤剧传统服装等才能让国际观众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粤剧,有利于减少“文化折扣”,推动粤剧更好更全面“走出去”。总之,通过邀请国际剧作家及其他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合作,有利于让粤剧与时俱进,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拓宽全球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表达路径,将中国故事和中华文化留在海外观众心中。

2. 推动国内粤剧演员、华裔演员及非华裔演员同台演出,提升粤剧的影响力。艺术的交流是双向的,在粤剧的国际传播中,鼓励来自不同国家二三代华裔演员、非华裔演员或戏剧爱好者同台合作表演,这样不仅仅可以加深两国的友谊,促进表演艺术的交流,更能拉近戏剧演员与各国受众的距离,受众更容易对这样的合作粤剧产生共情共鸣。早在2014年,广西粤剧演员与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演员在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上,共同演出由印度经典文学改编的粤剧《罗摩衍那》,多国演员

的同台演出,不仅使这部粤剧得到了东盟国家观众的喜爱,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进一步提高了粤剧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

3. 加强粤剧文化品牌建设的合作,创新粤剧国际合作模式。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其文化特色不仅体现在剧目内容上,还蕴含在服饰、脸谱、道具、化装等元素中。例如,粤剧的服饰色彩鲜艳图案精美,妆容独具岭南特色,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粤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粤剧的海外传播,可通过开展国际品牌建设的合作,以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种合作形式可以是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品牌建设,也可以是企业等形式的合作品牌建设,通过突出其文化符号和特色元素,可以打造具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化品牌。例如,可以将服饰、脸谱、道具、化装等元素融入珠宝、装饰品、服饰设计中,不仅能够更好地展示粤剧的独特魅力,也有利于塑造这些品牌艺术特色,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有助于粤剧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更加鲜明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三) 与时俱进,加强粤剧艺术翻译及AI技术提供的翻译可能

1. AI技术的迅猛发展能为粤剧的翻译提供有力支持。其一,AI翻译技术能将粤剧需要翻译的内容直接生成多种语言,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例如,AI翻译技术可以根据粤剧剧本文字直接生成多语种版本,而对于粤剧影视作品,强大的AI可以自动生成多语种字幕。其二,AI驱动的实时语音翻译技术能为粤剧艺术的国际交流提供支持,例如,粤剧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粤剧艺术节或粤剧演出中,AI翻译技术可以实现即时语音翻译,打破了语言障碍。另外,不管是线上表演或线下表演,AI翻译技术都能实现实时语音翻译,帮助非粤语观众理解演员的唱词,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其三,AI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粤剧艺术中特有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如服饰、妆容、锣鼓点等等,并能形成多语种版本的文字解说,帮助国际受众更好地理解粤剧的艺术特色。我们在充分利用AI技术的同时,也要正视其存在的不足,粤剧是建立在音乐、语言之上的一种艺术,粤剧唱词的翻译在篇幅和韵律上都有要求与限制,因为要与音乐旋律和谐统一,目前这方面AI翻译技术还存在缺陷,但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将为粤剧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可能性。

2. 加强粤剧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探索。粤剧翻译需要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结合音乐、语

言、文学的多重特点,加强粤剧系统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方面,需观照戏曲翻译与粤剧翻译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戏曲普遍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寻求粤剧翻译的方法与策略;另一方面,翻译也要强化粤剧艺术本身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同时,应摆脱西方翻译理论的束缚,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特点,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视野创新粤剧翻译理论,也要注重翻译实践,通过实际案例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粤剧艺术翻译的质量。

3. 进一步拓宽粤剧翻译内容范围。粤剧的翻译不应局限于剧目内容,还应扩展到粤剧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服饰、脸谱、化装、历史、名伶推介等。通过全面展示粤剧的文化内涵,增强海外观众对粤剧的兴趣和理解。例如,纪录片《百年粤韵》,从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故事讲述与国际传播、文化展示与审美表达三个维度,有效传播了粤剧艺术。另外,拓宽粤剧翻译的内容范围,有助于海外粤剧受众根据兴趣选择喜欢的粤剧文化内容,比如对粤剧名伶感兴趣的受众,可以选择粤剧名伶方面的推介,对粤剧传统服饰感兴趣的受众,也可以单选择粤剧服饰方面的相关内容。

(四)踏雪寻梅,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的创新

1. 利用短视频的创新力量增强粤剧艺术在海外的传播能力。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凭借其短小精悍、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等特点,受到国内外大众的喜爱。从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视角来看,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形式,开展名家教粤剧、粤剧名伶表演、粤剧服饰、粤剧脸谱与化装、粤剧趣闻轶事等面向国际的系列短视频制作,能为粤剧艺术的海外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与新的可能。短视频能够突破传统传播方式的时空限制,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粤剧的艺术魅力,并且,为了适应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受众,短视频制作可利用 AI 技术赋能多语言版本,以降低文化隔阂,提升传播效果。同时,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性,通过观众的反馈和互动,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为粤剧的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此外,短视频的内容制作需要体现专业性,确保粤剧艺术的核心价值和内涵得以准确传达,使粤剧在跨文化交流中传递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巧用线上传播和数字化技术,拓宽粤剧国际传播范围,提升粤剧传播效果。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线上传播、数字化技术与 AI 技术的结合能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开辟新的路径。第九届羊城粤剧节活动期间,广州文旅海外社媒矩阵(Facebook 脸书、推

特 X、Instagram 照片墙、YouTube 优兔)充分发挥整合传播优势,进行多样化的整合传播,成功吸引了大量国际年轻观众和国际友人的关注,为粤剧的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说,第九届羊城粤剧节一系列的线上传播创新策略就是粤剧国际传播创新的成功案例。因此新时代的粤剧海外传播,应活用线上直播,将粤剧表演通过 Facebook Live、YouTube、Bilibili 等平台进行直播或点播,吸引全球观众;精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数字技术手段,给观众带来“黛玉真的就站在我眼前葬花”这种身临其境的视觉和听觉效果,甚至可以创造出比真实舞台更好的沉浸效果,创新戏剧的表现形式;善用 AI 技术实现粤剧唱词和台词的实时翻译与字幕生成,方便非粤语观众理解。

3. 运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实现国际受众分析与精准传播,以提高粤剧传播效果。在粤剧国际受众分析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国际观众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和搜索引擎上的行为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构建详细的用户画像,从而了解国际受众对粤剧艺术的兴趣点和需求。例如,一些国际粤剧受众可能对粤剧的音乐、唱腔、身段、武打感兴趣,另一些国际受众可能对粤剧的脸谱、化装、服装、头饰感兴趣。基于这些用户的兴趣点和文化背景,AI 算法可以将不同的粤剧文化元素与国际受众的兴趣进行匹配,推荐最合适的粤剧艺术内容,例如,对于喜欢粤剧音乐的国际观众,可以推荐粤剧音乐的讲解视频;喜欢粤剧武打的国际观众,可以推荐精彩的武打片段视频或相关文字讲解内容;对于喜欢脸谱、化装、服装、头饰的国际粤剧观众,可以推荐相关展示视频。此外,AI 技术还可以实时分析用户评论、点赞和分享等数据,通过分析这些反馈和评价数据,可以进一步调整、优化粤剧内容创作和传播策略。基于大数据和 AI 技术实现的国际受众分析与精准传播,不仅能提高粤剧传播效率,还能增强受众的参与度和文化认同感。

结语

粤剧在海外悠久的传播过程,见证了粤剧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也正因为一代接一代粤剧艺术家秉持这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粤剧才能在国际的大舞台上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地焕发生命活力,不断前行。我们从粤剧海外传播历程中得到启示,汲取智慧,粤剧要在“出海”中大放异彩,其核心的方式就是创新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科技的迅猛发展给粤剧“出海”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

学习时所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9][2]}。粤剧“出海”要抓住契机,探索粤剧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探索粤剧新时代“出海”的创新路径,让古老的粤剧艺术在时代精神和先进科技的激活中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让粤剧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粤剧,并通过中国粤剧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让粤剧在国际的大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人的情怀与理想。

参考文献:

[1]周佩文.第九届羊城粤剧节圆满落幕,国际化传播覆盖全球45个国家[N].南方都市报,2024-11-30.

[2]李权时.岭南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3]张从渠,韦立荣.粤剧师公戏音乐资料汇编[Z].南宁:南宁市戏曲音乐集成编,1988.

[4]李永秀.试论广西粤剧剧目创作与创新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4):78-84.

[5]Daphne Pi-Wei Lei, Operatic China: Staging Chinese Identity across the Pacific, Palgrave Macmillan, 2006,p26.

[6]陈凝.粤剧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J].南国红豆,2005(4):15-19.

[7]洪晓文.《百年粤韵》首播:百年粤曲的韵味与回响[N].21世纪经济道,2022-03-28(12).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9]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10]毛雨,方宁.东南亚戏剧概观[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11]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12]谢彬等.华侨和粤剧(上)[J].南国红豆,2005(1).

[13]R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eam: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转引自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38.

[14]李晓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美华侨华人的跨洋往返与香港电影的早期发展[J].当代电影,2023(7):81-88.

[15]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6]白海英.粤剧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历程与特点[J].文化遗产,2021(6):82-89.

[17]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18]周东颖.清代末期粤剧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J].音乐传播,2014(1):104-111.

[19]代宏.清末民国时期粤剧女伶的崛起:以广东佛山祖庙博物馆“黑胶唱片展”为例[J].人民音乐,2023(1):23-28.

[20]钟哲平.新时代粤剧在美国的传播:白超鸿、林小群的粤剧情怀[J].南国红豆,2016,(1):48-54.

[21]陈超平.五洲四海来相聚,南国红豆展芳菲:96羊城国际粤剧节综述[J].广东艺术,1997(1).

[22]徐颖果.美国华裔戏剧的历史与剧团形式[J].华文文学,2012(3):116-123.

[23]沈有珠.当代粤剧海外传播的新变[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5(4):88-97.

[24]潘妍娜.敦煌剧坊与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J].广州大典究,2021(1):120-130.

[25]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奋斗,2019(6):1-5.

(责任编辑 林川)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Cantonese Opera to “Go Overseas” in the New Era

LI Yongxiu

(Guangxi Voc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Cantonese opera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theatrical genres to spread overseas and one of the local operas that was first influenced by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it has sprouted and taken root, opened up and embraced diversity, innovated and flourished, and persevered and continued worldwid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represents an outstanding history of theatrical dissemination.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onstants and adapt to changes will win, and those who uphold traditions while innovating will advance. Innovation is an eternal topic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 fact, during its early stages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antonese opera took the lead in innovating its expression forms and performing ar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istic elements, adopting a “westerniza-

tion for Cantonese use” approach.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s also an outstanding history of upholding traditions while innova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various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reshaping the way Cantonese opera “goes overseas”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overseas” of Cantonese Opera, how to innovate in expression forms and performing arts, how to innovate in repertory creation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des, how to innovate in translation modes for Cantonese, and how to innovate i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methods are urgent issues to explore.

Key words: Cantonese Opera Innovation; Cantonese Opera Dissemination; Cantonese Opera Creation

(上接第 71 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88.

[18]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202.

[19]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5-01(02).

[20]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N]. 人民日报, 2019-08-19(01).

[21] 岳月伟, 李学仁.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0-09-19(01).

[22] 习近平.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J]. 求是, 2024(2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erious, Strict and Rigorous Disciplinary Educati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DING Junping, LI Binghong

(School of Marx,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Strict adherence to discipline i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and a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 Strict adherence to discipline means serious political discipline,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and rigorous mass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ary educati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forged the military soul with serious political discipline, executed orders with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and united the people with rigorous mass discipline,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iron army that was unyielding and indestructible, and completing the great Long March that opened up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Red Army; Long March; disciplinary education

论国产犯罪电影中的“东南亚”空间

黄诗娴, 周佳佳

(集美大学电影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以《误杀》《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等“爆款”现象级电影为代表,近年来我国犯罪电影在创作上呈现出强调异域风情和视觉奇观、将犯罪地点“东南亚化”的跨域叙事倾向。以犯罪类型片呈现贩毒、诈骗、凶杀、强暴等犯罪行为,将东南亚建构成真实与虚构相结合、危险丛生、权力展演、罪恶频发的银幕空间,涉及“金三角”“缅北”、阶级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华人社群、神秘的泰国“小島”等多元复杂的犯罪空间形态。这些电影“移景”至东南亚,拓宽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丰富了视听元素符号、实践了跨国拍摄制片方式,呈现了东南亚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空间生产,体现我国犯罪类型电影国际化发展的努力。

关键词:犯罪电影;东南亚;移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3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89-07

近年来,随着观众对犯罪电影叙事策略、悬疑元素铺陈和视觉特效呈现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电影创作者通过物理空间移位,将故事移植到东南亚,进一步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性,建构了银幕上多元复杂的东南亚空间。空间作为犯罪行为的发生场所,反映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方式变革、现代制度构建、工业化发展、金钱对于人性的考验、人的异化等时代浪潮下的深层问题。电影空间是“由摄影影像表现的具有假定性的空间,它不是现实空间本身,而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和再结构。”^[1]其中,部分犯罪片取材于东南亚的真实犯罪事件,尤以“金三角”“缅北”等为主,通过诈骗、贩毒、凶杀等犯罪活动,为呈现东南亚这一犯罪之地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创作素材。而从电影的视觉体验而言,东南亚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如热带雨林、海岛与沙滩等,多元的族群文化、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建筑风貌,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为犯罪片提供了应有的氛围和场景。东南亚地区人员混杂、流动性强,为影片营造复杂而真实的社会环境,使得国产犯罪电影的地域偏好更加

显现。

通过跨域叙事、设定华人主角、设定唐人街场景等方式,“东南亚化”的国产犯罪电影层出不穷,成为我国犯罪电影的一种创作趋势。对于这一现象,多从类型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东南亚’悬疑电影凭借‘异域’‘悬疑+’等特征”,作为“国产悬疑片又发展出丰富的亚类型”^[2]。对于将叙事背景位移至东南亚的国产犯罪电影,一些研究仅以单部电影为研究对象,学界目前仍缺乏对于国产犯罪电影中呈现的东南亚空间具体形态的分析和研究。本研究选取四部票房超过10亿元的代表性影片为主要论述对象,分别是:新主流类型范式的犯罪破案电影《湄公河行动》、跨国改编的悬疑犯罪电影《误杀》《消失的她》、讲述诈骗犯罪的现实主义电影《孤注一掷》。通过空间理论与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电影中建构的多元复杂的东南亚空间。而这里的东南亚空间,同时包含着真实与想象的两重性,包括毒品泛滥的“金三角”、电信诈骗的缅甸“迦南”、金钱异化的“巴兰迪亚岛”以及权力失衡的华人社群。

收稿日期:2024-02-10

作者简介:黄诗娴(1989—),女,福建漳州人,文学博士,集美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产业;周佳佳(1998—),女,河南漯河人,集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类型电影。

一、全球化下的跨域叙事与犯罪空间叙事的东南亚化

中国电影呈现东南亚景观,可从21世纪初谈起。随着全球化流动与电影产业成熟,跨域拍摄成为类型电影发展的新方向。电影采用的方法是移动画面,就像乘坐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世界就在车窗外流动。电影帮助我们打破了单一地展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局限,它将不同的空间合在一起来展现现代生活的新格局^[3]。2000年,香港导演马楚成执导、任贤齐与郑秀文主演的《夏日的么么茶》,以马来西亚热浪岛作为逃离香港这座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都市的“乌托邦”,打造了一个风景优美、邂逅爱情的美好胜地,电影插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浪花一朵朵》成为华语乐坛流行曲。2007年,陈可辛监制、尔冬升执导的香港犯罪悬疑电影《门徒》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泰国,借用东南亚景观营造视觉冲击,同时也将叙事重心偏移,以毒品产地与毒枭聚集地为建构的标签,开启了东南亚犯罪空间的可能性。2012年,《泰囧》发挥公路片特色,展现了旅途中泰国曼谷的街景和地标性建筑,如机场和火车站,清迈的古城区、寺庙和丛林,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与沿途各色异域风情相互作用,以异域风情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与异域想象需求,拓展了中国电影中的空间呈现。2015年,《唐人街探案》通过热带雨林、海滩等自然景观,以及金店、草药铺、小吃摊分布的唐人街景象,还有展现泰国生活文化的丹嫩沙多水上市场,金佛寺和龙莲寺等庙宇,通过奇观化的视觉展现,一方面发掘拓展视听符号,强化泰国乃至东南亚作为度假天堂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引发以东南亚为叙事背景的电影创作热潮。

市场上涌现出诸多颇具异域风情的华语电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它们的存在及其票房意义的成功表征了中国观众不再仅仅满足于接受好莱坞视觉大片的全球性洗礼,而是伴随经济崛起后试图重新建构域外想象、寻找本土文化自信的趋向。^[4]我国犯罪电影在借鉴此前异域取景拍摄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宽我国犯罪电影的叙事空间,坚定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在中国电影产业需求和全球电影工业发展的支持下进行空间扩张。东南亚甚至取代中国本土而成为国产犯罪电影的偏好地域与首选叙事空间。首先,中国电影创作者在此前已积累了一定的东南亚取景拍摄经验,东南亚与中国交通便利、距离较近,部分国家如泰国有着良好的拍摄补贴政策,给予中国剧组一定的拍摄支持,推动了中国剧组大量赴东南亚取景。

包括《唐人街探案》系列、《湄公河行动》《消失的她》等影片,可以看到我国电影工业在异域取景和海外实践中的专业化发展。其次,随着中国观众对于类型电影视觉呈现要求的不断提高,观众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公路片”式地、“走马灯”式地呈现东南亚旅游景观,而更期待中国大银幕能呈现异域景观与类型叙事更多元的结合。同时从创作上讲,东南亚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矛盾与国内存在差异,地处异国的唐人街背景设定,可以更自由地处理警匪关系和社会问题。

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我国电影开启犯罪活动中的“东南亚”新空间建构,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市场口碑双丰收。《湄公河行动》根据真实事件“湄公河惨案”改编,以泰、缅、柬三国交界的混杂处“金三角”为背景,强化了金三角围绕毒品展开的犯罪空间。2019年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柯汶利在陈思诚的帮助下拍摄改编电影《误杀》,获得超13亿元票房的好成绩。2023年暑期档,《消失的她》《孤注一掷》两部以东南亚为叙事背景的犯罪类型电影在暑期档共斩获了超70亿元票房成绩。《消失的她》根据“泰国孕妇坠崖案”原型,讲述主角何非在异国寻找新婚妻子最后被揭穿他才是为财害命的真凶的故事,影片以35亿元票房收官,影片中耸人听闻的犯罪剧情引发社会大众广泛讨论。《孤注一掷》讲述男女主角被骗至缅北从事诈骗,互助逃出缅北,协助警方共同剿灭电信诈骗团伙,结合电信诈骗频发与整治电信诈骗的国家政策的社会热点,关注度极高,最终票房达到38.48亿元。这些“现象级”犯罪电影具有融合类型、跨媒介创作和“东南亚化”的共同影像特征。影片以“东南亚”为故事背景,东南亚作为犯罪事实发生的特定空间,在叙事、人物塑造乃至影片风格特征形成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南亚犯罪”作为类型细分趋势下的一个概念标签或一种类型电影元素,逐渐形成一种犯罪电影的特殊空间模式,在对真相或是正义的追寻中,探究异域犯罪中共通的人性边界和道德伦理,在银幕中建构了“另类”的东南亚空间——一种真实与想象夹杂的犯罪飞地。2023—2024年中国犯罪电影的东南亚空间建构仍在发力,涌现出《追缉》《瞒天过海》《默杀》等电影,其中《追缉》讲述了发生在东南亚的虚构城市“雅隆市”的非法女劳工连环虐杀案的故事。而《默杀》则以“太平洋某岛都马市”来交代故事发生地。国产类型电影以东南亚为背景的电影创作在近年呈现井喷态势,不仅在数量上快速

增长,更接连出现多部现象级佳作。根据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信息,以下表格 1 统计了近年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国产犯罪电影票房,展现了犯罪电影对于东南亚空间的创作与建构。

表 1 近年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国产犯罪电影票房

电影	上映年份	故事发生地	类型	票房/亿元
杀破狼 2	2015	泰国	动作/犯罪	5.59
唐人街探案	2015	泰国	悬疑/犯罪	8.23
湄公河行动	2016	金三角	动作/犯罪	11.86
非凡任务	2017	金三角	动作/犯罪	1.56
记忆大师	2017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2.92
杀破狼·贪狼	2017	泰国	动作/犯罪	5.22
破·局	2017	马来西亚	动作/犯罪	0.65
误杀	2019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13.33
误杀 2	2021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11.21
消失的她	2023	虚构东南亚国家,类泰国	悬疑/犯罪	35
扫毒 3	2023	金三角	动作/犯罪	2.84
孤注一掷	2023	虚构东南亚城市,“迦南”	剧情/犯罪	38.48
追缉	2023	虚构东南亚城市,“雅隆”	犯罪	0.2
瞒天过海	2024	虚构类东南亚国家	犯罪	1.66
默杀	2024	虚构类东南亚国家,“太平洋某岛都市”	犯罪	13.01

二、《湄公河行动》中的东南亚犯罪聚合地：“金三角”

《湄公河行动》根据 2011 年“湄公河 13 名船员被杀的惨案”的真实事件改编,于 2016 年上映。导演林超贤借鉴以往拍摄香港类型片的纯熟经验,结合“以武制武”的理念,采用多线叙事,讲述了一组特别行动小队为解开中国商船船员遇难背后隐藏的阴谋,进入金三角寻找杀害中国 13 位公民真凶的故事。展现金三角毒贩势力猖獗,毒品的危害,以及我国治理毒品保护国民的决心。以正/邪、警/匪对立的叙事路径,通过对臭名昭著的犯罪圣地“金三角”的深刻描绘,丰富了犯罪片的地理空间维度,更为后续同类型影片中东南亚犯罪空间的构建提供参考。

“金三角”作为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区域,其犯罪空间的刻画包含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金三角是泰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会地区,以泰国境内设立的“金三角”牌坊为名,这一地区长期盛产罂粟等毒品,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闻名世界。由于三国利益难以协调而成为“三不管”地区,以毒品为支柱的畸形经济结构与各国实力与当地武装的较量形成社会闭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犯罪活动屡禁不止。“金三角”种植罂粟追溯到殖民时期,从 19 世纪英缅战争,缅甸沦为殖民地开始,已有百年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毒品产地之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23 年东南亚鸦片调查》报告显示金三角地区持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助长了湄公河地区日益增长的非法经济,使合成毒品生产持续保持高水平,贩毒、洗钱和在线犯罪活动(包括赌场和诈骗活动)相互交织^[5]。从地缘和文

化层面也可以看作是东南亚犯罪活动的聚合重组,东南亚的毒枭盘踞、军阀割据、贩卖人口、娼妓盛行、治安混乱等混乱的社会秩序,为探究东南亚犯罪空间提供了现实基础。国内外涉及金三角的影视作品,多为警匪片和战争片,以东南亚毒品生产和走私为主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警匪片开始,正义与邪恶二元的对立结构就成为犯罪片的叙事特点,如讲述金三角犯罪故事的《黑色走廊》(1990)、《秘闯金三角》(1988),展现中缅边境混乱与黑暗的《边境风云》(2012)、《毒战》(2013)。“金三角”作为毒品源头,一直表现为经济落后、毒品横行、犯罪活动频发、秩序极度混乱的空间形象。

电影中展现的地理空间是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在电影中,地理图景的指涉,并不只是简单地再现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景观,而是在重构中凸显更具内涵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场域^[6]。东南亚地处热带,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地理气候景观,一方面为毒品种植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成为金三角的危险重要意象。气候上,高温多湿的气候非常适合罂粟生长;地形上,多山地地形为非法种植活动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场所。同时,茂密的热带植被也为毒品种植提供掩护。《湄公河行动》中伴随着制毒、枪战、杀人等行为,对金三角当地雨林奇观和原始自然地理空间进行了多次刻画,展现了作为犯罪空间的原始野蛮。影片开头使用纪实性的航拍镜头展现了东南亚地区湄公河流域的雨林性气候与被崇山峻岭切断的湍急水域的地理环境,画外音同时讲述了该地因强盗频发而名“鬼门关”的危险情境。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反而成为遮蔽犯罪的场所,影片中

多次出现臭名昭著的毒枭头子糯卡的位于深山老林老巢,建筑类型是在东南亚常年热带季风气候下能够防潮散热的竹楼,葱郁的热带植被伴随亮眼的阳光,这种本应富有生机的黄绿色调,与犯罪集团欺压周围部落、组建娃娃兵、吸食毒品等活动同时出现。东南亚特色气候与植被为视觉符号的自然空间,生机勃勃的背后是笼罩在金三角的毒品阴影和原始蛮荒。尤其是影片中娃娃兵在竹楼下“俄罗斯轮盘赌”时,对生命的麻木与吸食毒品的癫狂,异域风景带来的视觉奇观与认知中的邪恶势力的组合,将影片中以大量绿色植被为视觉标志的热带景观建构为危险而血腥的空间意象。在泰国程逸、老挝琅南塔、缅甸大其力等地,四国联合行动抓捕制毒、藏毒、贩毒人员,大部分犯罪组织的藏匿地点也是丛林和深山,远离文明与秩序的原始热带丛林与影片中穿插出现的代表正义且秩序严明的四国指挥部形成鲜明对比。影片中泰国北部的桐素山葱郁的树木虽然已从罂粟改为茶树,但也依旧无法改变金三角的本质,还有更多的罂粟隐藏在葱郁的热带植被之下,成为金三角犯罪的一环。

除了原始的自然空间,《湄公河行动》也通过奇观化展现了现代公共社会空间。奇观电影为观众提供的奇观主要由四种类型组成,包括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以及场面奇观^[7]。通过从敌人老巢营救线索人质、火车站营救曝光的线人、商场假谈判、深入糯卡老巢、终极交火这五次主要追捕行动,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展现泰国北部清盛码头、彭世洛火车站、商场以及在追捕逃杀过程中途经的街道店铺等金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公共社会空间。以方新武和高刚为首的特殊调查小队在抓捕真凶糯卡过程中的打斗场面、公路追击、枪战等,以动作为核心表现出强硬、力量与热血并存的动作奇观场面。在高速的追捕过程中,通过镜头快速剪切把握节奏,将复杂场景里的追捕和打斗转化为视听语言,影片最后湄公河上的7分钟追击就包含了230个镜头,从而构成速度奇观。带有消费娱乐性质的中式饭店中,服务员的红色旗袍、店里昏暗的红色灯光与之后奢靡豪华的酒吧等场所共同表现出一种场面奇观。犯罪行为与文明的现代社会空间构成反差,再次点明了金三角普遍存在的混乱无序状态。

三、《误杀》中的东南亚文化混杂空间:华人社群

《误杀》2019年上映,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影片讲述父母为当地权力系统的领导者的男孩素察在侵害同学平时时被反杀,父亲李维杰为

维护家人,采取策略通过混淆时间从而脱罪。电影由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柯汶利执导,相比原作更侧重于“误杀”这一行为背后的社会和道德议题,影片中建构的华人社群以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也是一大亮点。考虑到电影剧作诸如监控技术落后、街头暴动和政敌攻讦等情节成立的必要前提,电影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类似泰国的虚构国家“赛国”的一个小镇,讲述在与唐人街相似的华人社群中,华人家庭面临的阶级地位、文化冲突和现实困境。

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许多时期产生了移民潮。19世纪以来华人因为困苦或者战乱向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迁移活动被称为“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中国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17世纪,盛于20世纪上半叶,直到现在共有四次移民高潮,其中三次都在19世纪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人多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东南亚殖民地从事挖矿与种植园等苦力工作。此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东南亚经济繁荣,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中国流入东南亚,华裔商人在当地站稳脚跟,知识分子移民增加^[8]。数次人口迁徙使得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华人华侨最聚集的地区。华人社群是指基于血缘、宗族、文化等因素由华人聚集地发展而成的,作为华人文化身份的象征,记录着百年华人移民史的特殊历史文化空间。《误杀》的华人社群就是基于东南亚作为全世界最大华人华侨聚集地的社会现实。电影中将唐人街作为表现华人异域生活的物理空间和社会单位,此前《泰囧》《唐人街探案》乃至《湄公河行动》中都出现过充满地摊和露天市场以及中外文交杂的店铺招牌等具有标志性的唐人街风格场景。《误杀》则在沿袭此前唐人街视觉建构的同时,充分展现在犯罪题材背景下,集合商业活动、文化交流、居住、教育、宗教等多方面功能的华人社群。

围绕“误杀”这一行为分析华人社群的三种空间:连接集体的公共空间、强势腐败的权力空间以及被入侵的家庭私人空间。影片开头展现了唐人街上的店铺、地摊与集市等街景,不仅承担着展现中国情调与文化的物理景观功能,也是人们交换信息的社交场所和公共空间。颂叔的华人杂货店充满古早味的店内摆设与货物、唐人街上中文与泰文交杂的店铺招牌、色彩斑斓的街头装饰物以及充满南洋风情的建筑物等公共空间,承担了社交交流、休闲娱乐、商业活动等功能,展现了华人日常生活景观。比如颂叔的杂货店中既有黑警桑坤对于广大民众的压

迫,也有李维杰与颂叔、黄毛等街坊邻居的交往,还是李维杰与桑坤的矛盾交集点。在犯罪电影中,警察局不仅是推动叙事的物理场景,更是权力关系、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场域,成为多重权力关系的交汇点。警察局作为履行法律、行使正义的权力机构,在影片中成为拉韞行使强权的空间。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李维杰家进行非法搜捕、对李维杰的家人威胁恐吓刑讯逼供、操纵证据试图嫁祸李维杰女儿以及滥用警力对李维杰家进行封锁搜查,不仅阻碍了人们的自由与平等权利,还滋生着腐败与乱象。而电影中未明确的藏尸地,实际上就是由李维杰接手铺设线路的新警察局地下,成为警察局这一权力机关暗藏污垢的隐喻。

影片中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空间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李维杰家庭的居所,房间中放置着各种植物而充满自然生机,不时出现的中文装饰物乃至明亮的光线都显示着其良好的家庭环境与精心教养。素察在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中侵犯了平平,以视频威胁在李维杰家的仓库见面。住房作为私人空间遭到外来力量的破坏,个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之后成为犯罪活动的空间。平平与妈妈跟素察的打斗与拳赛场面通过交叉蒙太奇联系起来,将他打晕可以看作是对生存空间的维护。另一个是后院的宗族墓地。为转移尸体,李维杰将素察身体安置到已逝华人恩叔的棺材中。祖坟作为家族历史的见证,帮助后代了解自己的根源和身份,增强对家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祖先的敬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价值观,人们通过祭祀活动,编撰家谱等表达对祖先的感念。尽管有着相近的地缘关系与文化相关性,迁徙离散的历史记忆、多变的对华政策及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族群冲突,都导致了华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身份焦虑。代表当地势力的拉韞雨夜掘坟,彻底触碰到华人社群的创伤记忆,使得华人的文化认同以“无意识形式”涌现出来。挖坟开棺的猜测未得到证实,拉韞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最终引爆了华人社群民众的强烈不满与精神共鸣,在墓地前的警民冲突升级为蔓延至整个城市的暴乱。

四、《消失的她》中的东南亚异化空间:巴兰迪亚岛

“平原上翠绿植被层层交叠,外围是坡度缓升的山丘,一路延伸到海岸,与布满柔细白珊瑚沙的辽阔沙滩相连,一旁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遮蔽,再往外便是平静而波光粼粼的碧蓝大海”^[9]。东南亚借由阳光沙滩、特色风情建筑与热带植被等代表性景观

空间,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打造出旅游度假天堂的形象,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犯罪电影中开始成为“假象”。“旅游不仅仅是在地理空间内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移;他还是在一种文化中的一种位移。人们只有使用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携带着的工具才能去‘看’异国”^[10]。《消失的她》通过形塑表面假象的消费空间,讲述一对中国夫妻来到东南亚某小岛巴兰迪亚岛度假,妻子李木子离奇失踪,在丈夫何非坚持寻找的过程中,在律师陈麦的帮助下揭穿假妻子真面目。故事在最后发生反转,陈麦作为李木子挚友设置局中局,查明何非杀害了妻子李木子。故事原型为2019年发生的“泰国杀妻案”。中国丈夫为骗保还赌债,与妻子相约泰国森林公园度假,将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推下悬崖。电影将故事设置在虚构地点“巴兰迪亚岛”,表面颇具异域风情的浪漫海岛背后却隐藏着未知的危险和阴谋。通过奇观化景观展现巴兰迪亚这一犯罪空间,探究在跨境犯罪主线下金钱对人类的异化这一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海岛风情的旅游空间与悬疑犯罪的内涵形成了表里不一的二元对立。

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社会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由于空间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特征,因此,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11]。影片以“某个虚构的东南亚小岛”巴兰迪亚岛为背景,以热带季风气候下典型东南亚风情与现代化都市景观共同造就视觉奇观,伴随何非寻妻的剧情推进。何非与假妻子周旋过程中,酒店房间的红色民族风情装潢,东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以及酒店内部走廊陈设,到酒店服务人员的传统服装,都充满东南亚特色风情和后现代风格。何非带着妻子的旅游日记线路寻找路线的过程中,从照相馆、港口沙滩、城市雕像广场、书店等地穿行,通过大量俯瞰视角的镜头展现旅游都市的多彩繁华。双方对峙下篝火沙滩中充满小资情调的烛光晚餐以及热带风情下的海边景色,都展现出消费主义下被商品化的东南亚空间。酒吧作为夜晚的主要消费场所,闪烁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是人们释放欲望与压力的公共场所,也是黑暗与犯罪的遮羞布。影片中何非以酒吧掩藏自己的犯罪行为,对李木子实施犯罪后重新返回酒吧,此时酒吧和街道游行共同构成的消费主义狂欢,与李木子葬身海底的镜头来回切换,不仅是对观众感官的刺激,情感的煽动,更体现在资本主义逻辑下何非为钱杀妻的人性异化。最后,“海底星空”这一浪漫唯美的景

点,在刻意犯罪下成为李木子魂断之处。“海底星空”成为消费主义摧毁异化人性的符号,象征着爱情在资本和欲望面前的脆弱。一旦这些形象注入我们的意识中,它们就化为象征,获得一种集合意义^[12]。影片通过景观的快速切换和人物的快速移动,展现出异化空间的集合意义。

社会与金钱对人的异化,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戏中戏”的空间设置中。何非杀妻后贼喊捉贼的“戏”剧设计,与陈麦将计就计另设真假妻子的做“戏”,两人的博弈最终以何非被陈麦绑在病床上诈出何非口供还原真相为结局。“戏中戏”的过程中,以东南亚畸形秀和搭建的精神病院为代表,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展现了完全异化的巴兰迪亚岛空间。东南亚畸形秀怪谈中,五彩的霓虹灯与突破极限的血腥怪诞场面,成为被物化和商业化的消费空间,表现人性的扭曲。电影中精神病院的场域设置,是针对何非的“陷阱”具象化空间,在恐惧中陈述犯罪事实的过程中,何非暴露出贪婪、偏激、阴郁的人格本质,“巴兰迪亚岛”成为展现了金钱与赌博对人的异化的空间载体。

五、《孤注一掷》中奇观化的现实指涉:“缅北”

《孤注一掷》取材自现实中成千上万例真实的电信诈骗案件,讲述程序员潘生和模特苏安娜被诱骗至东南亚诈骗基地,从受害者被迫成为加害者,经过人性考量和挣扎,最终得救并协助警方捣毁诈骗基地的故事。电影中虚构了诈骗集团所在地“迦南”,但以电信诈骗为关键词,加上影片中对东南亚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建筑风格乃至语言文化的呈现,这里的迦南实际上指涉的是现实中的“缅北”。电信诈骗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东南亚地区的诈骗园区的运作模式已经成熟,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

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犯罪活动激增,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屡禁不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产业链条涵盖了从前端的技术支持、个人信息非法获取与交易,到中端的诈骗实施,再到后端的资金转移和洗钱等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犯罪模式。基于电信诈骗活动本身的媒介特性,犯罪的空间也可以分为境外诈骗基地、虚拟网络犯罪空间、线下犯罪空间,分别对应影片中设置在小学的诈骗集团、社交软件与赌博平台、线下流动的汇款空间。教书育人的学校与诈骗集团的并置,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鲜明对比。影片中呈现的诈骗园区作为一个封闭空间,是绝佳的人像展览和人性审视舞台,空间既可以用具体的物质形式来感知、表示、分析、解释,也可以用精神来构建^[13]。在

犯罪集团中人们人身自由被限制,“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在金钱的驱使与腐蚀下,一方面人们丧失主体性成为敛财工具,另一方面为寻求自保或寻求安全而成为诈骗团伙中的一员。依据诈骗行为的具体分工进行划分,分为:顶层跨国资本操控者、技术开发和话术编写的专业技术工种以及底层的“狗推”和“猪仔”。网络空间中互联网的匿名性给予犯罪分子机会,潘生等人在影片中顶替女主播开展“杀猪盘”,通过情感信任进行诈骗。网络空间的全球互通性使得“美女荷官”苏安娜在诈骗平台操控全球赌博活动。最后的汇款环节高度细节化,通过流动的视角、快节奏的剪辑、画面空间的不断切换,展现“水房”提款犯罪活动的全貌。流畅的犯罪活动串联起三个犯罪空间,模糊了空间的边界,真实与虚构的故事以及场面设置激发了观众对于诈骗犯罪的好奇心,延展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圣经》故事中,“迦南”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希望和诱惑的“应许之地”“希望之乡”。与之相反的是,联合国人权办报告显示,东南亚有数十万人被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强迫从事网络犯罪活动,包括恋爱投资陷阱、加密货币诈骗和非法赌博等。其所指涉的诈骗基地“缅北”充斥着“杀猪盘”“美女荷官在线发牌”“割腰子”“人体器官库”等标签。《孤注一掷》通过较具观赏性的类型化叙事方式,对电信诈骗进行还原与探究,其中“迦南”在真实与虚构的犯罪空间中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实中的“缅北”,借以做出反对赌博和电信诈骗的警示。

结语

综上所述,《湄公河行动》以新主流电影的范式,通过“他者”视角与警匪二元对立,塑造危险、神秘的“犯罪天堂”金三角;《误杀》系列通过华人双重文化视野展现阶级权力关系不平等之下的东南亚华人社群;《消失的她》在消费主义对特色景观的同质化中强调金钱对人的异化;《孤注一掷》则呈现了一个诈骗犯罪高度产业化的“缅北”。电影中的东南亚犯罪空间从真实的犯罪地点到虚构的类东南亚国家/城市,通过贩毒、诈骗、凶杀、强暴等具有现实主义元素和较强社会议题的融入,将本国民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及犯罪故事内核放置于东南亚的实体或虚拟空间之中,共同建构出危险丛生、权力展演、罪恶频发的空间。

但是过多犯罪电影“移景”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对东南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与《泰囧》《唐人街探案》等喜剧电影为泰国等国家带来的旅游推动正面效果不同的是,《消

失的她》《孤注一掷》等电影由于以悬疑犯罪为主线,使中国观众强烈感受到对“割腰子”“绑架”等事件的恐惧,加深了对东南亚阴郁、危险乃至恐怖的空间想象。

参考文献:

[1]陈汝洪.影像构成[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2:138.

[2]曾艳,王传领.论国产悬疑电影中“东南亚”类型的构建[J].电影文学,2023(22):59-63.

[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8.

[4]张勇.“借来的空间”:中国类型片中的域外场景研究[J].当代电影,2013(8):148-150.

[5]缅甸取代阿富汗成最大鸦片生产国[EB/OL]. [2023-12-1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12/1124882>.

[6]李婷.漂泊·异域·他者:东南亚元素的香港银幕抒写[J].电影评介,2019(101):115-120.

[7]张雯,何玉英.新世纪奇观电影的文化因素与转向[J].电影评介,2015(21):86-88.

[8]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J].南洋问题研究,2008(1):69-81.

[9](英)迈克尔·提裘提斯.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M].张馨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0]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6-147.

[11]汪原.亨利·列斐伏尔研究[J].建筑师,2005(5):42-50.

[12](匈)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102.

[13]林露.论萨缪尔·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第三空间”[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3.

(责任编辑 林川)

On the Wonder Space of South East Asia in Domestic Crime Films

HUANG Shixian, ZHOU Jiajia

(School of Fil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rime films have shown a cross-domain narrative tendency that emphasizes exotic customs and visual wonders, locat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crime films present drug trafficking, fraud, murder, and rape, and build Southeast Asia into a screen space that combines truth and fiction, is full of danger, shows power, and frequent crimes, involving the “Golden Triangle”, “Northern Myanmar”, the Chinese community with unequal class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mysterious “small islands” of Thailand. These films “shifted scenes” to Southeast Asia, broadening the narrative space of Chinese genre films, enriching the symbols of audiovisual elements, and practicing cross-border filming and production method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depicted the spatial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 East Asia, and reflecte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ime films.

Key words: crime film; Southeast Asia; shift scene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惠 孟

(郑州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目前,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仍然存在着思政元素不足、视野不够宽广、育人效果不够明显等诸多问题,凸显“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树立“大思政课”教育观念,立足“大”视野,贯穿“思政”教育,着眼于“课”程。在实践路径上,通过树立学生中心理念,挖掘思政元素,从多角度、多层次契合专业课教育,并不断完善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拓展教学内容,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最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大思政课”;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096-06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倡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形成“大思政课”育人合力。“大思政课”视域下,课程思政是高校达到全方位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为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重要遵循。应用经济学对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奠定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帮助学生理解本土经济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社会对于应用经济学实际教学中的思想性、学理性、现实性教育有着新的要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提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要在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进入提质发展阶段,秉承“三全育人”理念,顺应“大思政课”建设趋势。“大思政课”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研究与讨论的热点问题,但学界对于“大思政课”的具体内涵存在分歧,对于具体学科课程思政的改革指引也存在着进一步的研究空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愈发复杂和频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使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立场,增强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成为新时代进一步构建有效课程思政体系的新课题。本文首先阐明“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并在此视域下,探讨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

收稿日期:2024-11-08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黄河流域河南段绿色发展优化路径研究”(252400410389);2025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路径研究”(2025-ZZJH-210);2024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项目“数智时代河南本科高校学生党建创新发展策略研究”(SKL-2024-132);2024年度郑州市社科联项目“数智时代地方本科高校学生党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ZSLX20241360)

作者简介:惠孟(1996—),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与必要性,如何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把握“大思政课”建设的内涵,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以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双重目的。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的价值意蕴与逻辑旨归

“大思政课”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根植于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伟大实践,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实现了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2]。2024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这无疑是对“大思政课”精神内涵的重大理论支撑。“大思政课”的特点在于,课程教学需要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强”“人格要正”。“大思政课”具有特定的针对性、有效性,通过“大”理念的指导,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构建全覆盖、科学完整的“大思政课”体系。“大思政课”强调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将思政元素充分融入专业课程中,使学生养成具有专业思维、问题思维、价值思维的综合解决问题能力,从“大思政”角度,以更宏观的视野引入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多重视角,将专业知识转化为自觉德育,树立正确的经济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达到育才与育人的双重目的。

应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它将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4]。与纯理论经济学不同,应用经济学更加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传统教学的“重理论”“舶来品”特征。通过应用经济理论和方法,应用经济学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了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助力了经济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其应用性、实证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特点使其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经济

专业的教育目标需要紧密结合国家实际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学科基础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长期以来,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呈现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趋势^[5],即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发展实践中结合西方科学和技术手段,对西方经济学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以此服务于国家发展。此发展趋势主张在理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同时在发展实践中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教育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应用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教育目标,提升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学科话语权,是下一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

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下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和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因而,课程思政建设,是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利用课程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6]。课程思政的育人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达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效果。应用经济学不仅具有学科建设的学术性、专业性,还具有生活实践的社会性、应用性。应用经济学是伴随西方经济发展而兴起的一门学科,旨在解释西方经济实践与理论效应。应用经济学有其学科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存在着本土化的过程,我们应对其保持借鉴批判的态度。

在“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意义重大。其一,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充分融合。在“大思政”建设的契机下,把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充分融合,能够进一步优化专业内涵,将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使学科建设符合市场发展需要及国家战略需要。在应用经济学课堂教学主渠道中,要立足本学科的特点,加入中国元素和课程思政内容,培养学生的大经济学观念,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方法对经济学的指标和政策进行

解读与评价,明确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认识党和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培养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责任担当,实现课程思政“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7]。其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大思政课”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能增强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应用经济学教学,学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主义背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意义,深刻感知改革的激荡和发展的艰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奋斗。这一教学改革对形成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协同育人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8]。“大思政课”的实施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经济学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学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入国际案例和进行跨文化比较,帮助学生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培养其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是现有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的超越,也是新时代思政课教育的应有之义,关键在于落实到课程教学实践中。应用经济学课程在“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教学改革,是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有益探索。

二、“大思政”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思路探析

应用经济学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缺乏有效的融合衔接,甚至出现思政教育附加于专业教学,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无法充分融合,从而忽视专业教学中的思政价值导向。教师进行专业讲授时,往往在应用经济学逻辑推演、数理论证、理论前沿上下足功夫,对思政元素的解读与渗透相对忽略,将思政视为规定性动作,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参与性,导致课程思政育人环节的缺失。这对于教师本人的要求更高,教师在专业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升自身课程思政的育人意识与能力,引导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个人品格与价值使命。目前的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还存在着缺乏统筹规划的缺陷,授课内容过于单一,导致未能和其他不同课程

之间形成联动效应,思政元素呈碎片化,存在重复散乱的问题。课程之间缺乏横向教学的标准与要求,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未能全面贯通,也缺乏纵向上的深度融合。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上,思政教育融入较为生硬,难以达成自然流畅、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学生无法产生共鸣,整体接受度较低。因此,应用经济学思政课程建设,需要从宏观的角度规划,实现“点线面”的充分结合以及专业课程之间的联动,构建层次分明、纵横合理、循序渐进的育人模式。

现有研究表明,虽然很多高校都设有应用经济学专业,但其培养目标却很难与时俱进^[9]。这些高校往往侧重于让学生掌握经济理论与方法,采取机械教条的授课模式,为学而学,为用而用,这与“学以致用”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广大学生不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经济的发展,沦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复制者和搬运工。此外,尽管许多高校意识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其培养方案通常缺乏全面、立体的实施和评估。这些高校只是机械地增加实践实验课程的学分比例,结果往往流于形式,导致广大学生眼高手低,急功近利,只重学分不求质量。因此,加快构建“立足国情,兼收并蓄”的特色应用经济学,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要放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使学生跳出西方经济学局限,更多关注中国实践。通过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学术前沿,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与家国情怀。把历史文化精神和经济载体相融通,形成系统性思维习惯,建构系统性知识体系。通过“大思政课”建设,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经济哲学理念,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引领经济学专业教育走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教育道路。

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还存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缺乏的问题。应用经济学本身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在专业教育领域需要有相对的价值精神引领,达到专业教育与价值教育的共进融通。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视角、多学科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能够深入思考课程所蕴含的内在综合机制,并且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能够在实践方面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另外,学科交叉融合,还能够改变文科、理科、艺术等单一学科壁垒,提升综合思维能力,培养既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专业知识,还能够适应市场需求

的人才,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应用经济学科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以整体性视角对待,系统阐释应用经济学的内在机理、发展规律。课程思政建设与应用经济学教学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应厘清应用经济学本体知识与学科交叉,分级分类多层次融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认知。

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宏观治理等方面为结合点,以国际视野来观察中国经济建设,探求经济规律,理解中国经济实践,服务社会民生,引导学生扎根中国大地,树立坚定理想信念,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用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目标应系统、全面地考虑理论与实践、国际与本土、职业技能与道德责任的结合,以培养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经济学人才。“大思政课”在应用经济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展示了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与成效。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应用经济学紧密结合,高校教师不仅能够有效传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还能广泛传播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观和价值观,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必须遵循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与发展规律,结合课程内容,挖掘课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融入。教师必须系统掌握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成为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还必须注重学科的思政资源利用,结合社会经济动态实际,关照社会生活现实,融入党史、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成果等思政元素,构建“大思政”应用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生动讲授、透彻讲通、精彩讲好中国故事,阐释经济学科知识背后的经济特点与经济思想,包括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案例和时代精神等,学以致用,使课程思政教学入心入脑。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破解之道与实践路径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应用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课程的专业基础课,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其内容也要跟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方面,有必要进一步进行优化设置,对基本经济理论、中国实践进行有深度与有温度的融合。根据应用经济学课程性质设定优化课程体系,发掘应用经济学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切入点,课程采用讲授型、调研型、实践型、任务型等

多种方式,分层设计课程思政的融入体系。在实践上,选择拓展性内容,利用社会大课堂,结合各种平台与训练项目,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应用经济学教授过程中,须结合课程的学科特点与育人目标,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融入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使之成为思政教学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比较,增强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第二,提升课程育人目标。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能力、思维品质、专业素养、价值追求与个人品格的提升。针对课程群的特点以及课程性质,重新定位“大思政课”的育人目标,做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有必要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课程讲授中,要引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路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认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让学生切身体会国家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增强经济学理论学习效果,引导高校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在课程讲授中,还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业的不易,珍惜大学时光,制定科学的学习规划,提高学习效果,达成职业目标。

第三,拓宽教师“大思政”视野。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大思政课”必须具有大视野,应用经济学授课教师必须经常关注经济社会动态,及时了解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把握思政方向,更新教学内容,传道与授业相结合,从应用经济学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国家、行业、专业等领域着手,增加课程的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提升课程所蕴含的时代性、开放性、前沿性、引领性。教师的角色与能力建设是确保课程思政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通过定期思想政治教育培训、跨学科研讨和教学手段改进,帮助教师不断提升其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教师要具有融入思政元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凸显隐性教育的重要性。还要建立科学的教学效果评估和激励机制,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策略,确保课程思政的实际效果。通过奖励优秀教师和提供发展机会,激励更多教师投入课程思政的实践中来,从而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教师在课程思政中的角色和能力,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的实现,培养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的学生。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关键力量,其能力建设不仅关系到课程思政的效果,更关系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未来。

第四,有效融合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元素的挖掘原则,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体现新时代青年道德品质成长规律。应用经济学须不断深入挖掘隐性思政元素,以强化学生的显性知识学习与隐性思维培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课程中,引导学生对标新时代主流价值观,以规范引导学生的思想行为。思政元素的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感知和吸收思政元素,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内容,都与应用经济学联系紧密。如在讲授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时,引入在新冠疫情期间,面对部分商家哄抬物价的行为,党和政府做出的应对措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以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10],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做对比,让学生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提升企业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时,通过讲授需求规律背后的消费本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在讲授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时,引入诚信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讲授分配理论时,结合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成果,对比西方政治制度造成的贫富差距,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学生通过分组调查汇报,侧重学习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系统性批判思维能力,激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认同感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学生能够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责任,增强其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第五,调整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课堂讲授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综合运用讲授法、比较法、案例分析法、小组调研汇报法、情境教学法、数据分析法、专题研讨法等,丰富教育教学形式;在社会实践、专题辅导方面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条件下,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手段更加多元化,将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依托自媒体平台,增加课堂趣味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

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保证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理论实践一体化、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方式,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高度融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

第六,建立多维课程评价体系。“大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要体现多元、多维、多层次的特点,构建标准科学、内容完整的评价体系。考核评价是对课程实施过程的检查检验,在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中,确立以学生为中心、树立 OBE 教育理念的科学导向,既注重考核结果,又重视考核过程。在应用经济学课程过程性考核中,建立多种考核机制,以教学成果为导向,综合运用专题汇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讨论参与、课程考查等多种方式,构建量化的多层次考核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积极性,将思想品德考核贯穿整个环节,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效果。在期末考核试卷中适量增加应用性、主观性的题型与分值,以考核学生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理解运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心,引导学生以经济学原理解读经济现象,评分标准要有弹性,方式要灵活,体现出课程考核的思政属性。“大思政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涵盖教学的整个过程,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统一,学生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统一,切实提高学生的现实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四、结束语

“大思政课”本质上既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体现“三全育人”理念,从“大”处着眼,又要坚守“思政”属性,切实落脚于“课”,这三者构成统一整体,为新时代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推进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这一改革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应用经济学专业素养,增强教学实际效果,而且能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让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更具长远性、目标性与可持续性。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必须以“大思政课”为指导方向,要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高度融合,充分挖掘思政元素,以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案例引领学生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力求“润物无声”“如盐入水”。应用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需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构建内容多维、方法多元的课程体系,从而使课程思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贯彻“大思政课”教育理念,牢牢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教学课堂“主渠道”,以大系统观强化“大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明确课

程教学目标、增强教师思政意识、挖掘多样思政元素、打造立体化应用实践平台、探索多元考核形式,实现理念与课程统一、教学与实践统一,提升“大思政课”育人成效,培养“既红又专”、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世济民”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N].人民日报,2021-03-07.
[2]张伟.“大思政课”的生发逻辑、本质意蕴与建设路径[J].黑龙江教育,2024(11):9.
[3]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9-11.
[4]ASTERIOU D,HALL S G. Applied econometrics[M].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21.

[5]程思富.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创新原则与发展态势[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1):51-56.
[6]董慧,杜君. 课程思政推进的难点及其解决对策[J]. 思想理论教育,2021(5):74.
[7]高德毅,宗爱东.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44.
[8]邱仁富.“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理论阐释[J]. 思想教育研究,2018(4):109.
[9]胡德宝,王思源. 课程思政案例教学融入专业基础课的路径研究: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 高教学刊. 2024(27).
[10]冯晓玲,孙建平. 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改进途径[J].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9(1).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Applied Economics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HUI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cours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limited perspectives, and limited educational effects,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Applied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pplied Economics courses must establish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be based on a “broad” perspective,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cus on the “course”.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s, by establishing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lign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level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Applied Economic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expand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we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ultimately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and abilities.

Key words: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pplied Econom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educational reform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程典子, 罗会宇

(新乡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既是推动高校思政课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逻辑指向的必然选择,也是确保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更是增强高校学生文化自信、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基本途径。推动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需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以及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为抓手,促进高校学子在循序渐进中提升文化自信,继承、发扬黄河文化精神的同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及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助力。

关键词:黄河文化;高校思政课;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102-04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1]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所孕育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天人合一”观、“大一统”观、中庸之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同时也是引导大学生奋发有为、以宽厚的态度兼收并蓄的重要价值指向。黄河文化中的农耕文明崇尚耕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这不仅是古时人民的生存之道,也是当今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需坚持的理念。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2]。

一、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实现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3]。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离开黄河文化空谈文化自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字是文化得以传承永续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时期”就产生了刻画符号且有固定含义,殷商时期,形成以甲骨文为字体形式的文字体系。儒学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等均诞生于黄河沿岸,这些都彰显了黄河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创造力,而黄河文化坚毅勇敢、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也是新时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品格。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文化处在既共生又对抗的矛盾之中,多元文化碰撞对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开放进取的特质对解决多元文化冲突行之有效。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以中华文化为依托,对外来文化去芜存菁;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以自身文化实践积极推动黄河文化的传播。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黄河文化先后吸收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匈奴

收稿日期:2024-11-20
作者简介:程典子(1995—),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作者:罗会宇(1983—),女,湖南长沙人,博士,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与科技伦理。

文化以及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民族的文化 and 近现代西方文化。在几千年文化融合中,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从华夏之辨——以夷变夏——华夷一家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主干、各民族文化为枝叶的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向中原聚集,体现了多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及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家国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等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黄河文化强大的聚合力和“大一统”观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抵御外敌的思想武器,更是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三)提升高校思政课亲和力与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4]亲和力是学理性实现的保障,提升高校思政课亲和力关键在教师,教师的政治立场、育人情怀、理论功底、教学艺术、思维视野和人格魅力,是影响思政课学理性发挥和亲和力产生的重要因素。思政课具有较强的学理性,难免给学生留下抽象晦涩、枯燥乏味的印象,增强思政课亲和力,教师除了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将二者有效结合、互为补充。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阶级性,道德教育是统治阶级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统治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灌输,以此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德育是儒家的核心教育理念,孔子在教育中坚持德育优先原则,认为道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要先成为有德之人,再学习文化知识,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用的人。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的道德教育对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与儒家将德育置于核心地位,注重培养有德之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在育人目标和对道德教育重视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应该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用学生耳熟能详的话语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以黄河文化精神育人,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目标。

(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行之举

2024年9月,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

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5]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其涵盖的华北平原是保障国家粮食储备的四大粮仓之一。生态环境的好坏对粮食产量、居民生存状态、生物多样性等至关重要。中国古代先民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秉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观念。《孟子·梁惠王上》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6]《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7]这些典籍中的话语都证实了国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早就有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内涵。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教导学生践行保护优先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躬身实践、做小做细,促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来投身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黄河流域乃至国家各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教学资源同质化

高校思政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使用同质化、趋同化问题。虽然黄河文化资源丰富,但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常常缺乏对这些资源的深入挖掘和个性化运用,导致教学内容和方式趋于千篇一律。这种同质化现象大大削弱了案例教学、专题教学的实际效用,降低了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使得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接受兴趣和积极性下降,同时挤占了学校特色思政资源的使用空间。

(二)师资力量不足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推动黄河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关键力量。目前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在黄河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相对不足。高校对黄河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开设较少,教师缺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资源的平台和途径,陷入“不敢讲”“不会讲”的困境,难以将黄河文化的精髓有效地融入思政课中。此外,部分教师也缺乏创新精神和教学热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

(三)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思政课易脱离学生的生活感知与真实体验,对学生的困惑、疑问回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易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虽说黄河文化元素能够多维度融入学科课程,但部分高校在教学方法上仍以“灌输式”“讲授式”为主,教学模式相对单一,欠缺创新与互动性。这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产生共鸣、激发兴趣,难以将黄河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身

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

(四)理论与实践脱节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在实际教学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屡见不鲜。一方面,部分教师过度侧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与黄河文化相关的实践案例及体验活动。脱离实践空谈理论,思政课堂便会缺乏活力,显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学生同样缺乏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机会与平台,难以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境中。当理论知识无法高效转化为实践应用时,不仅会阻碍大学生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还会制约整个社会的创新与进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致使黄河文化融入思政课难以达成预期教学效果。

三、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一)整合黄河文化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首先,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蕴含的爱国元素、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将其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此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爱国情怀与创新能力。其次,结合黄河治理、水利工程建设等情况,开发形式多样的思政载体,如专题讲座、案例分析、视频资料等,引导学生感知黄河精神,领悟黄河文化精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最后,结合黄河文化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当代价值,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开设专门的黄河文化课程,如“黄河文化概论”“黄河文化与民族精神”等,作为思政课的补充和拓展。在其他专业课程中融入黄河文化元素,如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形成“思政+”育人模式。

(二)增设相关研究课题,提高思政教师理论素养

首先,高校可以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增设关于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利用、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黄河地区农业绿色升级与转型、黄河文化传承与发展、黄河流域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黄河文化旅游带开发等方面的课题研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立项。其次,高校可以定期对思政教师进行黄河文化培训,提升他们对黄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邀请黄河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开展讲座、进行交流,拓宽教师的学术视野。最后,教师还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大先生”,做好青年一代的表率,做学生心灵路上的点灯人。

(三)创新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

1. 互动式课堂

一方面,组织学生围绕黄河文化中的某个主题或问题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还可以举办辩论赛,让学生在辩论中深化对黄河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扮演黄河文化中的历史人物,体验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此外,对黄河文化中的历史事件或场景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在模拟中学习和理解相关知识。

2. 项目式学习

首先,学校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项目,如调研黄河文化遗址、研究黄河文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鼓励学生自主选题、设计研究方案、收集和分析数据,最终撰写研究报告或制作展示作品。其次,组织学生参加黄河文化相关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如参与黄河沿岸的环保行动、为当地居民提供文化服务等。

3. 数字化与多媒体教学

一方面,通过创建黄河文化的虚拟场景和互动体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将黄河文化的历史文物、艺术品等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开发关于黄河文化的在线课程,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平台,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和交流。并且建立黄河文化资源库,收集、整理和分享关于黄河文化的各种资料,包括图片、视频、音频、文献等。

4. 跨学科融合

将黄河文化融入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教学,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体系。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引导学生将黄河文化与现代创意产业相结合,如设计黄河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开发黄河文化旅游项目等。

5. 评价与激励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项目研究、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通过多元化的评价,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设立奖学金、优秀项目奖、社会实践奖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黄河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活动。

(四)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与黄河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

高校应树立“大思政”观,坚持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在校内举办黄河文化讲座、研讨会、论坛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开展黄河文化知识竞赛、摄影大赛、文艺演出等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黄河沿岸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了解黄河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参与黄河沿岸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如环保宣传、支教服务、文化传承等,通过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组织学生参观黄河文化遗址、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场所,了解黄河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四、结束语

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是贯彻落实“第二个结合”的必行之举,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的必要举措,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立足大局观与全局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沐浴理论之光,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做文化强国的建设者;以黄河文化滋养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促使大学生以自身之躯反哺黄

河流域,为国家建设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习近平总书记甘肃、陕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N].人民日报,2024-09-15.

[2]王震中.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N].光明日报,2020-01-18.

[3]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0.

[5]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4-09-13.

[6]孟子.孟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

[7]思履,文若愚.彩图全解论语·中庸·大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26.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CHENG Dianzi, LUO Huiyu

(School of Marxism,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0,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a practical ne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ensur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a basic way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literac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we need to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ep by step,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ernalize it in hearts and externalize it in ac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path

基于知识图谱的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改革实践

刘秋菊¹, 王仲英², 黄继海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郑州 450000; 2.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工程经济学院 郑州 450018)

摘要:针对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时出现的“幻觉”,提出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的方法。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幻觉”问题,还为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实践提供方案。通过整合分散的教学资源构建课程知识图谱,并采用图数据库 Neo4j 展示知识点,从而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同时帮助教师分析学生学习数据,了解学生进度和薄弱环节,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键词: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检索增强生成;课程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6

中图分类号:TP312.1-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106-06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突破,作为当前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也为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新方向。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教育工作者需要变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以促进教育方法的创新和优化^[1]。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促进了传统教育模式向在线学习和混合式学习的转变。这种变革不仅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和选择性,还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普及,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教育资源匮乏地区^[2]。

人工智能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主要擅长从已有知识和数据中提取信息、识别模式、进行推理和生成内容。然而,它在某些方面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仍然有限,特别是在从0到1的真正创新上。同时,人工智能在生成文本或回答问题时,可能会生成不准确、无根据甚至虚构的信息,也就是“幻觉”。解决大模型“幻觉”的方案有提示工程(prompt)、数据质量、模型能力的提升、后处理、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等,提示工程和RAG技术易于实现、成本较低,可以提供更具体的上下文信息给大模型,减少“幻觉”。高质量数据的收集、模型能力的提升和后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成本会比较高,如模型能力的提升采用的微调技术,需要GPU的支持。RAG是一种结合了AI生成模型和信息检索技术的方法,旨在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检索系统从大型知识库中(包含知识图谱)提取相关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作为生成模型的输入,以生成更为准确的内容。因此,在Python数据分析的授课过程中建设Python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同时结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幻觉”问题,而且为专业知识领

收稿日期:2024-12-13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背景下人才培养实践创新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206);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基于多模态的图像语义分析关键技术研究”(24B520036),“大模型时代中文智能写作关键技术研究”(25B520030);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智能+’时代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ZGJG202111B)

作者简介:刘秋菊(1970—),女,河南孟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分析、模式识别;王仲英(1969—),男,甘肃天水人,硕士,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工程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计算数学、数学建模等。

域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3]。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是由 Google 公司创建,用于智能信息检索的结构化数据存储模型。最近几年,随着 AI 大模型的应用,再次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主要以图形化方式来表示实体关系,在教学中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知识图谱能够将分散的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通过将教材、课件、习题等资源进行关联,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采用 AI + 知识图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和进度,选择不同的学习路径,实现个性化学习。同时,知识图谱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给学生推荐学习内容,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学生也能够根据知识图谱清晰地看到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增强知识的联想和

迁移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快速定位需要学习的知识点,便于在线学习和混合式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4]教师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以便进一步进行教学决策。教师通过知识图谱对学生的进行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有利于采用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知识掌握情况,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二、知识图谱概述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是一种通过节点和边等图形化方式,将分散的知识点进行系统化和关联化,以表示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化数据模型,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课程中部分章节的知识图谱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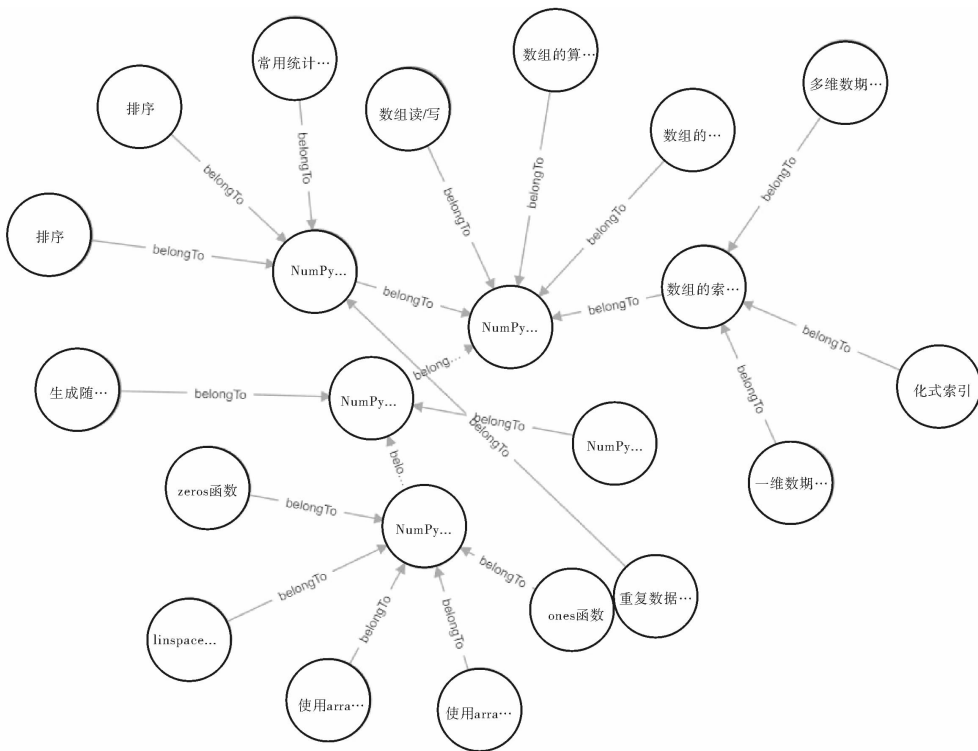


图 1 课程部分章节的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通过图的形式,将知识点及其关系进行结构化表示,使得知识体系更加直观和清晰。知识图谱主要是由三元组组成,三元组由三个元素组成,分别是实体、关系和属性。实体 (Nodes) 代表具体的对象或概念,如人物、地点、事件等。关系 (Edges) 表示实体之间的关联或交互,如“属于”“位于”“相关于”等。属性 (Attributes) 是实体或关系的特征和描述,如名称、日期、数值等。课程体系中的知识点可以用实体表示,知识点之间有前置关系、后置

关系、关联关系等多种关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更新和扩展,不断加入新的知识点和关系,保持知识体系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通过对课程知识图谱的智能分析和挖掘,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知识关联发现等服务,提高学习和研究的效率^[5]。知识图谱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用于知识管理、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教学资源整合等。

三、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

首先,构建知识图谱需要准备各种学习资源,如

教材、教学大纲、课件、习题等^[6]。这些资源将为知识点的抽取和关系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和内容支持。其中,教材包括教科书、参考书等,是课程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通常按照课程大纲编写,内容系统而全面,是构建知识图谱的核心依据;教学大纲详细列出了课程的内容和要求,是知识图谱构建的重要依据,大纲中的内容可以帮助确定知识点的范围和层次结构;课件包括 PPT、PDF、讲义等,是课程知识的详细说明和讲解,课件中的内容通常是对教材的补充和扩展,可以提供更多的例子和应用场景;习题资源有助于理解和应用知识点,习题中的考点和解题思路可以帮助识别知识点的应用方式和关联关系。其次,知识图谱的构建还需要使用各种工具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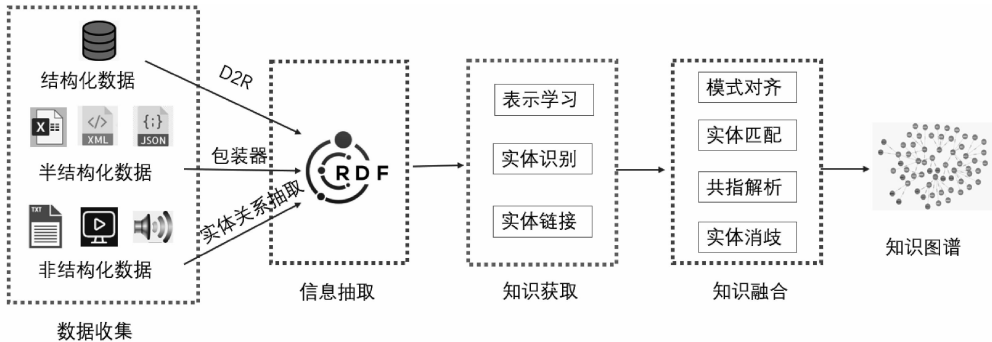


图2 知识图谱构建的技术框架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内容的知识图谱构建中,可以把 Python 库(如 Pandas、NumPy、Matplotlib 等)、数据分析概念(如数据清洗、数据可视化等)、算法(如线性回归、分类、聚类等)、工具(如 Jupyter Notebook、Anaconda 等)定义为实体。把每个实体的特征定义为属性,例如 Pandas 的功能、线性回归的应用场景等。实体之间的连接定义为关系,例如 Pandas 与数据清洗的关系、Matplotlib 与数据可视化的关系等。

四、知识图谱在课程改革中的应用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对比如图3所示。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教学新生态,为师生提供多层次、智能化、开放式的教育教学服务,在“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应用中,随着知识图谱、认知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与全域教育数据的不断累积,教学逐步覆盖了“学习—教学—练习—考试—评价—管理”的全流程。采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如图4所示。

(一)知识图谱助学

AI+知识图谱可以为学生提供实时、智能化、个性化、启发式的辅导助学服务,解决学习资源的极大丰富与个性化学习供给不足的矛盾问题,提供学

平台来辅助完成知识点的抽取、关系的建立和图谱的展示。工具方面,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分析文本,从文本资源中自动抽取知识点和关系。这些工具可以通过词频分析、主题建模等方法识别重要的知识点和关联关系。平台方面,如 Neo4j、GraphDB 等,它们支持图形数据库,用以高效存储和查询知识点及其关系。再次,可视化工具能够将知识点和关系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可以更直观地理解知识点和关系。利用可视化工具展示知识图谱更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学习。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知识图谱可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使生成内容更加可靠,避免生成虚假内容。知识图谱构建的技术框架如图2所示。



图3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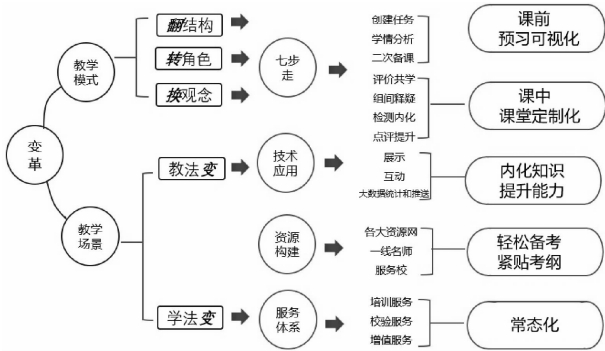


图4 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

习资源地图与学习过程向导相结合的解决思路,建立大模型、知识图谱、图谱融合、知识追踪、认知诊断等技术支撑,如图5所示。在自主学习方面,章节式

知识图谱提供的是一个富媒体教材文件,比书本有更多的互动。通过图谱式学习,可以进行知识搜索,融入知识图谱之外的信息,尤其是各种不同形式信息载体中的信息,帮助学生理解学科知识体系。AI + 知识图谱帮助学生在自主学习时明确学习内容的框架和重点,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薄弱的知识点进行学习,通过知识图谱中的链接直接访问相关的教学资源、视频讲解或习题,进行针对性学习,实现自适应学习。除了在自主学习方面发挥作用外,AI +

知识图谱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环节也能为学生提供有力帮助:学生可以在课前预习过程中,提前了解课程的主要知识点、知识点分布及其关联,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课堂学习中,强化学习的内容以及重点和难点;学生在课后复习时,根据知识图谱提供的复习路径,梳理所学内容,系统复习各知识点及其应用,发现知识盲点和不足之处,强化记忆和理解^[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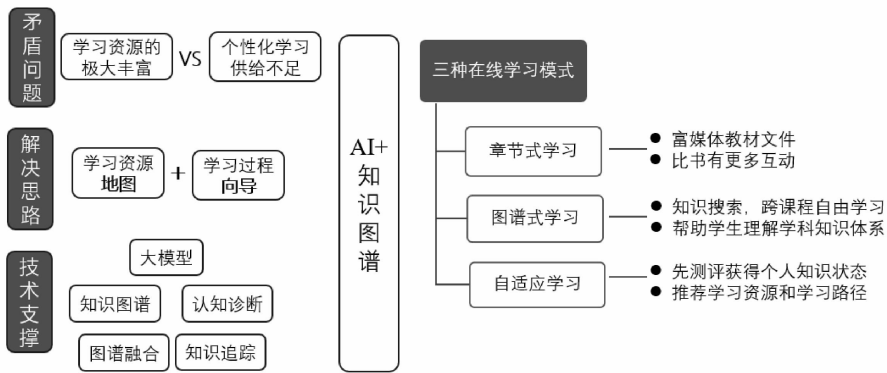


图5 辅助教学活动

通过知识图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显著提高。

1. 学生可以通过点击知识图谱中的节点或边,查看详细的知识点内容和前置后置关系,进行互动学习,也可以探索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建立思维导图。

在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平台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提出问题,例如:“如何使用 Pandas 进行数据清洗?”问题提交后,检索引擎会在知识图谱中查找与“Pandas”和“数据清洗”相关的实体和关系,检索到 Pandas 的功能包括数据清洗,相关操作有处理缺失值、数据类型转换、重复值处理等。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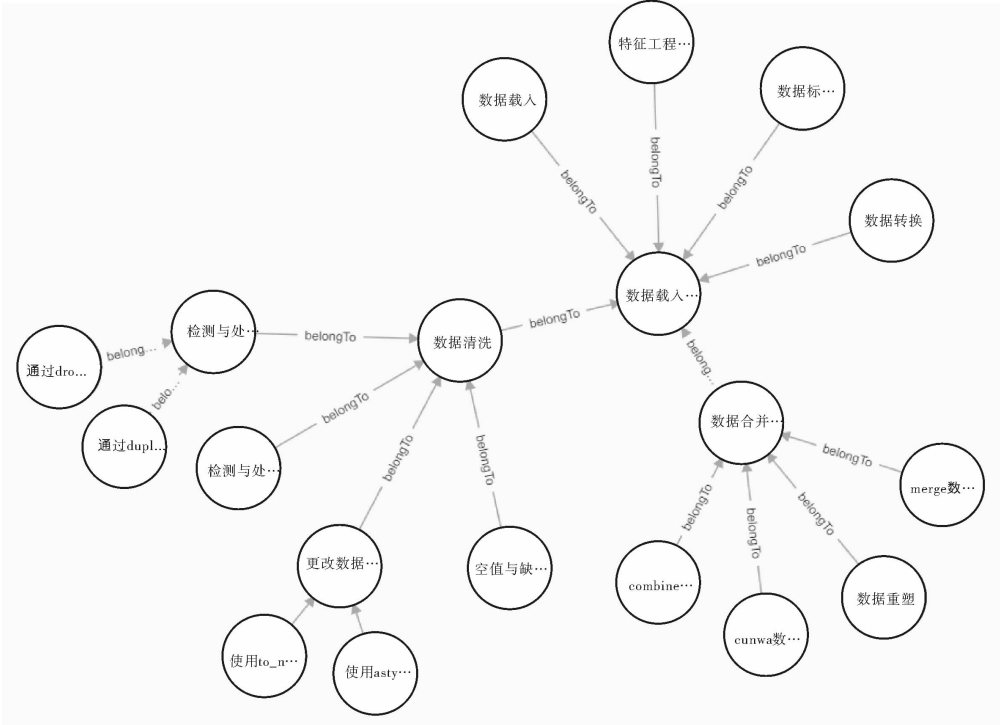


图6 Pandas 与数据清洗的图谱

生成模型根据从知识图谱中检索到的信息给出生成回答。回答内容:“使用 Pandas 进行数据清洗可以通过以下方法:(1) 检测与处理缺失值,使用 `dropna()` 或 `fillna()` 方法;(2) 更改数据类型,使用 `astype()` 方法或 `to_numeric()` 方法;(3) 检测与处理重复值,使用 `drop_duplicates()` 方法等。”

2. 知识图谱中的知识点分布和层次结构便于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在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平台上,当学生学习完“数据清洗”章节的内容后,可以查询“下一步应该学习什么”。检索引擎在知识图谱中查找与“数据清洗”相关的下一个章节的学习内容。检索出“数据清洗”与“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存在相关关系。生成模型根据知识图谱中的关系,可以给出学习路径建议。回答内容:“你已学习完数据清洗的内容,下一步建议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and 展示数据,推荐使用 Matplotlib 和 Seaborn 库进行数据可视化。”

3. 知识图谱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路径,如视频、课件、实验代码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习惯和兴趣,选择适合的学习方法和资源。也可以根据知识图谱中的推荐,选择适合自己的其他学习资源,如视频讲解、在线课程、互动练习等。

检索引擎会在知识图谱中查找与学生已学习内容和表现相关的实体和关系。例如,学生已经学完并掌握了“Pandas”和“数据清洗”的内容,需要加强“数据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析”部分。生成模型根据知识图谱中的关系和学生的学习数据,生成个性化学习计划。

回答内容:“根据你的学习进度,建议接下来学习数据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析。以下是你的个性化学习计划:

(1)数据可视化:学习 Matplotlib 和 Seaborn 库,完成以下练习:

使用 Matplotlib 绘制折线图、柱状图、饼图等;

使用 Seaborn 进行数据分布和关系的可视化。

(2)高级数据分析:学习 NumPy 和 SciPy,完成以下练习:

使用 NumPy 进行数组操作和数值计算;

使用 SciPy 进行统计分析和科学计算。

(3)项目实践:完成一个小型数据分析项目,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RAG 与知识图谱结合,可以显著提升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这种结合利用了知识图谱的结构化数据和 RAG 的生成能

力,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处理和生成机制,为智能问答系统、课程内容推荐、个性化学习计划等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8]。

(二)知识图谱辅教

1. 准确掌握学情数据

知识图谱为教师提供了灵活、高效、多维度的教学支持服务,描绘了学生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学生的群体画像。教师可以通过知识图谱中的数据分析,实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掌握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内容。

知识图谱记录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如学习时间、学习频率、知识点掌握情况等,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教师可以根据知识图谱中的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模式和习惯,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教师也可以生成个性化的学生画像,识别学生的学习优势和不足,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通过知识图谱中的数据分析功能,生成每个学生的学习画像,了解其学习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帮助^[9]。

2.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通过知识图谱,教师可以分析课程内容的结构和逻辑,发现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优化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提高教学效果。知识图谱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反馈,调整和改进教学方式,如增加互动环节、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开展小组讨论等,提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 Python 数据分析课程教学中,教师每学期都会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以符合 OBE 的教学理念。课程的知识图谱融入教学,促进了数字教育新形态的形成。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分析和反馈,有助于作出科学的教学决策,如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等,教学质量和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3. 有效反馈学习效果

通过知识图谱可以精确统计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生成详细的学习报告,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动态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展,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对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教师可以根据学习数据和分析工具,为学生的学习评价提供科学依据,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教师可以通过知识图谱的多元化评价功能,如知识点测试、学习任务完成情况、课堂表现等,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跟踪和分析,提供及时的反

馈和指导,促进学生的持续进步。教师可以通过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评价功能,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激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五、结束语

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引入教学,实现了教学模式从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这种结构性变革推动教学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教育范式从供给主导转变为需求主导,将教师从低效、重复、繁重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回归更有温情的育人主业。教学评价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加速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授的过程,更加强调信息的获取、识别能力。学习者能够利用智能设备自由获取各类学习资源,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空间和方式,推动学习空间从课堂环境拓展为泛在环境。通过知识图谱,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学习效果显著提升;教师能够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最终实现教学效果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廖云燕,石荣旦,黄菁,等. 基于知识思维的大模型驱动教育智能化的分析与研究[C]//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2024 计算思维与 STEM 教育研讨会暨 Bebras 中国社

区年度工作会议论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24:13.
[2]喻国明,李钊,滕文强. AI+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升维与转型[J]. 宁夏社会科学,2024(2):191-198.
[3]赵丽红,左敏,黄先开.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教学的变革指向:培养高阶思维[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0-48.
[4]黄勃,吴申奥,王文广,等. 图模互补:知识图谱与大模型融合综述[J].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24(4).
[5]王娟,曹树金,王志红,等. 面向探索式搜索的领域知识图谱构建及实验探索[J]. 图书情报工作,2024(3).
[6]罗江华,张玉柳. 多模态大模型驱动的学科知识图谱进化及教育应用[J]. 现代教育技术,2023,33(12):76-88.
[7]郑佳明,陈家宾,胡杰鑫,等. 基于大模型和知识图谱的标准领域融合应用方法研究[J]. 中国标准化,2023,(23):39-46.
[8]吴兰岸,闫寒冰,黄发良,等. 大型语言模型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分析与现实挑战[J]. 现代教育技术,2023,33(8):29-37.
[9]刘波. 基于知识图谱的学习资源平台构建[J]. 高师理科学刊,2023,43(7):41-47.

(责任编辑 许峻)

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of Python Data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LIU Qiuju¹, WANG Zhongying², HUANG Jihai¹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Hen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Henan 450018,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llusion” that occurs 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s cont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aching method of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els combined with Python data analysis course knowledge graph,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s the “illusion” problem, but also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scattered teaching resources, curriculum knowledge graph is constructed, and knowledge points are displayed by using graph database Neo4j to help students facilitate personalized learning, develop scientific learning plans, help teachers analyze students’ learning data, understand students’ progress and knowledge gaps, adjust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realiz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graph; RAG; curriculum reform

“专创融合”理念下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 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杨颖辉,段明雪,姚明宇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分析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传统教学与“专创融合”教学改革现状与困境,探究从“看”“学”“仿”“评”“练”“战”学习流程上实施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模式融合、线上线下联动、考核方式多元、以赛促学的教改设计路径,促进学生专业素养和任务素养并重、职业素养和社会素养共进。

关键词:“专创融合”;创新创业教育;Python 程序设计;教学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7

中图分类号:TP312.1-4;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112-06

一、引言

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的特点。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却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深度融合,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专创融合”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独立于专业课程之外的附加内容,而是将创新创业的理念、思维和方法深度融入专业教育的各个环节^[1]。目前高校教育改革中“专创融合”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融合趋于“表面化”,融合深度不够甚至脱节,较多课程中“专创融合”体现在“以赛促创”单一角度,教师对于“专创融合”理解不够深入,师资力量欠缺等^[2]。这将制约“专创融合”的有效推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Python 程序设计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工程性课程,其教学改革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此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数字化学习能力等。本文以此课程为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探究教改意义、存在问题及实践路径,阐述“专创融合”教育改革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二、“专创融合”理念下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一)开发学生隐性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领域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板块中,工科学生的学科融合与编程技术的教学革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对于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掌握编程语言,学习前沿技术的基础上,参与项目实践,锻炼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已成为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生态的关键。在专创融合的教育理念下,教师鼓励学生结合实际需求,突破课

收稿日期:2024-12-26

基金项目:202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一般项目“‘专创融合’视域下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2024SJGLX0541);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科技攻关)项目“多接入边缘计算环境下任务卸载若干问题的研究”(232102210139)

作者简介:杨颖辉(1983—),男,河南漯河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段明雪(1995—),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教育软件与资源开发。姚明宇(1993—),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机器学习。

本既定的编程示例限制,运用 Python 去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实训课环节,教师引入企业小型实战案例,学生按照实验开发需求,自主设计程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在实践中打磨创新思维,并在项目实战中进行分组协作学习,不同成员发挥各自在 Python 不同模块(如前端界面设计、后端算法实现、数据存储管理等)的专长。同时要求学生能够清晰阐述自己的代码逻辑、理解他人的设计思路。在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同时有效提升其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中,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树立创新创业理念、学习创新创业知识、掌握创新创业技能,进而成长为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通识素养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其形成隐性智能。

(二) 激发学生创业潜能

Python 在当今众多创业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如互联网电商的数据分析与挖掘、智能硬件的控制系统开发等。课程教学融入创新创业理念后,学生会接触到各类基于 Python 的创业案例,了解如何从一个创新性想法起步,利用 Python 技术逐步搭建起可行的商业模式。“专创融合”教育理念能够帮助学生看到编程技能在创业领域的无限可能,激发其内心深处的创业热情,引导他们提前规划职业路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方向,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学生可以在课堂中依托企业实战项目的开发,体验企业各部门的协调与分工,发现自己擅长的职业或者岗位,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并初步了解企业运营模式与管理方法,为创新创业做准备。

(三) 提高专业教育的实际应用价值

Python 程序设计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是学习其他编程语言和数据分析、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基础。课程建设的目的是让学生熟悉 Python 语言的语法规则、编程思想以及常用的程序设计模式,具备运用 Python 进行程序开发、代码优化和问题解决的基本能力,为后续的专业学习与实际项目开发打造基础。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使原本抽象晦涩的编程知识与实际企业案例项目开发相结合,学生能够理解创新创业逻辑,学习企业开发经验,有效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专创融合”教育理念能够提高专业教育课堂教学成效,促进专

业教育发展,丰富“专创融合”理念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开发“专创融合”课程体系,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高等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四) 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筑牢根基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是高校、社会乃至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举措。专业教育是学生具备就业岗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基础,创新创业教育则是学生具备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提供以创业促就业的必备手段。“专创融合”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具备专业能力、创新思维与创业意识等素养的综合素质人才,此目标与促进学生“就好业”“好就业”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以创业带动就业”已成为重要的就业新形态,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地位,但是此课程的开设现状是形式高于内容,相对于专业课程,学生对其并不重视。“专创融合”教育则可以解决学生心理上轻视创新创业教育的问题,倒逼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教学模式。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编程技能、具备信息思维和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能够让学生接触更多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案例,引发学生的创业思考,提高学生对于新兴产业的创业兴趣。

三、“Python 程序设计”融入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 Python 程序设计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教学模式单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下,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侧重于语法知识的传授与基础编程技能的训练。教师在理论课中多采用课堂讲授结合少量简单案例演示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无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编程思维和创新思维,容易出现“填鸭式”教学。此类“接受式”教学方式下,部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低,不能有效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案例缺乏创新。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语法规则,但面对真实复杂的项目需求时,无法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基础课,教学案例一般为课本单元教学案例或经典算法题目,知识点比较小且案例无创新,学生能够在网上搜索到已有的答案,甚至部分学生会使用 AI 技术完成作业代码的撰写,不利于实践课程的教学。

学生个性化发展无法得到关注。统一的教学

进度、教学内容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导致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不上”,最终影响整体教学效果,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此类教学模式下,教师无法兼顾学优生的选拔培养和学困生的帮扶,教学效果较差。

课堂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在高等教育课堂上会出现部分学生长时间玩手机、睡觉等不专注课堂学习的现象。理论课学习过程中教师会出现专注讲课,不能及时关注学生学习倦怠期的情况,难以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实践课堂中教师将学习任务下发后,会出现学生主体性过高,自主学习时间无法自控,忽视了教师的主导性。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积极性、保持学生的学习专注力,是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二)“专创融合”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

目前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实际的教学体系中处于“分置”状态^[4]。部分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单独设置,由创业导师或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授课,此种方式可以更直观地向学生传授创新创业知识、创新创业流程与技巧,但无法激发学生在专业教育中的创新性思维,在培养学生依托所学专业参加大赛或创业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师资力量不足。大多数专业教师虽在本专业领域造诣深厚,但缺乏创新创业实践经验,难以将前沿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融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给予学生精准有效的指导。而具有丰富创业经历的校外导师,又往往因时间、精力有限,不能深度参与日常课程教学,仅偶尔举办讲座分享,难以满足学生持续学习的需求。

教学资源匮乏。合适的专创融合教材稀缺,现有的教材或侧重于专业知识讲解,创新创业内容生硬植入;过于聚焦创业案例,专业深度不够,无法为学生提供系统全面的学习支撑;实践场地、设备以及项目资金的不足,使得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难以充分开展。

教学考核无法量化。“专创融合”教育中对于创新创业思维和理念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此项指标无法量化,只能依靠教师根据学生的作品或产品进行定性评价^[5]。单一课程对于学生的培养无法快速体现创新创业思维,因此“专创融合”课程体系建立后关于创新创业思维与理念的考核也是一项难题,部分高校将创新创业实践作为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但只有完成各类创新创业课程

才能获取此环节的学分。

(三)Python 程序设计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机遇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特点是实践性强,要求学生具备逻辑清晰、思维严谨的学习态度和主动学习的内部动机。精通编程类语言要求学生花费大量的课余时间进行代码训练和代码调试,在学习探索过程中 Python 代码的编写非常锻炼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创新思维。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因为求知欲与探索欲是学习编程类语言不可或缺的动力,而该课程能充分激发学生这两方面的动力。同时,Python 作为工具,可用于解决创新创业问题,助力学生更好地完成创新创业项目和实践活动。Python 程序设计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融合可以促进两者的教育教学成效,是一场“双赢”的教育教学改革^[6]。因此,我们以此课程为例探究“专创融合”教育改革,根据优化课程内容与结构—完善课程教学设计—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考核体系的路径,探索“专创融合”教育改革在 Python 课程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四、“专创融合”理念下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教改建设思路与具体设计

为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从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两方面提高教学成效。根据以往教学实践经验,从线上到线下、从教师到学生、从课上到课下全方位地开展“专创融合”背景下的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深度融合。具体教改建设思路着重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入手。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与结构,加入创新创业知识案例,突出创新创业理念,强调跨学科融合,不局限于 Python 语言本身知识点的教学。根据学习阶段的递进引入小型、中型企业实战案例,通过案例实践教学让学生能够在更多创业领域中见到 Python 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对 Python 语言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引入企业运营及管理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渗透创新创业知识,培养创新创业思维。

完善课程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采用 PBL 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的设计和实现过程。通过项目实践,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Python 语言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丰富并整合教学案例资源;通过具体案例的讲解和实操,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Python 的基本语法和编程技巧,让学生感受到 Python 的实用价值;通过创新创业理论与案例的渗透式教学,帮助学生克服创新创业畏难情绪,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

改革教学考核体系,锻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于创新创业思维和理念的考评,采用代码的创新性考查及创业计划书的撰写这两种方式进行定性评价。最终采用创新创业项目汇报、Python 程序作品展示、竞赛获奖权重相结合等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综合素养,评估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改设计秉持产出导向原则,首先清晰界定课程的教学目标,科学规划教学内容。整个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围绕教学目标,精心策划“学教”互动环节。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协作与探究学习为核心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该模式包含以下学习流程:“看”,利用网络平台资源进行学习;“学”,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仿”,通过模仿示例进行编程实践;“评”,接受教师或同学的点评以反馈提升;“练”,独立练习编写类似源代码以巩固技能;“战”,参与实际项目,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7],这一流程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基于上述融合教学模式,我们得以分析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教改路径。

(二) 教学内容重构,融合创新创业知识——教什么

Python 作为一门程序设计语言,具有功能强大、语法简洁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如文字图片处理、网站和游戏开发以及机器人和航天飞机控制等。在 Python 应用中有较多现实创新创业案例,我们将案例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在课堂中进行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知识的融合教学。本课程共 48 个学时,由 32 个理论学时和 16 个实践学时组成,理论课教学占比 2/3。教材使用侧重于 Python 基础知识的教学,课程整体规划将授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1—12 学时)、中级阶段(13—36 学时)和高级阶段(37—48 学时)。初级阶段主要包括 Python 基础语法、基本数据类型、流程控制语句、函数基础,可以采用趣味性简单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夯实基础,引入“双色球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获得感,初步感受 Python

解决实际问题的魅力;中级阶段涵盖函数高级、常见模块和文件操作,引入相对复杂、贴近实际应用的案例,如“校园图书借阅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学生在开发过程中运用函数高级特性优化代码结构,借助常见模块处理图书信息存储,通过文件操作实现借阅记录的保存与读取,从而拓宽编程视野;高级阶段主要介绍面向对象和第三方库等内容,引入“边缘计算系统卸载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案例,引导学生从面向对象的设计思维出发,将系统中的各个组件抽象为不同的类,利用类的继承、多态等特性构建复杂而灵活的系统架构,让学生在攻克复杂系统开发难题的过程中,掌握高阶 Python 编程技能。

(三) 多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怎么教

基于 Python 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的组织。项目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翻转课堂、学生示范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相互融合,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 Python 编程的精髓,还可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讨论,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考能力。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互补,打破传统教室与课堂时间的限制,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使教学地点不只局限于教室、教学时间不只局限于课堂的 90 分钟。通过学习通平台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更多案例资源、微课资源,让学生在课堂之外能够自主学习。课前,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课前发布导学案和微课资源,引导学生在通平台上自主学习,不仅能够有效减轻课堂讲授压力,还能使学生在预习阶段就形成对新知识的基本认知,为后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学生通过完成导学案、观看微课视频更好地培养代码编写习惯、完成新课预习。课中,采用案例教学与学生示范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通过分组讨论、案例解析等环节,学生可以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锻炼自己的表达与沟通能力。而学生示范教学则进一步发挥了同伴效应,让优秀学生成为课堂的小老师,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与编程技巧,这种角色转换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也营造了班级内部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学习氛围。通过案例教学、学生示范教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性。课后,通过实训项目,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

作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巩固所学知识,提升动手实践能力。这些实训项目既涵盖基础编程技能的训练,也包含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创新任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与创新能力。

(四)线上线下相结合,发布创新创业学习资源——怎么学

通过学习通平台、慕课 MOOC 平台的运用,学生能够获取更多的最新知识与案例资源,了解技术前沿和创新创业热点^[8]。课前的导学案、课后的项目作业、课件、知识点总结、上课案例代码等都可以发布在学习通的课程资源中,构建一个完整的“专创融合”课程资源体系,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学习平台。这些资源不仅能够有效支撑翻转课堂的开展,还能让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迅速获取全面的学习资源,极大提升学习便捷性与自主性。线上学习方面,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明确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同时利用平台的监督功能,确保学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习任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其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和兴趣点进行针对性学习。线下学习方面,通过带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案例实践,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还通过作品展示的方式,增强他们的学习成就感与自信心。通过作品展示,采用教师评价、生生互评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增强学习自信心,培养学生的良性竞争与合作精神。此外,针对同一个问题需求,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代码解决算法,并通过平台或课堂进行展示与讨论,这种开放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独特见解与创新能力,还让他们在相互学习中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与思维方式。

(五)考核方式多元化,助力创新创业实践——怎么评

设计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在 Python 课程及创新创业方面的学习成效。这一考核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重视其学习过程与综合素质的评价。过程性评价(即平时成绩)由考勤(10%)、课堂问答积极性(10%)、实训作业(40%)、期中考核(20%)、创新创业类竞赛参与次数与成绩(20%)五个方面构成,占最终成绩的50%。考勤与课堂问答积极性能够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实训作业则通过贴近社会实际问题的创新创业案例,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接轨,将

所学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提升学习的实用性与趣味性;期中考核则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的检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并将其参与次数与成绩纳入评价体系,以此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创新能力。终结性评价(即期末考核)由代码实现(50%)、代码规范性(20%)、程序的创新性(20%)、程序的健壮性(10%)四个方面构成,占最终成绩的50%。代码实现考察学生的编程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代码规范性则强调编程习惯与代码可读性,这对于提高团队协作效率与软件维护性至关重要;程序的创新性鼓励学生突破传统思维,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程序的健壮性则关注程序在异常条件下的表现,要求学生具备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考核方式多元化,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要求更为严格,考核更加细致,这种综合评价策略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综合素质,还能够引导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提高课堂成效。同时,也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之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六)参与创新创业学科竞赛,检验课改成效——怎么证

Python 课程作为计算机类工科专业的核心课,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和学科竞赛,这不仅是检验课程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常规类比赛有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这些赛事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商业策划与团队协作能力;专业性强、技术深度高的比赛有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蓝桥杯、百度之星·程序设计大赛、华为 ICT 大赛等,这些专业类竞赛不仅考查学生的编程技巧与算法设计能力,而且考验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参与竞赛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理论学习向实践应用转化的过程,它要求学生将课堂所学与实际问题解决紧密结合,从而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强化能力。通过不断的比赛历练,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与准确性,还能在创新创业思维、团队协作、项目管理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教师应构建“全员参赛、全面指导”的竞赛参与机制,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与专业特长选择适合的赛事,还要通过组建跨年级、跨专业的参赛团队,促进知识与技能的交叉融合。

五、结束语

以“Python 程序设计”为例开展“专创融合”教育改革,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对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一次积极响应。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化、考核方式多元化以及学生思维创新化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深度融合,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既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又强调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培养的综合性学习平台。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水平。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成为兼备专业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促进了学生专业素养和任务素养的并重发展,更促进了职业素养和社会素养的共同提升,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未来,“专创融合”教学改革将不断深化,例如跨学科交叉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针对性地融入相关领域的创新创业知识与案例,鼓励组建跨专业团队参与创新创业类比赛。建立教学反馈机制尤为重要,我们要根据改革的实际成效不断优化相关教学模式和方法,保证“专创融合”教学长效性。

参考文献:

[1] 朱晓红,董理. “专创融合”理论研究综述[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3):43-46.

[2] 卢卓,吴春尚. 专创融合改革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突围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0(19):74-78.

[3] 陈青青,唐晓文,刘涛,等.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探索[J]. 科技风,2024(31):139-141.

[4] 王宏. 就业视角下的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以文山学院为例[J]. 文山学院学报,2024(6):94-98.

[5] 陈克海,张金兰,解学通.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改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23,44(23):227-229.

[6] 谢婷.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施路径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4,40(12):94-96.

[7] 王永贵,王攀,高利革,等. 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创融合”教育的有机融合:以滁州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为例[J]. 喀什大学学报,2024,45(6):94-99.

[8] 梅海霞,程子轩. “操作系统”课程专创融合教学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23):205-207.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Path for Python Programming Course under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YANG Yinghui, DUAN Mingxue, YAO Mingy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Python Programming courses and the reform of “integrating speci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teach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paths of teaching reform, which are implemented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from the competition-driven learning process of “seeing”, “learning”, “imitating”, “evaluating”, “practicing”, and “fighting”. These paths include teaching content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mode integr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linkage,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nd task literacy, and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literacy together.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ython programming; reform in education

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改良机理及防渗性能研究

郝文彬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为提高富水铁路隧道工程注浆材料防渗性能,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工程实践对介子掺和料(PA)进行试验,探究介子掺和料用于隧道工程注浆防渗处理时对水泥砂浆抗压强度、渗透性、凝结率、凝结时长以及砂浆黏度等因素的影响。借助电子扫描显微镜以及X射线成像分析添加改良介子掺和料的水泥砂浆内部结构状态以及成分变化,探究介子掺和料对水泥砂浆的改良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掺入水泥砂浆后的凝结时长、黏度变化不明显,但砂浆的抗压强度及凝结率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砂浆渗透性有所降低,其中取水泥质量的1.5%作为介子掺和料时注浆材料性能改良效果较好。

关键词: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改良机理;强度;防渗性能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8

中图分类号:TU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118-06

注浆技术用于隧洞围岩加固及防渗处理时对环境要求不高,施工操作简便,市场上存在多种不同注浆材料可供选择,因此是目前隧道围岩防渗加固的主要措施之一。而目前针对注浆材料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中大部分注浆材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性,材料固结完成后很容易导致结构大幅收缩并影响防渗效果,聚氨酯之类的注浆材料还存在力学性能不佳等问题^[1]。尽管一些常规的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注浆材料(CCCW)自愈功能强,也比较环保,但是膨胀性差,对小孔洞和裂隙不能有效堵塞,因此作为注浆材料仍存在一些缺陷。

介子掺和料(PA)是常规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注浆材料(CCCW)的改良,该掺和料以普通硅酸盐水泥等作为基料,将各种活性化合物以及其他辅助材料通过配比混合而成,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绿色环保、抗渗性较好的新型防水材料。尤其是PA改良注浆材料具有一定膨胀性,堵塞小孔洞及裂隙缝的效果较好,这是优于其他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注浆材料(CCCW)的最大特点。

为提高隧道注浆效果,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学者

开展了隧道注浆介子掺和料(PA)及改良机理的研究。比如朱才文^[2]针对隧道围岩以及边坡稳定性不好的工况,开展注浆材料的流动性、砂浆凝结时间以及单轴力学强度试验。研究发现聚氨酯注光材料的浓度越浓,流动性越差、扩散半径越小、凝结时间越短,而快速凝结性能就越强;孙铁轶^[3]针对辽西隧道软弱围岩容易塌方的工况,也展开了注浆加固的试验研究。通过对不同注浆材料的抗折强度以及抗压强度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到在不同龄期下注浆材料的基本力学特征,为类似隧道项目提供经验借鉴。刘永超^[4]等人对马丽散、双组分水反应类聚氨酯、双液浆等多种类型的注浆材料展开堵漏试验和研究,针对不同注浆材料的堵漏成效及堵漏机理提出合理的参数。付宝宁^[5]借助水泥基毛细管结晶材料—介子掺和料(PA)加工新型PA改良隧洞注浆材料,通过试验发现新型PA注浆材料浆液无论是凝结速率还是抗压强度都得到增强,且渗透性降低;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PA材料的掺量为水泥质量的1.5%效果最好。李冠鹏^[6]等人展开介子掺和料(PA)增强隧道防水效果和机理的研究。研究

收稿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郝文彬(1988—),男,河北邢台人,大学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桥梁、隧道、路基等施工领域研究。

发现:水泥浆液掺入 PA 以后,对其黏度和凝结时间都没有显著改变,但是 PA 中所含活性物质与硅酸盐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所形成的晶体以及水化产物可以对浆液中孔隙进行填充,不仅提高水泥浆液的强度和抗渗透性,还能提高其致密性和光滑性。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分析,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工程实践,一种新型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被提出,研究其对于水泥砂浆防渗性能的影响,设计室内试验探究改性注浆材料各方面性能,并结合电子扫描显微镜和 X 线成像进一步分析介子掺和料的微观改性机理,探究介子掺和料和水泥砂浆之间的混合比例最佳值,评价最佳掺量下改性注浆材料的防水效果。

1 工程概况

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下穿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出口地处福州市东村北面,线路依次在 DK12+190, DK13+010, DK13+320, 从既有福厦铁路和温福铁路联络线隧道上方交叉穿越,进口地处福州市东山村东面,与东山村相距 400 m, 依次在 DK5+210, DK5+229 下穿机场高速和南三环路。隧道起止里程为 DK5+101~DK13+300, 全长约 8200 m, 设计为单洞双线铁路隧道。

1.1 水文情况

(1)地表水情况: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出口靠近闽江,隧道出口与闽江最近距离只有 760 m, 闽江水系构成地表水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隧址所在地区地貌为剥蚀低山,周围是火山岩地区,地形高差比较大,充分发育成凹型地貌,切割比较深,河床比较狭窄,纵坡隆起幅度比较大,遇到较大水流时会出现比较湍急现象,当遭遇暴雨时流量会增加。

(2)地下水情况:隧道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主要包含基岩和水构造裂渗(涌)水、岩溶水、孔隙涌(流)水等,涌水量非常大,通过勘察该隧洞段每天最大涌水量约为 $39\text{ m}^3/\text{h}$ 。

1.2 不良地质及特殊地质情况

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出口段Ⅱ级围岩 1900 m, Ⅲ级围岩 290 m, Ⅳ级围岩 95 m, Ⅴ级围岩 60 m。危岩危石为本线三大不良地质现象之一,洞口有很多危岩危石危岩落石,该工程部分区域还存在节理裂隙发育带。

依托福平铁路新鼓山富水隧道工程为例开展分析,开挖隧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涌泥、涌水和突水等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加固断层破碎带,其中需要格外注意富水断层破碎带加固效果。

2 试验设计

取普通硅酸盐水泥 P. O42.5 作为水泥浆原料,水泥浆配比为 1:1,并准备水泥质量的 0%、0.3%、0.6%、0.9%、1.2%、1.5%、1.8% 作为介子掺和料用量,分别配置改性注浆材料,设计室内试验探究改性注浆材料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并设计微观实验分析改性机理。

2.1 测试物理性能

根据相关规定^[7]要求测试不同组改性砂浆凝结时间,其中各组改性砂浆中探针底部没入杯子底部 4 mm 时所用时间为初凝时间,其中砂浆配制完成并注入模具后,探针进入浆体内部并深入至 0.5 mm 时记录时间,这一时间为终凝时间。

根据相关规定^[7]借助 NDJ-1 旋转黏度计^[8]见图 1(a),测试 PA 浓度为 1.8%、1.5%、1.2%、0.9%、0.6%、0.3% 和 0% 的改性砂浆凝结率,首先取各组改性砂浆分别 60 mL,放入 100 mL 量筒中并在自然条件下凝固,24 h 后观察记录各个量筒中砂浆凝固量,所得结果与 60 mL 比值即为凝结率。

上述实验开展时,各组改性砂浆分别以 3 组并同时进行试验,最终结果以 3 组结果平均值。

砂浆渗透试验装置为图 1(b),制作直径和高度均为 15 cm 的碎石混凝土试件,分别对不同组改性砂浆开展渗透试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设备如图 1(c),制作 $15\times15\times15\text{ cm}$ 正方体试件并开展单轴抗压强度试验。

试验过程中首先在砂浆渗透试验装置底部放入透水石,而后加入改性砂浆,并在试样表面放置多孔石,注入液体石蜡以填充瓶壁和试样之间孔隙,密封头盖、橡胶轴承,避免水分渗漏问题。打开进口阀和出口阀并加入水分,读取压力表读数,等待压力表、水流量表显示数字均达到稳定数字且 5 s 内不发生变化时记录特定时间范围内通水量。为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各组砂浆均同时配制 3 组并分别开展试验,试验最终结果取 3 组测试结果均值。

2.2 测试力学性能

无侧限抗压强度(UCS)试验中^[9,10],制作碎石拌合凝固试件和介子掺和料砂浆凝固试件,试件规格均为 $10\times10\times10\text{ cm}$ 的标准立方体,成型后在温度 $18\sim22\text{ }^{\circ}\text{C}$ 、湿度大于 95% 条件下进行标准养护,养护至指定龄期时结合相关规范要求分别测试各组试件无侧限抗压强度。富水环境下采用注浆加固防水处理时,砂浆凝固后依然会在水分充足环境下发挥作用,因此试验开始前需要对试件进行一段时间浸水处理以模拟实际服役状况,而后开展强度测试。



(a) 水泥稠度仪



(b) 砂浆渗透试验装置



(c) 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设备

图1 水泥稠度仪、渗透试验和单轴压缩试验设备

2.3 微观分析

沙砾拌和混凝土试件制备完成后浸水养护 28 d, 各组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改性砂浆浸水养护 7 d, 使用 X 射线成像仪扫描各组混凝土养护后状态并评价各组试件孔隙率差异, 依托 VG Studio MAX 软件结合介子掺和料掺量开展可视化分析。

沙砾拌和混凝土试件和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改性砂浆试件分别浸水养护 28 d 后取样,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所得试验样品进行观测, 所得结果可用于评价介子掺和料改性机理。

3 结果与讨论

3.1 分析各组改性砂浆的凝结时间及黏度

分析各组改性砂浆的凝结时间及黏度差异, 所得结果如图 2 和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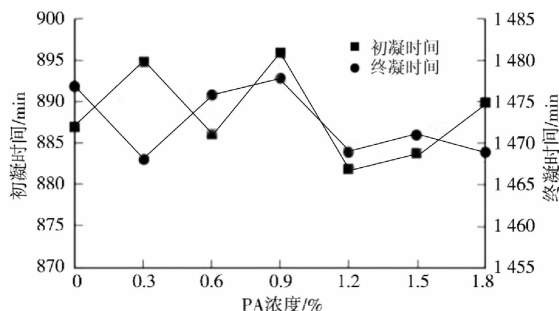


图2 凝结时间差异图

结合图 2 和图 3 内容可知, 改性砂浆的黏度和凝结时间均不会随介子掺和料浓度增大而出现显著变化, 由此可见, 介子掺和料的浓度不会直观影响水泥砂浆的黏度及凝结时间。

3.2 分析凝结率

分析不同介子掺和料浓度下水泥砂浆的凝结率变化过程, 结果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 介子掺和料的掺加有利于改善水泥砂浆凝结率, 且改性砂浆中介子掺和料浓度越大, 砂浆凝结率越高, 当介子掺和料浓度提升至 0.6% 时凝结率快速提升, 这一提升幅度持续到 0.9%, 而后凝结率依旧随介子掺和

料浓度提升而提升, 但幅度较小, 介子掺和料浓度达到 1.5% 以上时改性砂浆凝结率随浓度提升的改善幅度明显降低。其中掺加 1.8% 介子掺和料时改性砂浆的凝结率对比纯水泥砂浆提升了 98.6%, 提升幅度约 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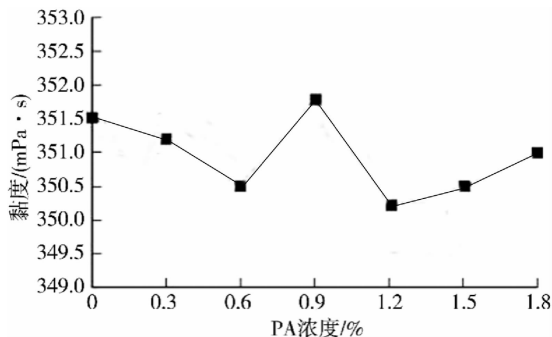


图3 砂浆黏度差异图

根据分析结果,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介子掺和料中含有比较多的活性组分, 这些活性组分能够与水泥水化产物及中间产物发生大量物理化学反应并形成新的水化产物, 同时部分活性物质能够催化水化反应, 最终使得改性砂浆凝结率明显提升。整体来看, 掺加介子掺和料后改性注浆材料凝结率已经显著高于常规材料, 该类材料具有应用于富水软弱围岩隧道注浆施工中的价值。

3.3 分析渗透率

分析掺加不同量介子掺和料制备砂浆试件的渗透率差异, 所得结果如图 5 所示。结合图 5 中信息可知, 介子掺和料浓度提升过程中混凝土试件渗透率逐渐降低, 其中掺加 0.3% 介子掺和料时改性砂浆试件渗透率已经达到 3.11×10^{-7} m/s, 相较未参加介子掺和料试件渗透率的 5.12×10^{-7} m/s 已有明显降低, 掺加 1.8% 介子掺和料时改性砂浆试件渗透率已经达到 0.31×10^{-7} m/s, 可见介子掺和料的掺入会显著降低改性砂浆试件渗透率。

根据分析结果,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介子掺和料、沙砾、水泥砂浆共同拌合时, 介子掺和料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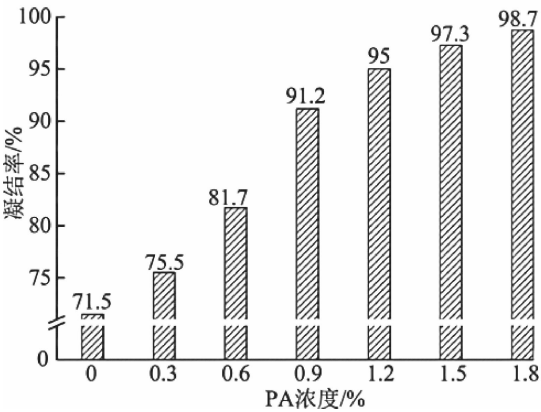


图4 砂浆凝结率差异图

活性物质部分能够与水泥水化产物发生反应并填充结构体系中的孔隙,另一部分不和水化产物反应的组分也能够毛细孔隙压力和渗透压力等共同作用下在结构孔隙内部结晶,实现对孔隙的堵塞,两种反应共同作用下混凝土体系内渗水通道得到快速封堵,最终表现为注浆料渗透性的降低。因此,采用胶质掺和料改善注浆材料性能,可有效提升改性注浆料的抗渗性能,具有应用于隧道工程中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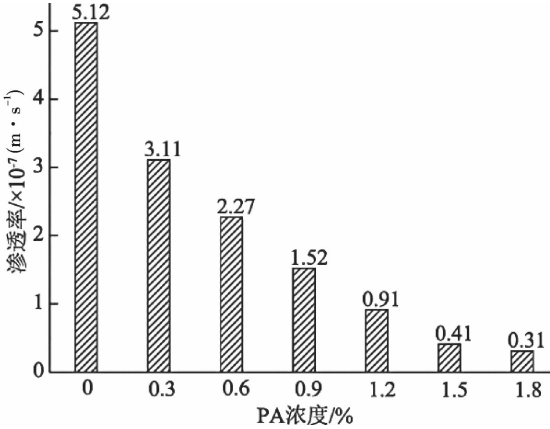


图5 渗透率分析结果

3.4 分析无侧限抗压强度

分析相同养护条件下掺加不同量介子掺和料的水泥砂浆试件抗压强度水平,各组砂浆分别制备立方体抗压强度试件并测试抗压强度,结果如表1所示。结合表1中内容可知,采用沙砾和水泥砂浆制备混凝土试件具有相对较高的抗压强度,单纯使用水泥砂浆配制的试件抗压强度较低,两种试件随介子掺和料用量增加均出现抗压强度提升的发展趋势。其中介子掺和料浓度在0%~0.9%范围内时,介子掺和料浓度提升则试件抗压强度虽有所提升,但幅度并不明显,而进一步提升浓度至1.5%的过程中强度增长幅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使用于沙砾与砂浆共同制备的混凝土试件和仅使用水泥砂浆配制的试件。

根据分析结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因为介子掺和料中的活性物质在水分充足的条件下能够发生缩聚结晶反应并形成大量晶体,这类晶体具有厌水性且能够填充结构体系缝隙,因此掺加介子掺和料后砂浆试件的强度性能显著提升,承载能力明显增强。综合来看,介子掺和料的应用有利于改善砂浆强度性能,具有应用于松散土体隧道加固、岩体裂隙加固等施工实践的价值。

表1 试件强度测试结果/MPa

PA 浓度/%	水泥砂浆			沙砾 + 改良砂浆		
	3/d	7/d	28/d	3/d	7/d	28/d
0	2.25	2.91	3.76	2.33	3.21	4.71
0.3	2.28	3.17	4.03	2.38	3.28	4.82
0.6	2.31	3.22	4.15	2.41	3.39	4.98
0.9	2.38	3.28	4.26	2.48	3.53	5.11
1.2	2.41	3.30	4.33	2.55	3.65	5.28
1.5	2.45	3.41	4.45	2.63	3.74	5.42
1.8	2.53	3.43	4.52	2.83	3.83	5.53

分析介子掺和料浓度为0%和1.5%时,不同工况下单轴抗压强度测试情况如图6所示。结合图6信息可知,试件标准条件下养护,最终抗压强度无论是否加入介子掺和料,都始终高于浸水条件下养护试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浸水条件下,砂浆中各类组分活性有所降低,化学反应速率得到衰减,最终使得试件力学性能下降。与此同时,固定养护条件为浸水养护,则使用介子掺和料试件抗压强度始终高于未掺加介子掺和料的分子。实验过程中各组掺加介子掺和料的试件即使在浸水条件下也具有始终高于规范的强度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富水条件下采用介子掺和料加固隧道结构具有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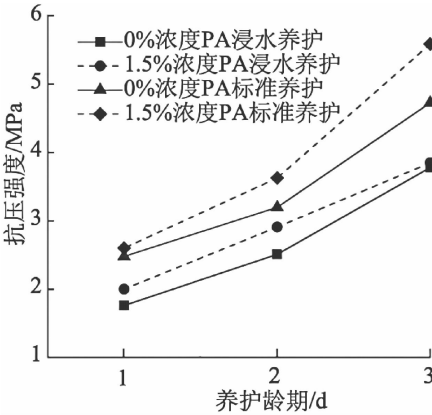


图6 单轴抗压强度测试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介子掺和料采购成本较高,但有助于改善工程综合成本,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当介子掺和料用量为1.5%时用于改良沙砾和砂浆制备的试件时,试件抗压强度显著提升,养护28d条件下可达5.42MPa,防水性能明显改善,渗透率仅为 $0.41 \times 10^{-7} \text{ m/s}$,同时浆料凝结率可达97.2%,

性能得到显著提升,符合《铁路隧道工程质量检验检测标准》(TB10720—2016)等相关规定,应用于富水隧道防水施工时具有良好可行性。

4 分析微观结构和机理

4.1 分析 CT 扫描情况

采用 0% 和 1.5% 为介子掺和料用量,改良沙砾和砂浆配制砂浆,在浸水条件下养护 7 d,试件成型后进行 CT 扫描并分析其孔隙率、孔隙分布情况所得结果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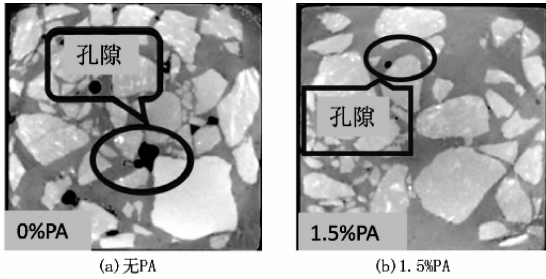


图 7 CT 扫描试件截面微观结构

结合图 8 内容可知,不掺介子掺和料的试件断面相对粗糙,而使用 1.5% 介子掺和料改善后试件表面光滑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的加入能够有效改善水泥砂浆凝结率。除此之外采用 1.5% 介子掺和料改善的试件孔隙尺寸、孔隙数量均得到显著下降。这一结果表明,介子掺和料的应用能够有效填充混凝土结构内部孔隙,实现结构紧密性的提升。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介子掺和料用量提升或养护时间延长,则混凝土试件孔隙率逐渐降低,其中采用 0.9% ~ 1.2% 介子掺和料条件下试件孔隙率降低幅度十分明显,而进一步提高介子掺和料浓度,虽然孔隙率依旧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其中掺加 1.8% 介子掺和料时,养护 7 d 试件孔隙率相较未掺加介子掺和料组试件降低幅度达到 21.8%,养护 28 d 试件孔隙率相较未掺加介子掺和料组试件降低幅度达到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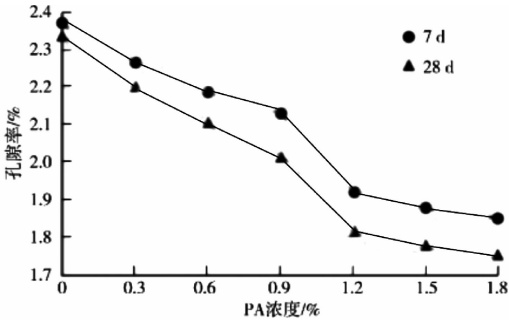


图 8 孔隙率与介子掺和料用量关系

4.2 分析扫描电镜情况

分别取介子掺和料用量为 0% 和 1.5% 并采用沙砾和砂浆配制混凝土试件,各组试件均在浸水条

件下养护,28 d 后养护完成并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试件微观结构,此处首先使用 500 倍和 1000 倍放大初步观察结构孔隙状况。结果可知,不掺加介子掺和料条件下制备所得水泥砂浆混凝土内部结构存在多处蜂窝麻坑,且填充结构相对松散,放大倍数达到 500 倍时就已经能够清晰观察到结构气孔。而掺加 1.5% 介子掺和料条件下制备所得水泥砂浆混凝土结构相对光滑,孔隙体系显著降低,由此可见,介子掺和料的应用可以有效填充混凝土内部孔隙并强化结构紧密性,这一结果进一步佐证前文渗透率试验结果与 CT 扫描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实验结论,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6000 倍放大下观察掺加 1.5% 介子掺和料水泥砂浆混凝土试件的内部结构。所得结果可知,掺加 1.5% 介子掺和料后混凝土试件内部形成大量针柱状晶体并堵塞结构内部大量孔隙。这一结论进一步佐证了水泥砂浆中掺加介子掺和料能够形成晶体并堵塞试件微观孔隙的实验结论,说明介子掺和料的应用能够改善试件内部紧密性,强化水泥砂浆抗压强度,加速固结速度,降低结构渗透率,强化整体防水性能。

5 施工效果分析

选取福平铁路新鼓山富水段隧道工程防水加固施工为例开展分析,案例工程所在区域岩体组成包含中风化花岗岩、强风化花岗岩、压碎岩和断层角砾岩等,岩体内部存在显著的节理裂隙发育带,借助普通注浆材料和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分别进行注浆加固并进行性能对比,试验段共计 20 m 长度,取 P · O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水泥浆原料,水泥浆配比为 1 : 1 (水 : 水泥),使用介子掺和料浓度为水泥质量的 1.5%。采用 GZ - 5 注浆机,注浆压力为 3 MPa,浆液扩散直径 21.0 m,每孔注浆量不少于 30 L,不大于 50 L。对比两处试验段注浆加固效果,分析所得结果并评价普通砂浆注浆加固效果及改性注浆加固效果。

采用不掺加介子掺和料的普通注浆材料开展注浆加固施工,隧道周边围岩承载能力平均值达到 112 kPa,围岩含水率约为 22% ~ 24%,施工过程中偶发掉块、涌水、现突等问题,隧道掘进施工速率较慢,其中每进尺 60 cm 需要使用 16 ~ 25 h 进行开挖支护,安全性较差且施工效率较低。

而采用 1.5% 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进行注浆加固施工,施工完成后试验段周边围岩含水率明显降低,仅有 6% 左右,同时围岩承载力大幅提升近 240 kPa,相较于原有结构承载水平提升一倍有余。加固完成后掌子面十分稳定,周边围岩结构密实性

较强,施工过程中并未出现涌水等问题,安全性有保障,施工效率明显加快,且隧道初期支护变形幅度十分微弱,施工过程中并未发生渗水等问题,隧道施工安全得以保障,底层结构得以加固,隧道结构防水防渗效果良好,各方面参数均达到标准要求。同时采用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开展注浆加固施工时,20 m 试验段内浆液需求量仅为普通注浆材料注浆加固需求量的 16%。

6 结论

本研究采用介子掺和料改善水泥浆料并形成新型注浆材料,依托室内试验分析改性注浆材料的抗压强度、渗透性能、凝结率、凝结时间、砂浆黏度并对比普通注浆材料,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成像进一步分析介子掺和料改良水泥砂浆的改性机理,设计工程试验对比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和普通水泥砂浆注浆料之间差异,得到结论如下:

(1)介子掺和料的掺入能够有效改善混凝土试件抗渗性能及抗压强度,其中掺加 1.8% 介子掺和料时水泥砂浆渗透率降低至 0.31×10^{-7} m/s,相较于未掺加介子掺和料时的 5.12×10^{-7} m/s 降低明显。

(2)掺加介子掺和料浓度为 1.5% 时改性砂浆混凝土在养护 28 d 条件下抗压强度已经达到 5.42 MPa,凝结率高达 97.2%,此时试件渗透率为 0.41×10^{-7} m/s,性能达到较高水平,使用介子掺和料改善水泥砂浆性能时最佳用量为水泥质量的 1.5%。

(3)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线成像分析结构微观状态,水泥砂浆中硅酸盐组分能够和介子掺和料中后续组分形成大量结晶体,填充混凝土结构孔隙,降低孔隙率,提高密实度,强化结构强度,降低水泥砂浆渗透性。

(4)结合福平铁路新鼓山隧道工程加固施工,采用普通注浆材料和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分别进行注浆加固处理,结果显示采用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开展注浆加固时,围岩结构承载能力提升幅度明显,围岩含水率降低明显,有利于加速施工工期,节约注浆料。

参考文献:

[1] 谢飞. 不同出水状态岩质隧道围岩注浆加固方法和材料选择研究[J]. 市政技术,2021,39(9):83-86.
[2] 朱才文. 新型聚氨酯无机复合注浆材料工程性能分析[J]. 水利科技与经济,2022,28(10):137-140.
[3] 孙铁轶. 辽西隧道工程软弱围岩注浆加固方案的设计与研究[J]. 四川水泥,2022(9):248-250.
[4] 刘永超,袁振宇,程雪松,等. 不同注浆材料对隧道漏水漏砂封堵效果试验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2021,43(S2):249-252.
[5] 付宝宁. 水利工程 PA 改良注浆材料工程性能研究[J]. 水利技术监督,2021(9):189-191.
[6] 李冠鹏,翟聚云,罗从双,等. 介子掺和料改性注浆材料增强隧道防水效果及机理研究[J]. 新型建筑材料,2021,48(7):119-123.
[7] 陈志军. 纳米复合水泥基动水注浆材料试验与工程应用[J]. 水利技术监督,2018(2):163-165.
[8] 蒋凌云. 花岗岩残积土公路隧道支护结构力学特性模型试验研究[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35(1):76-80.
[9] 黄珂. 定向注浆技术在治理隧道水害中的应用:以深圳市竹子林车站隧道为例[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4(2):60-63.

(责任编辑 李玉玲)

Study on Waterproof Property and Mechanism of PA Improved Grouting Material and It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HAO Wenbin

(China Railway 18th Bureau Group Second Engineering Co., Ltd.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mpermeability of grouting materials for Fushui railway tunnel project, meson admixture (PA) was test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Xingushan tunnel project of Fuping railway, and the influence of meson admixture o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permeability, setting rate, setting time and mortar viscosity of cement mortar was explore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changes of cement mortar with improved meson admixture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X-ray imaging, and the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meson admixture on cement mortar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tting time and viscosity of cement mortar have not changed obviously after adding meson admixture, but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setting rate of mortar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mortar has decreased, among which the performance of grouting material is better when 1.5% of cement mass is used as meson admixture.

Key words: tunnel; grouting; PA; improvement mechanism; strength; seepage prevention; performance study

柠檬酸三甲酯绿色增塑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钟 俐¹, 韦尚华¹, 姚 宁², 于淑萍², 王 勇^{1*}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河南庆安化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1100)

摘 要:以二乙烯酮和柠檬酸三甲酯为原料,通过酯加成法合成了一种新型的绿色增塑剂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研究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改善聚乳酸的可塑性、柔韧性和拉伸性等性质。实验结果表明,将新合成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聚乳酸中的性能优于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和添加未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从分解温度、玻璃化转变温度、耐抽出性和热老化等几个方面的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新合成的新型增塑剂具有更好的增塑效果、更高温度程度、耐抽出性,且热老化程度更低。

关键词:聚乳酸;柠檬酸三甲酯;二乙烯酮;绿色增塑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2.019

中图分类号:TS25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2-0124-05

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高水平发展,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被报道^[1]。由于塑料制品具备品类多样、价格低廉、使用范围广等一系列的优点,给我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许多便利^[2]。但这些塑料制品在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白色污染”,这一缺点一直饱受许多环境保护者的诟病^[3],所以国家大力推动了“禁限塑”^[4]。为响应号召许多企业纷纷采用聚乳酸(PLA)这种新型生物可降解材料来制备合成塑料制品^[5]。聚乳酸是利用玉米、土豆、红薯这些自然界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中提取出来的淀粉作为原料^[6],经过酶解发酵或化学合成来得到脂肪族的聚酯,聚酯从乳酸衍生形成的聚合物^[7]。因此聚乳酸这种材料对于保护环境是十分有利的,也是社会上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环境友好材料。

聚乳酸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对环境友好^[8],但其较脆,这一缺点使其不能够在工业上被广泛应用^[9],因此需要对聚乳酸制品进行改性处理。通常做法是通过添加增塑剂来提高聚乳酸

制品的可加工性、弹性以及可塑性^[10]。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是生物基增塑剂中的一种,是利用柠檬酸为原料制备出来的,具有生物降解性好、增塑效率高、无毒、环保等一系列特点^[11]。且柠檬酸酯与聚乳酸制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12],能够增强聚乳酸大分子链段的运动能力,进而达到有效改进聚乳酸制品韧性的目的^[13-14],因此本实验探究柠檬酸三甲酯与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制品的增塑效果^[15]。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主要试剂

实验所用原料及试剂如表1所示。

表1 化学原料及试剂

试剂名称	纯度	生产商家
二乙烯酮	工业级	济南汇锦川化工有限公司
柠檬酸三甲酯	分析纯	北京伊诺凯科技有限公司
浓 H ₂ SO ₄	分析纯	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
乙酸乙酯	分析纯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醚	分析纯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乳酸	降解级	东莞市嘉嘉塑胶原料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24-07-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24B150043);河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211068003,202311068A01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科研启动费(No. 22037)

通信作者:王勇(1988—),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天然产物的合成,有机合成方法学研究。

通过三种催化剂对催化体系的催化效果对比发现,当选用催化剂种类为三乙胺时,三乙胺相对于二乙烯酮的体积用量在 0.2% ~ 0.5% 时,催化效率最高,所得产品的产率最高为 92.56%。

分析产物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产率随着催化剂的增多而降低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可能是因为随着体系中催化剂的含量增多,催化剂团聚在一起,造成催化剂的比表面积降低,活性点变少,导致产率下降。第二,可能是随着催化剂含量的增多,体系中会发生副反应,当加入 0.8 mL 的过量三乙胺做催化剂时,体系中发生了副反应,产生沉淀。

2.2 核磁共振分析

将所得到的产物进行核磁共振分析得到以下数据:¹H NMR (400 MHz CDCl₃): δ 4.26 (s, 3H), 4.15 (s, 6H), 3.45 (s, 2H), 3.28 (dd, J = 16.0, 40 Hz, 4H), 2.29 (s, 3H)。¹³C NMR (100 MHz CDCl₃): δ 199.29, 168.66, 165.47, 79.02, 62.14, 60.77, 49.83, 38.53, 29.83, 13.92。通过对数据分析可知,我们得到了所需的产品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

3 性能测试与讨论

3.1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玻璃化转变温度的影响

本实验中先将不添加增塑剂、添加了增塑剂为柠檬酸三甲酯、添加了增塑剂为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塑料制品用小刀切成颗粒状大小。察取聚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62℃,聚乳酸的分解温度为 299℃,故可以设置 DSC 仪器温度范围为 -40℃至 200℃,设置升温速率为 10℃/min。在实验开始前称取样品质量的范围应该在 5~10 mg 之间,因此称取了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小颗粒 6.6 mg,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粒 6.0 mg,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粒 6.9 mg。将所称取的这三组样品分别放入小坩埚中盖上盖子并使得盖子与坩埚处压实密封,并将这三组样品与一个压密封的空白坩埚分别放在 DSC 仪器中进行实验。试验结束后可导出数据用 Origin 软件做出图像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三条对应曲线可知,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62.01℃,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得知聚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62℃,因此可知本实验所测定数据与理论相符合。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这种增塑剂的聚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30.93℃,而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这种增塑剂的聚乳酸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30.14℃。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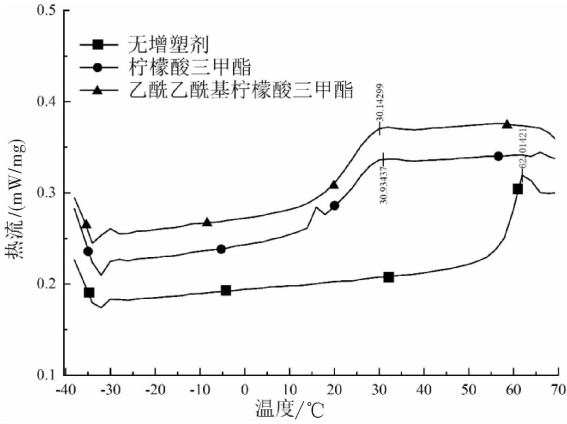


图 2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 DSC

上述数据可知柠檬酸三甲酯与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都能够明显地降低聚乳酸制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且新型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降低的程度略高于柠檬酸三甲酯,因此可知这两种增塑剂均对于聚乳酸有增塑效果,且新型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对于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具有更好的增塑效果。

3.2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热稳定性的影响

同样先将不添加增塑剂、添加增塑剂柠檬酸三甲酯、添加增塑剂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塑料制品用小刀切成颗粒状大小。经文献查阅,得聚乳酸的分解温度为 299℃,故可以设置 TG 仪器温度范围为 40~500℃,设置升温速率为 10℃/min。在实验开始前,称取样品质量的范围应该在 5~10 mg 之间,因此称取了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小颗粒 6.4 mg,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粒 6.2 mg,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小颗粒 6.5 mg。将所称取的这三组样品分别放入小坩埚中,将小坩埚分别先后放入 TG 仪器中进行测量,同时注意在放下一组样品时要等待上一组样品结束仪器冷却降温至 80℃以下才能放入下一组样品。试验结束后可导出数据用 Origin 软件做出图像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知这三条曲线均有二个失重阶段,分析聚乳酸的结构以及查阅聚乳酸的分解温度可知,第一阶段首先失去的为水分子的质量而形成低分子量的聚乳酸,第二阶段为低分子量的聚乳酸失重。其中第一阶段失重温度范围为 100~300℃,第二阶段失重温度范围为 300~400℃。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在 300℃时 TG 为 90.93%,所以第一阶段损失了 9.07% 结构中的水分子;在 400℃时 TG 为 0.76%,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 99.24%。添加了

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在第一阶段 300 ℃ 时的 TG 为 65.94% ,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增塑剂的热分解质量损失达到了 34.06% ;在第二阶段 400 ℃ 时 TG 为 0.14% ,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 99.86% 。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在第一阶段 300 ℃ 时的 TG 为 75.49% ,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增塑剂的热分解质量损失达到了 24.51% ;在第二阶段 400 ℃ 时 TG 为 0.74% ,所以质量损失总量达到了 99.26% 。由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与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的聚乳酸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在高温情况下后者样品的质量受热分解的质量更少,样品整体的热稳定性更好,更耐高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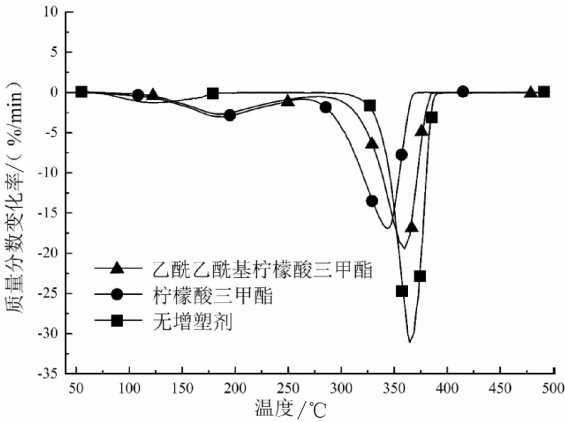


图 3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 TGA 分析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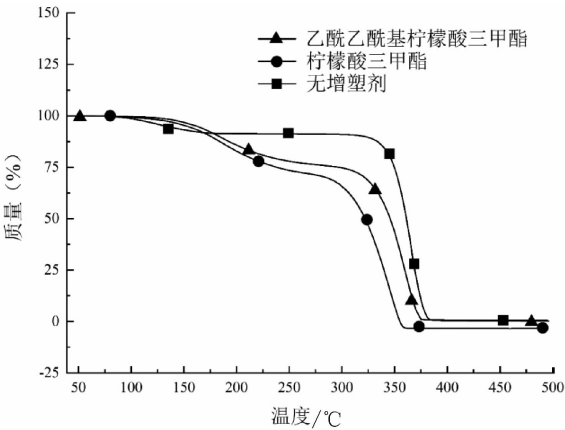


图 4 三组不同样品所测得的 TGA 分析曲线

3.3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耐抽出性能的影响

本实验将制备的不添加增塑剂、加入了柠檬酸三甲酯以及加入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分别剪成一小块,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为 0.6656 g、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增塑剂的聚乳酸制品为 0.2152 g,将这两组制品分别放入两个不同的小烧杯中,在烧杯内加水使得每一组的制品都能够充分浸泡水分,浸泡 24 h 即可。将每一组的制品都用纸巾擦干,放入烘箱中

设置温度为 50℃ 进行烘干,烘至样品质量恒重即可。发现样品质量烘干至恒重后分别为:0.5404 g、0.1554 g,分别损失了 0.1252 g、0.0598 g。因此由数据可知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到聚乳酸制品中最容易被抽出,而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加入到聚乳酸制品中更耐抽出性能更加优异;该增塑剂与制品混合得更加充分,结合得更加牢固。

3.4 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对聚乳酸热老化性能的影响

本实验先将所得到的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制品、添加了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以及添加了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分别剪成三小部分。在三个不同的培养皿中放入不同的三组样品,将这三个培养皿一起放入烘干箱中,设置烘干箱的温度为 180 ℃。当烘干箱的温度到达 180 ℃ 时,先将这三个培养皿烘 10 min 后取出第一个培养皿,再以 5 min 为间隔依次取出另外两个培养皿。待培养皿都冷却后观察制品的形态,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对比分析可知,不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制品其没有出现变色以及气泡现象,而其余两个样品由于添加了增塑剂都出现了变色以及气泡现象,故可知添加增塑剂会使得聚乳酸制品的耐热老化性能减弱。而添加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相比于添加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的聚乳酸制品其变色程度更深且所产生的气泡更大,可知新型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这种增塑剂前者加入聚乳酸中它的耐老化性能更加优异。因此经过改性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其效果更好,可使制品老化程度减慢。

4 结论

通过柠檬酸三甲酯与二乙烯酮在浓硫酸作为催化剂的条件下反应能够生成一种新型的增塑剂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因此验证了二乙烯酮由于含有两个双键含有强反应活性,能够与含有羟基的柠檬酸发生点击反应。且通过差示扫描量热性能测试的实验可知,所生成的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比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聚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表明了前者增塑剂加入聚乳酸中具有更好的增塑效果。通过热重分析实验也可得出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加入聚乳酸中,能够在更高的温度下使得样品整体损失的质量更少,导致样品整体的热稳定性更好,更耐高温;通过耐抽出实验测试表明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加入到聚乳酸制品中的耐抽出性能更加优异;通过热老化实验可知加入乙酰乙酰基柠

柠檬酸三甲酯相比于柠檬酸三甲酯增塑剂的制品,前者可使制品的老化程度低于后者。综上所述,乙酰乙酰基柠檬酸三甲酯相对于未被改性的柠檬酸三甲酯更适于投入工业化生产。

参考文献:

[1] 郑新钰. 郑月明代表: 强化“禁塑令”执行和监管助力治理“白色污染”[N]. 中国城市报, 2024-03-11 (008).

[2] 钟小启, 何明华. 禁塑限塑和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新增公务用车以新能源汽车为主[N]. 广西日报, 2024-01-27 (006).

[3] 周晓梦. 禁塑“行动派”[N]. 海南日报, 2023-11-13 (A01).

[4] 邵雅婷, 徐凌, 陈郁. 禁塑令背景下不同材质吸管环境友好性比较研究[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23, 45(7): 999-1006.

[5] 陈雨龙, 赵立环, 王玉稳, 等. 生物可降解合成纤维研究进展[J]. 棉纺织技术, 2024, 52(6): 96-103.

[6] T. MAHARANA, B. MOHANTY. Melt-solid polycondensation of lactic acid and its biodegradability [J].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009, 34(1): 99-124.

[7] 朱晓丹, 王婕. 聚乳酸及其纤维的发展及应用[J]. 聚酯工业, 2011, 24(2): 13-16.

[8] HARB V S, KOLANTHAI E, PINTO A L, et 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bioactive and biodegradable poly (lactic

acid) - tricalcium phosphate scaffolds modified with zinc oxide for guided bone tissue repair[J]. Biomedical materials (Bristol, England), 2024, 19(5): 055018-055018.

[9] GE L, MENG Z, FEI X, et al.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application of polylactic acid[J]. Molecules (Basel, Switzerland), 2020, 25(21): 5023-5023.

[10] 朱浩霖, 康菡子, 周文欣, 等. 不同种类生物基增塑剂的制备及增韧聚乳酸研究进展[J]. 河南科学, 2023, 41(4): 503-510.

[11] 王柏楠, 李俊华, 齐立芬, 等. 新型环保增塑剂研究进展[J]. 河南化工, 2019, 36(03): 7-10.

[12] 高巍. 环保乳酸基增塑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 2020.

[13] 黄飞, 胡雪倩, 芦黎黎, 等. 柠檬酸三甲酯催化合成条件的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5(2): 64-67.

[14] 高巍, 蒋平平, 张鸿, 等. 碳支链分布对乳酸基环保增塑剂性能的影响[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9, 35(11): 41-47.

[15] 彭少贤, 蔡小琳, 胡欢, 等. 环境友好型增塑剂增韧聚乳酸的最新研究进展[J]. 材料导报, 2019, 33(15): 2617-2623.

(责任编辑 李玉玲)

Study on the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Acetyl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ZHONG Li¹, WEI Shanghua¹, YAO Ning², YU Shuping², WANG Yong^{1*}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Henan Qing'an Chemical Technology R&D Co. Zhengzhou, Henan 451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diethyl ketone and trimethyl citrate as raw materials to synthesize acetyl 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through ester addition method. It not only uses diethyl ketone as a substance to remove the active hydroxyl group of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but also generates acetyl 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a new type of plasticizer. The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to improve the plasticity, flexibility, and stretchability of polylactic acid. The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to improve the plasticity, flexibility, and stretchability of polylactic acid. Therefore, the newly obtained acetyl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plasticizer can be added to polylactic acid, and compared with polylactic acid without plasticizers and unmodified citrate trimethyl ester plasticizer. Their various properties can be determined.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properties such as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extraction resistance, and thermal aging,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new plasticizer has better plasticizing effect, higher resistance to high temperatures, better resistance to extraction, and lower degree of thermal aging.

Key words: polylactic acid, trimethyl citrate, diethyl keton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lasticisers